回家

Olaf Olafsson

[冰岛]
奥拉夫·奥拉夫桑 著
熊德米 王 黎 译

An impressively
ature and
de-ranging book,
oth geographically
d emotionally....
oulful and thoughtful.

The Journey Home

重庆出版社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成熟的作品，它横跨宽广的地域，
包含丰富的情感……情深意切又富有思想。"
——《纽约时报书评》

"打动人心的佳作：与托马斯·曼的作品类似……
一部充满了迷惑、失落及否定的令人惊讶的小说。"
——《芝加哥太阳报》

"一部聚焦爱情、友情、美味佳肴的优秀小说。
作者用杰出的叙事技巧将女主人公
艰难但却不畏缩的人生旅程展现在读者眼前。"
——《时代》

"奥拉夫桑用他那卓越的含蓄陈述的技巧
缓缓地将这部悲剧自然而然地展示给读者。"
——《纽约客》

"以技巧著称的奥拉夫桑把一件困难的工作完成得相当漂亮。
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复杂的，有时令人恼怒的女人。
他用一名女性的口吻和视觉来创作这部小说，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华盛顿时报》

"读《回家》这部小说就好比看一部由瑞典电影大师
伯格曼导演的老电影……
我深深地被书中的女主人公在生命的最后尽头
还在追寻生命意义的精神所打动。"
——阿兰·屈斯

ISBN 7-5366-5913-X



ISBN7-5366-5913-X/I·1115
定价：12.50元



回家

Olaf Olafsson

[冰岛]
夫·奥拉夫桑 著
德米 王 黎 译

The Journey Home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家/[冰岛]奥拉夫桑(Olafsson,O.)著;熊德米,王黎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书名原文:The Journey Home
ISBN 7-5366-5913-X
Ⅰ.回… Ⅱ.①奥…②熊…③王…
Ⅲ.长篇小说—冰岛—现代 Ⅳ.I53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8755号

回 家
(The Journey Home)
〔冰岛〕奥拉夫·奥拉夫桑 著
熊德米 王黎 译

责任编辑 江 萍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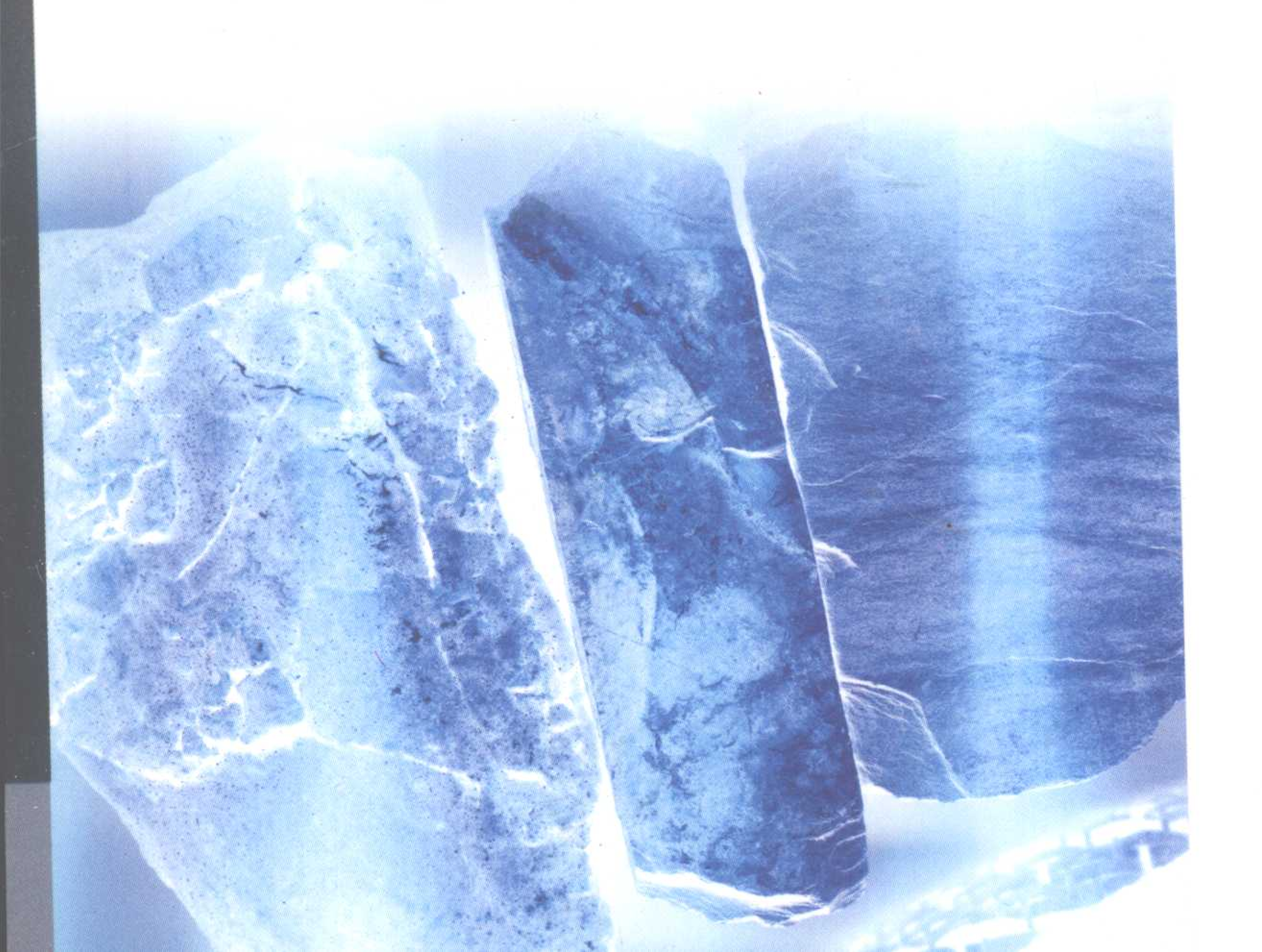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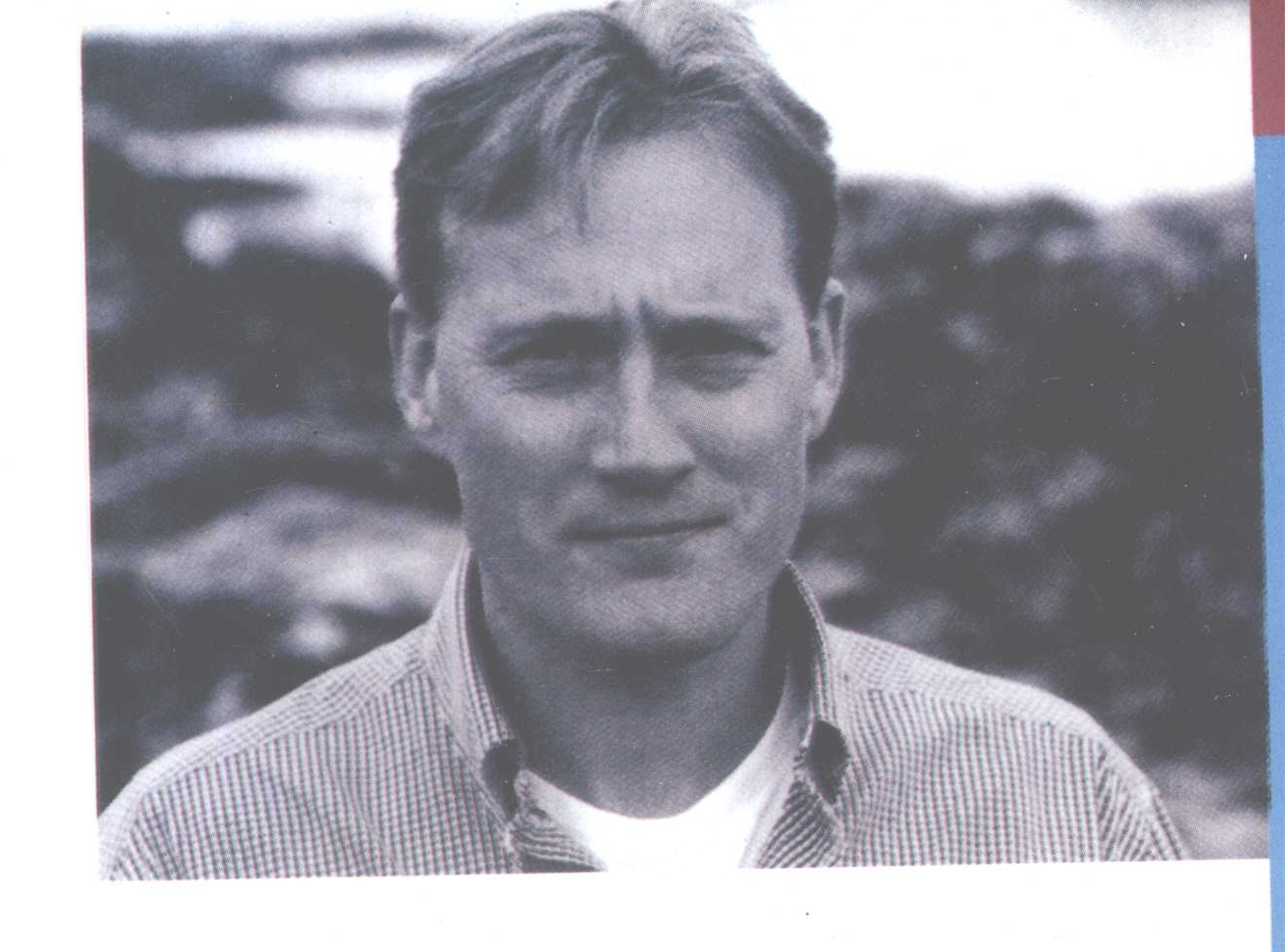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56千 插页 2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5913-X/I·1115
定价:12.50元

一名冰岛妇女
命途多舛的人生

一部融会意识流等
多种文学表现手法的
悲情小说





奥拉夫·奥拉夫桑

1962年生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

他曾就读于布兰代斯大学，学习物理。

曾任索尼交互性娱乐公司总裁，

现任时代华纳数字媒体公司副董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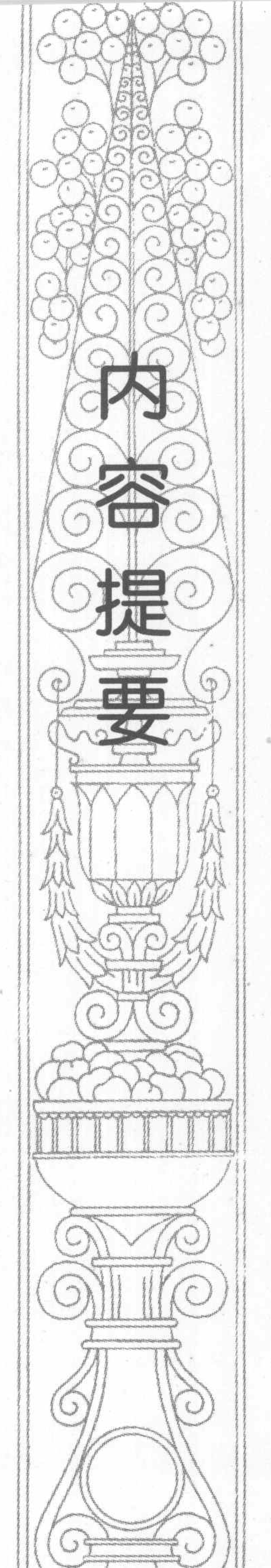
他创作了《赦免》等几部小说，

其中《赦免》由潘神公司出版。

此外，他还写有戏剧《蜗牛的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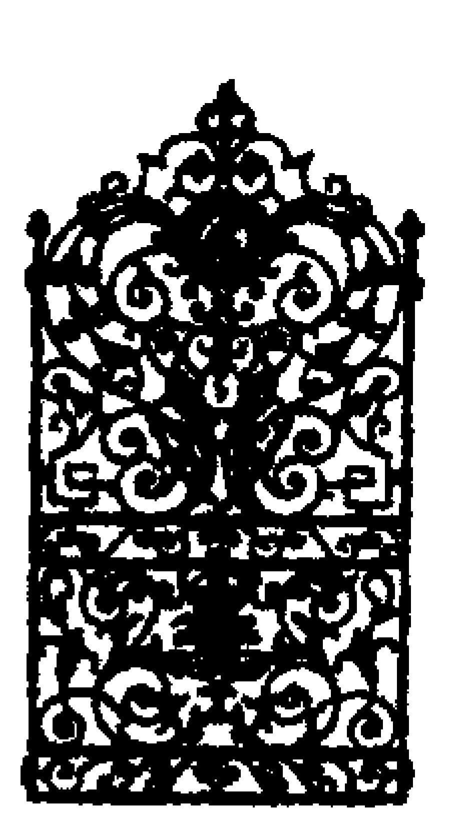
现住纽约市。

设计：金乔楠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二十多年来，女主人公迪萨在英国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和好友安东尼共同经营了一家乡村饭店。当得知自己的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她决定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冰岛。然而，越往北走，那些她想忘却的事情却件件涌上心头：与母亲不和，未婚夫被德国纳粹杀死。为了忘却战争给她带来的伤痛，她在一冰岛富豪人家作厨师。然而，那里却隐藏了性暴力和政治暴力。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为一名德国崇拜者生下了孩子……这次回家，对迪萨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感情之旅。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敢于真正直面自己的过去，也是她第一次试图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作者以一名女性的口吻，采用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手法，将现在与过去不断地交织，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



我准备启程了。

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发出熟悉的噼啪声。楼下厨房里还残留着昨晚烤苹果饼的香味。天空刚刚从沉睡中苏醒，一道粉红色的霞光照亮了东方。我的那只小狗好像早就察觉到我要离开。以往，在清晨的时候她总是闭着眼睛躺在壁炉边，而今天她却一直紧跟着我，在我腿边蹭来蹭去。整座别墅一片寂静，只有我一人醒了。每次一想到要回家，我总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现在也不例外。不过，这次我已是下定了决心，非得回去一趟不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我的初衷。

我打开窗户，迎面吹来轻柔的晨风，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窗外的树枝上栖息着一只乌鸫，很像冰岛的红翼鸠。乌鸫那略带悲伤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田野被笼罩在一层薄雾中，布满露珠的草丛在微风中摇曳。今年冬天特别冷，而现在又是春天了，森林中积攒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落叶已经开始腐烂，散发出一股类似硫磺的气味，不过，这种气味闻起来不怎么令人感到太难受。树木终于卸掉



灰色的外衣，披上了绿装；和煦的春风携着小溪矜持的笑容，就像邮递员捎来了载满喜讯的邮件。

我醒来时看到两匹马在小溪边溜达。那时候才凌晨3点钟，我没有开灯，只是裹上一床暖和的毛毯，透过窗户注视着那两匹马。它们在皎洁的月光下缓缓向前移动。突然，其中一匹马像是受了惊吓，忽然间在田野上狂奔起来，冲到老马歇尔的小屋后面，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仿佛与暮色融为了一体。我回头再看小溪，发现另一匹马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于是，我来到楼下的厨房里，很想从昨天晚上的那些饭菜的余香中寻找到一丝镇定，除此之外，我似乎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让我的头脑冷静下来。

我用嘴吹了吹壁炉里的余烬，又往里面添加了两大块儿干柴，屋子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了。昨晚饭菜的香味似乎更加浓郁起来，像一段记忆中早已忘却的往事。我期待着恢复我的嗅觉，重温那加了少许杏仁的炸鳟鱼的味道，那又鲜又嫩的野蘑菇的清香，还有那些在缸中浸泡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拿去烘烤的苹果馅饼的香气。小狗在我身上来回地蹭着，希望我在她耳朵下面挠几下痒痒。我坐在炉边时，她又把脑袋枕在我的腿上。窗外渐渐地亮了起来，地平线上升起一道蓝灰色的白光，驱赶着笼罩在田野上的薄雾。

我又坐了一会儿，努力搜寻记忆中蘑菇和鳟鱼两种菜肴的美味，但无论如何都寻它不着，满脑子充溢的都是苹果馅饼的香气。“真是莫名其妙。”我自言自语地说。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天来一碗一碗的苹果馅饼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涌现。第一次去弗乔卢卡塔的那户人家时，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可我却一直以为，自己早已淡忘了那段逝去的日子。

我用那台老式打磨机碾磨了咖啡豆，打开茶壶下面的环状开关，然后走到楼上去把衣服换掉。小狗也一路跟着我跑到楼上来。“廷纳，”我说，“我亲爱的小姐，我走的这些日子里，你可得事事当心点儿，听见了吗？”



安东尼已经起床，我听见了他在位于我们两人卧室间的那个盥洗室里发出的声音。我觉得他今年冬天好像比以前老了许多，但他的性格却和从前一样，还是那样开朗、直爽。感谢上苍让我们俩保持一定距离，否则，我真不敢想象我们两人之间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他在盥洗间里一边清洗剃须刷子，一边轻声地哼着曲子。听到他“嘀，嘀，嘀，嘀，当，当”的哼唱声，我的心情也开始轻松愉快起来。

像往常一样，黎明前我又被电话铃吵醒。我蓦地从床上坐起，等着电话铃再响，可什么声响也没再听到，只有我梦里的东西依旧在脑中回荡。我虽然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干扰，但只要电话铃一响，我还是被搅得烦躁不安。

楼下大厅里放着我的行李箱，我上楼的时候就看到它们了，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些漂亮的皮箱是战前安东尼的父亲给他的，在他们家肯定已有了几十个年头，陪他们去过美洲和非洲，当然还伴随他们到过印度。皮箱做得很结实，用手摸起来，让人感觉到是那么的柔软舒适。

我透过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一轮红日高高升起，温暖和煦的阳光轻轻地抚摸着田野上空的薄雾，就像一位母亲轻轻地抚摸着爱子的脸蛋儿。这次我一定要踏上归程，我决不会改变回家的初衷。

我习惯在厨房里的墙壁上挂一面镜子。它有时也并无什么特别之处：镜面上斑斑驳驳，镜框也有些松散。但每次有不速之客来访的时候，它却能派上用场。每当我靠近身旁的镜子的时候，我就会很快地照一下自己，当确信我的鼻尖上没有一点儿污渍，头发里没有撒上面粉，这才满怀信心、笑容可掬地出去迎接客人。另外，在镜子的下方还安装了一个小格子，里面可以放一些口红和粉饼之类的化妆品。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初次见到厨房里挂有镜子的那个地方，那是在弗乔卢卡塔的别墅里。我想肯定是这家的女主人把镜子挂上去的。第一次踏进厨房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里面挂的那面镜子。镜子不大，直径大约八英寸；有一个很漂亮的框架，纯蓝色的背景，上面是一些用手工描绘的小花，有白色、绿色和红色。而迪通饭店里的这面镜子相对来说大了一些，镜框也不是纯蓝色，而是暗红褐色，说起来它还是我和安东尼第一次打扫房间的时候，在地下室里发现的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近些天来这两面镜子在我脑中竟重合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脱胎换骨了，仿佛看见了二十多年前的我：那个为了不使满头金发沾上饭菜的气味儿，故意在头上盖着一块方头巾的小姑娘。我甚至还听到了楼上女主人的动静，闻到从书房中飘来的雪茄烟味儿。我已察觉到他的存在，于是我便莫名其妙地颤抖起来。我不知像这样恍恍惚惚幻想了多久时间，待我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总感觉到有些困惑，眼神中也有一丝怪异，好像我的神智刚从错乱中恢复过来。就在此时，我还能感觉到他一直就站在我的身后。

马歇尔沿着小路步履蹒跚地向厨房这边走来。他不时在小河边停下脚步，看看河里的流水。小河上的桥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我和安东尼两人站在窗前看着老人。桥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但不久马歇尔又出现在我们眼前，继续在向前挪动。

“他又要开始忙着干春天的活儿了。”安东尼说，“看，他似乎现在还想回去重新检查一下桥的栏杆呢。想必是发现栏杆上有些地方的油漆掉了，要不就是认为哪块木板松动了，或许是他又发现了别的什么问题。”

我陷入了沉思。我们俩静静地站在窗前，凝视着户外的田野、小溪和小桥上的老马歇尔，久久没有出声。突然，我感觉到有点儿



眩晕，飘飘忽忽的，于是我扶住窗台，坐了下来。

“你真的认为我应该马上离开吗？”我打破沉寂问道，“春季要做的事多得很，不出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第一批客人就要来了。”

他拍拍我的肩膀，弯下身子吻了吻我的前额说：

“可你现在却偏偏要走。”

马歇尔走进屋来，我递给他一杯茶。

“桥上的栏杆需要重新上漆，”他说，“这事儿可不能耽搁。”

我们看看窗外：薄薄的雾霭中，我似乎没有看见有什么掉了漆的光木头，也看不出到底哪块木头松动了，整座桥都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切正常。

去年秋天，安东尼得知我的决定后，独自走到了一边。

我在温室里坐下，裹上毛毯，看着玻璃窗外田野上的薄雾。一颗水珠从那渐渐枯萎的藤蔓上滴落下来。我很感激他并没有当着我的面表现出他的绝望。

他走进屋，我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在我旁边。他刚要开口说话时，我们俩同时注意到温室里有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虽然飞得较慢，却显得那样洒脱，悠闲自在，浑然不知外面已是秋天，好像根本就不在乎秋天是否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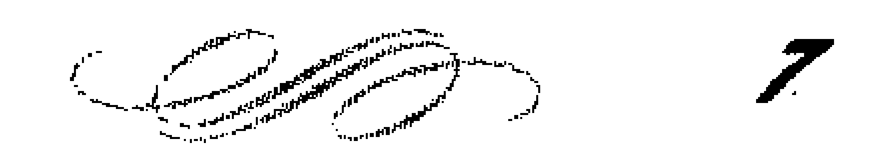
“我还以为蝴蝶都飞走了呢。”安东尼说。

“只有这只蝴蝶还没有飞走。”我应道。

“小时候，我每到冬天就会怀念这些蝴蝶。”他说，“有一次，我甚至还在梦里追赶蝴蝶。”

夕阳西下，我们俩静静地看着那只蝴蝶在缕缕阳光之间翩翩起舞。她那银色的翅膀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亮，让人联想到在镜中闪烁的烛光。

埃利斯医生每周四下午两点至四点办公。他的会客室里有五



把椅子，靠角落的地方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颗盆景，盆景上方挂着一幅特纳的落日图的复制品，画的颜色已经很淡了。每到周四我都会去找他，但有时埃利斯医生会善意地建议我黄昏以后去，他说那样对我的身体会更有好处。

我和他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说希望他在病人身上所花的功夫超过客厅里的那棵盆景。埃利斯医生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我却注意到他那严肃的表情里隐藏着微笑。自那以后的几次接触中，他常常惊讶我在这个时候还有心开玩笑，特别是那次他告诉我最初的检查结果时。

会客室的窗户朝西，从那儿向外望去，虽不能说让人觉得无聊，但窗外所能看到的风景也的确有限：街道的对面是一排低矮的砖房，底层是理发店、书报亭和布庄，上面两层是单元住宅。理发店旁边是一块废弃的空地，男孩子们有时候在那里踢足球。不远处有一条铁路，铁路两旁有些蓝色的低矮的小屋。

"18个月。"在我的追问之下埃利斯医生终于说道。

"你打算把那些写下来吗？"

"12到18个月……"

"干脆就算12个月吧！"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破旧的火车沿着铁轨吱吱嘎嘎地开过来，在小屋前的站台停下，疲惫地喘着粗气。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是没有火车经过的，但偶尔却能看见一些燕子，像幽灵一样在街道对面的那些砖房屋，无声息地飞来飞去。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安东尼站起来说他有话要讲。我们那会儿刚吃完我做的蘑菇和田螺，鳟鱼还没有来得及吃。我当时还在走神儿，也不知道安东尼是从哪里、在什么时候慢悠悠地站起来的。等我注意到他时，他清了清喉咙，说起话来。我们围坐在旧餐厅里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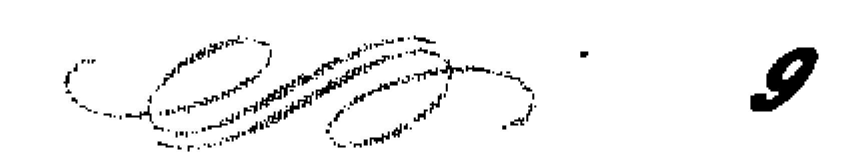
张长桌子旁，没有开灯，只放了三只大烛台。桌子上铺了一块刺绣的白色的桌布，上面摆了一些蓝色图案的盘子，那是安东尼很久以前从巴黎买回来的，虽然剩下不多了，却也足够我们当晚之用。

我们一共有八人：安东尼、我、老马歇尔、打扫客房的林奇小姐、服务员领班肖恩·特鲁洛夫、我从附近老桥农庄请来的威克费尔德夫妇（他们供给我们松鸡、鸡蛋、火腿和奶酪），还有老马歇尔的女儿丽迪尔。丽迪尔是从布里奇沃特来的，她的丈夫是一名医生，他们有个五岁的儿子。那孩子时不时到我们这儿来玩，而我并不喜欢让他到厨房里来陪我。他常坐在靠墙角的那张桌子旁。桌子的一边是锅灶，另一边是窗户，从窗外望去，透过那片田野，能看到小溪对岸的马厩。

我经常顺便给他一些东西吃，他慢慢地品尝，一句话也不说。高兴的时候，他还跟我一起唱歌。不一会儿，太阳从云层里露出笑脸，透过窗户，给整个屋子洒满了阳光。阳光把他的影子映照在镜子旁的墙上。我放下手中的勺子，久久地注视着他。他那印在墙上的影子好像突然间有了生命，这种生命力属于任何一个孩子。看着他那平静缓慢的动作，我陷入了沉思，直到他问我话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他说："我可以再吃一块面包吗？请您再给我唱一首歌好吗？"

刚才我提到安东尼站起来说他有话要讲。自从我们一起住进这里——如果可以这么形容我们之间关系的话——我们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年秋天，在我们的房间向客人开放之前，都要举办一次晚宴，邀请所有员工和附近一些邻居，尤其是那些为我们提供食物和帮我们照看过那家饭店的人们。

不可否认，最初几年的这几个晚上若要做到笑迎一切确实有点困难。大家都知道，经营旅馆还只是一个开头。我一直都在为此事而感到自豪，我想努力把这家旅馆经营下去，可也只能是勉强维持罢了。我总是任劳任怨，努力使自己不去计较当地客人对饭菜的看



法：在那段战时封锁定额配给的日子，他们觉得那饭菜很难吃，我历经了千辛万苦才在温室里种活了蔬菜，也没有能讨好。他们就是这样的愚昧。“一群庸人。”我对安东尼说，“我决不会因为他们而灰心丧气的。”

在最初的十一年里，霍尔赛小姐一直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现在林奇已接替她干了六年；特鲁洛夫从我们开张以来一直都呆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干，他的工作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老马歇尔自打安东尼记事起就一直住在他家全心全意地照顾安东尼，与其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奴仆，倒不如说是一位铁心的大哥。

像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今年我们又开始在平静中期待今天这个晚上的到来。不管怎么说，它毕竟预示着夏天的开始：明朗的天，敞开的窗户，洗衣室外面晾晒着一排白色床单，随风飘扬。整个旅馆就像户外的野草一样，重新恢复了生机；关闭了一个冬天的东厢房又住进了客人，楼梯又被客人们踩得吱吱嘎嘎地响；灶台又开始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起来了。尽管安东尼竭力想掩饰内心的激动，但我还是看出他已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好在孩童时代他就受过类似的训练，不会过分地不合时宜地流露自己的情感。只是在今年春天，尽管他一再克制自己，但那只不过像一层薄纱，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纯真的喜悦。

“春天来了，”昨晚他微笑着对我说，“很高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接下来的七个星期，我们的客房已全部被预订了！”

威克费尔德夫人首先鼓掌，打破了沉寂，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纷纷鼓起掌来，好像是为宣泄他们的情感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他告诉他们说，我们的客房已从 22 个增加到了 24 个，既然东厢房的休息室和游戏室早就被当成客房，我们也就干脆把它们改装成客房使用。

“我有一种预感——也许不该说出来：让一个人的期待值过高终归不是件好事儿。”他继续说道，“但我觉得，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



些客人被列入到新的预约名单中去。”

他开始有点激动起来。我知道他还想说些什么，于是我一直低着头，希望他不会在这个话题上大做文章。像往年一样，他首先要对在座的各位客人进行一番赞扬。先是林奇小姐，他说，众所周知，正是她的努力才使得每一间房子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最让他体会深刻的一点是，客人们旅途劳累一天后，多么期望回到房间时能见到一束鲜花，听到鸟儿的歌声；多么期望能睡在松软舒适的床上，盖上暖和的被子（可我觉得他把被褥比作搅匀的奶油未免有些夸张）。

肖恩也同样得到了他的表扬。

“你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你的工作非常出色，你应该得到我们的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总是兢兢业业，总是让人感到无拘无束，又能随喊随到。”

他还说，威克费尔德夫妇喂养出了他所吃过的最好的山鸡。

“你们和我们一样，心里总想着客人的幸福和安宁。”

最后他拍了拍老马歇尔的肩膀，清了清喉咙，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我亲爱的迪萨，”他压低声音说，“在旅馆处于最艰难，最阴晦的日子里，是你给它带来了生命和灵魂，是你让我这些年来能有机会始终陪在你身旁。”

我站起身来扶他坐下——或更确切地说，硬把他按回到了座位上。

“好了，好了，”我说，“你最好还是别说了，不然的话，大家都得哭了。噢，鳟鱼做好了。”

我们都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拉住我的手，时不时地紧捏一下，我知道他仍很激动，我亲爱的人。

“迪萨明天就要回冰岛了，”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二十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回去，让我们为她的健康干杯！”

客人们都举起了酒杯为我祝福。据从厨房飘出的香味儿判断，苹果馅饼马上就要熟了。



《绅士出游旅馆指南》第32版第19页上对我们的旅馆这样评述道：迪通饭店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蒙迪普山下，东临韦尔斯山脉，西边是欣欣向荣的农牧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周围其他环境亦可使您感到心旷神怡，全身放松；三座建筑物四周的环境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池塘里的荷花争奇斗艳；道路两边是常绿灌木，排列得整整齐齐。想想看，要是能够坐在那些西班牙上世纪中叶的石头椅子上小憩一会儿，该是何等的惬意！尤其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花园里百鸟齐鸣，旅馆房间舒适安逸，客人们一定会感觉到宾至如归。惟一让他们感到心情不悦的，也许就是初来时的那份不爽，但即使是这份不快，在这儿呆上几天之后，也会消逝得无影无踪。

旅馆的附近可以钓鱼，还可以骑马。旅馆内的两个操场上可以打网球，也可以掷板球。

旅馆的主体部分早在18世纪初就已建成，1891年由朗斯代尔伯爵把它买下来，作为度假的别墅和打猎的行宫，后来其嗣子（安东尼）把它改建成一座避暑山庄，并和妻子一起经营（至于这点，明年再版时得修改，因为我和安东尼并未结婚）。完全可以说，他们夫妻俩就是这座庄园的开拓者。

这里共有客房22间（至于这点，也得修改），一间比一间舒适。这里的服务真是尽善尽美，每一名员工都是兢兢业业，训练有素。

然而，迪通饭店胜于其他乡村别墅旅馆的远不止这些，还有……

对《绅士出游旅馆指南》的引用就到此为止，但我还想指出的另外一点是有关那些被作者搞错了的地方，以免有人看过这本书后会产生误会。书中谈到我在做鹌鹑这道菜时加的是红枣，其实那是我

的一个朋友从普罗旺斯寄来的无花果。不过,品错这道菜的远不止该书作者一人。

我之所以引用这本旅馆指南,并不是有意想引起别人对我或者对我们所提供的饭菜的注意,我只是觉得,多亏了该书的介绍,才使得我们这个夏季的生意有了好转。坦白地说,我并没有想到去年记者们的采访会给我们如此高的评价,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逗留期间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一切都很顺利。但最后一天发生的一件事,让安东尼很是担忧。

事情是这样的:安东尼和我想为那些记者饮茶饯行,于是带他们来避暑山庄小憩。这里曾是一座古老的冬季花园。记得那是八月上旬的一个下午,阳光明媚,间或还能听到网球场上球拍打球的声音。没错,当时是四点钟左右,我还没有打算做晚饭。我们在谈有关烹饪艺术的问题。我力图消除他们在烹制鸭禽等食物问题上所产生的误解。他们都饶有兴致地听着,尤其是那个稍年轻点儿的记者。我猜他们都在四十岁以下,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其中一个要稍稍年轻一些。也许是因为他们体格不同才留给我这样的印象吧。他们都彬彬有礼,举止大方。虽然我们谈的话不多,但我们交谈得还算愉快。安东尼兴高采烈地给他们讲起小时候他和祖父朗斯代尔伯爵一起住这儿的情景。他祖父始终让他引以为豪,每每回想起那些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日子,他无不充满怀念之情。

他们要起身告辞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一句:“这个名字不有点儿落伍吗?”

“什么?”

“《绅士出游旅馆指南》,难道你们不觉得它有点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吗?”

他们面面相觑。

“现在并不只有男人才旅游,也不是只有男人才会决定去哪儿度假或去什么地方疗养。”我未加思索地说,“我敢说,在这方面巾帼

不让须眉，在我们这儿就能找到例证。安东尼，你说是不是？”

安东尼有点不知所措，他尴尬地干咳了几声，站起来咕哝着说，不管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其内容是名副其实的，而且让人深受鼓舞。

他能摆脱窘境还多亏了那只无意撞到房间窗玻璃上的小鸟，我们全都跑去帮它，虽然场面有些混乱，但是这个小小的插曲似乎也解救了那些客人。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小鸟已恢复正常，还在花园的一棵树上鸣啾。我送给他们一篮食品，里面有鲑鱼、煎蛋卷、面包，还有一瓶玫瑰葡萄酒。但安东尼此时却有些不安，他觉得我的那番评论将指引我们走上穷途末路，于是躲在那座别墅里迟迟没有出来。

如前所述，谁都盼着今天——确切地说是今天晚上——大家都在默默地憧憬着，但随着晚餐的进行，这份彬彬有礼便会转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但今晚，气氛似乎有点异样，让我琢磨不透。我仔细想想，可能是因为安东尼宣布了我明早要离开的消息吧。

安东尼讲完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起话来。马歇尔讲起了安东尼小时候的故事；林奇和特鲁洛夫开始制定他们去海边游玩的计划（鬼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有时间）；安东尼也按捺不住了，又开始朗诵他那些战时的英雄诗篇——那些我们以前就听过，而且知道其故事是虚构的。威克费尔德夫妇和邻居赫尔姆斯代尔伯爵开起玩笑来，说他好像整天都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有时深夜里醉醺醺地闯进院子，想射杀黑暗中那座鸽子的雕塑，但却把威克费尔德夫妻给吵醒了。我把苹果馅饼端上来时，晚餐还在吵吵闹闹中继续着。老马歇尔的女儿突然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你是怎样做出这么可口的饭菜来的？”然后又说，“简直不同凡响！”

从她的语气中，我听得出她并不是在奉承我，只是出于一种纯

粹的好奇。于是，客人们都安静下来，想听听答案。这倒让我感到有些左右为难了：回答吧，就等于默认自己配得上这样的称赞；不回答吧，却未免让人觉得我狂妄自大。

"1936年我来到伦敦，"我犹犹豫豫地开了口，并不知到底往何说起，"我住在荷兰公园旁边，我住的房子比垃圾箱大不了多少，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脸盆，一个衣柜和一张小小的书桌。窗户外边是一块不大的广场，广场的一边是面包房，另一边是一家药店。每天早上，外面手推车的吱呀声响起的时候，或者布朗夫人在厨房里弄出些声响时，我就会醒来。布朗夫人是我的恩师布勒斯丁的一个朋友，她长得很乖巧，是一位了不起的厨师，她教给我很多有用的东西，她的记忆力也非常不错。"

"长话短说吧，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她厨房里望着窗外，广场上的灯渐渐暗了下去。这时，我问她作为一名优秀的厨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她很直接地说：'他们必须是群邪恶的罪人。''什么？'我惊叫起来。'没错，'她继续说道，'他们邪恶，他们罪过，他们觉得拯救人类惟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烹制美味佳肴给人们一些幸福。'"

我以前从来没有向人谈起过战前住在伦敦的那段日子，所以他们现在听得如此认真，我也并不觉得我曾过多地想起那段时光：我一直都在努力地忘却那些日子。但说完这件往事，记忆中那些尘封已久的东西又被搅乱，而那是一些本应继续留在记忆里永远不被提及的往事。我脸上的表情可能有些不安，人们笑完了布朗夫人和她的"罪过说"之后又陷入了一片沉静。老马歇尔的女儿丽迪尔的话又恢复了热闹的气氛。

"'罪过说'不是你厨艺精湛的真正原因，要不然，我们的厨艺早就远远超过你了。"

大家又狂笑起来，随后又一起干杯。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讲起了"罪过、邪恶"之类的故事，说他们甚至连鸡蛋都煮不好。

我借着去厨房的机会，来到外面的台阶上，呼吸着夜里凉爽的

空气，尽情享受着笼罩万物的那片宁静。廷纳走了过来，我告诉她离开她后我会想她的。

我忽然觉得我应努力说服自己，最好将这次回冰岛的旅程往后推迟一下。于是，我赶快又回到客人的喧闹中去。我知道，我要是再单独多呆一分钟，就可能会改变我回家的计划。

睡梦中，他的眼睛不时地变幻着颜色：最初是棕色，随着那双手摸遍我的全身，变成了蓝色，他的呼吸短暂而急促，被汗水打湿的头发铺撒在我的脸上，我一动不动，无论使多大的劲儿都不能把他从我身上推开。

那天一大早我就醒来了。前一天晚上，修理工维修了灶台，我必须检查一遍，确保它能够重新正常工作，能始终喷出蓝色的火苗。这可是盛夏，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我可不能让它在中途出点儿什么小毛病，或有任何闪失。昨晚午夜我去睡觉的时候，修理工仍在工作。今天早上凌晨五点钟我下楼的时候，他已离开，修理用的工具也一起带走了。我注意到他走时把房间里的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我对炉灶里喷出的火苗感到很满意，直到下午挂钟敲响两点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从黎明时起就一直站在这里。我不只是想亲自检查一下刚刚维修之后的炉灶，关键问题是那天中午将会有一大批客人要来。不过两点钟左右餐厅里已空无一人，客人们都已外出游玩去了：有的去钓鳟鱼，另外一些人或者散步，或者开车兜风，他们都在尽情享受着这个暖和舒适的下午时光。我环顾空当当的餐厅，聆听着这片寂静，突然感到有些疲惫。

我从来没有在白天躺下休息过。我不大喜欢用这种方式打发时间。我决定到东厢房的游戏室去，坐在我最喜欢的那张扶手椅上。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不硬不软，特别舒适；另外，坐在那

里向北望去，可以看到一些小山和天空中云朵变幻的各种美丽图案。

我坐在扶手椅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浑身轻松。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皮垂了下来。不知什么原因，我刚闭上眼就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儿：很快我就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我潜意识里在时不时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但身心的疲惫却使我把一切都忘掉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呆在弗乔卢卡塔的那户人家的厨房里，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晨报，报纸的标题全都错了，“1940 年 10 月 16 日”这个日期就像是头版新闻标题一样显眼。我坐在餐桌旁的一个高凳上，报纸就在眼前，可它却是如此沉重，我竟翻它不动，惶恐之中我企图用两只手把它拿起，可就是拿不起来。就在这时，我听到楼上女主人大声喊道：“迪萨，圣诞节到了！快把蜡烛点上！过圣诞节了，过圣诞节了！”

我站起身，闻到从书房飘来的雪茄烟味儿，又听到我的主人在大声地说：“她今天已经吃过药了！”于是我又犹豫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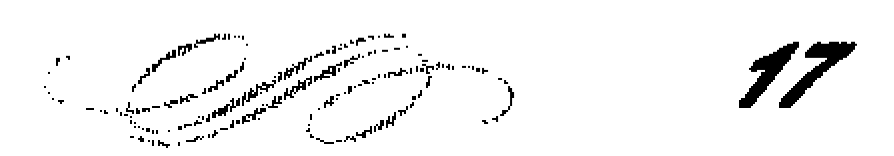
“过圣诞节了！”楼上又传来叫喊声，“把蜡烛点上，这儿太黑暗了……”

我挣扎着想走到门口去，可两条腿却像那份报纸一样沉重。突然他的声音第一次闯入我的梦中：

“然后，希姆勒先生告诉我……”之后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话，“然后，希姆勒先生告诉我……”

“告诉我，我，我……”我脑子里一直在回响。我用手捂住双耳，却又传来了女主人的声音：“这儿太黑了！”

我害怕极了，闭上眼睛，好像这样做就可以逃到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我再睁开眼时，觉得自己身处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和以前一样，我感觉到我的手脚都不能动弹，但此时我意识到我是平躺着的，好像躺在地下室里他的床上，他压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他在我脸上呼吸，他的手也开始顺着我的裙子向上摸，



我使劲儿挣扎，却丝毫不能动弹，我企图叫喊，却出不了声。在他进入我身体的那一刹那间，我被惊醒了。我坐在游戏室里的扶手椅上，浑身不停地颤抖。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注意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好像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遍又一遍的叫喊声上，那声音很是恐怖，像是哪个女人在遭强暴。听声音她就在附近，也许就在隔壁。我从椅子里跳起来，还好，钥匙环就在我围裙的口袋里，于是我冲出房门，跑上走廊，寻着那越来越大的叫喊声，来到一间客房，用万能钥匙打开房门，闯了进去。

出于种种原因，我总觉得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发生的事情有点儿不大好讲，但我还是要把整个经过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描述一番。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把它复杂化。

那女人的手被反绑在床架上，她的脸却被一个男人的身子遮住了，所以我没看到她长得什么样。那男人的整个身子还在她双腿间不停地上下抽动，将她疯狂地顶来顶去，同时发出令人恐怖的呻吟，屁股上的汗水不停地往外淌。我没来得及细看，马上冲上前去揪住那男人的头发。我们从床上滚了下来，撞在床边的桌子上，把上面的一个花瓶打落在地。那女人害怕地尖叫起来，挣脱那些绑着她的绳子大呼救命，抓起一个枕头紧紧地抱在怀里。那男人挣扎着站起身来，表情十分尴尬。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我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他的表情既不像在施暴，也不像是在泄愤，看上去却是满脸的诧异与恐惧。这时候我才发现，是我自己弄错了。

我冲出客房，一路不停地跑回自己的卧室里，把门反锁上。我的天哪！我是多么的尴尬，多么的羞愧呀！我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房门，看看它是不是闩牢了；最后，我一屁股坐在墙角的椅子上，确切地说简直就是瘫倒在地上。

在慌忙躲藏途中，我记得好像在正房的什么地方与哈尔西小姐擦身而过，还记得她问了我一句："怎么了？"但我没有回答。我想也许是她把安东尼找来，告诉他我有点儿不大正常吧。安东尼在我

的卧室门外等了好久，我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让他进来。他进来后什么话也没有说。

被我冒冒失失的行为骚扰的两位客人是来我们这儿度假的，他们是德国人，两人是夫妻，他们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天，本来打算再逗留一个晚上的。而现在他们自然决定不住我们这里了，并于当天晚些时候就走了。我却为此事儿在床上躺了足足四十八个小时。

安东尼告诉我说他们付钱给他时，他没有接。他们的一切食、宿都免费。看着他走出门外，我什么话也没说，也没打算申辩什么。

昨晚醒来时，我想到了威克费尔德夫人。肖恩·特鲁洛夫（可怜的孩子，竟被冠以这个姓儿）最先说起有关实情和谎言的话题。话题是怎么引起的，我一时也记不起来了。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被盗走了一笔钱，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有这笔钱，那他到底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呢？"又问："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撒谎，只是为了不使后者失望，那前者有没有做错什么呢？"

"能不能举例说明？"威克费尔德先生问道。显然，他觉得肖恩在故弄玄虚，炫耀自己。

"比如说吧，"他进一步解释，"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丈夫（顺便插一句，男人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和别人通奸，这不是有点太离奇了吗？）瞒着他妻子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往来。他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他妻子好吗？因为，如果他说出实情的话，只会给她造成伤害。"

接下来的气氛多少显得有些尴尬，连肖恩本人也感觉到了。因为他自己也认为他所举的例子不是很妥当。

在座的人（威克费尔德夫人除外）都知道她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有一次，安东尼就碰到过他和一位在这里干了好几年活的女仆之间的风流韵事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他们在 12 号客

房里被逮了个正着。我注意到我们所谈论的话题让安东尼感到有点难为情。他站起来，打开窗户，让屋子里的烟味儿向外散发散发。我还记得他当时还谈论过天气，而且还用手指着东方的明月。昨天晚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是特鲁洛夫的愚昧行为把我们推向了绝境。当然，他的本意不是想这样的。

威克费尔德夫人仍然幸福地偎依在丈夫的身上，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安东尼又用手指着天上的月亮。肖恩也在设法使自己摆脱困境，同时又不违背事实的真相。

"所以，知道的事情太多并不是好事儿。"他结结巴巴地说。而我却一直把他的那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很显然，要是当时我不去管那么多闲事的话，我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大不相同。

有时候，我在安东尼身上看见了我父亲的影子。这种感觉在昨天晚上又产生了。当时，女服务生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安东尼就坐在火炉旁边的凳子上，火光只照亮了他的一面脸颊，另一面脸是阴影。他显得很深沉。他的脸虽然朝着窗户外面，可我认为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什么东西，因为外面一片漆黑。正是这幅剪影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以前，晚上的时候，他常常坐在手术室旁药店的一张书桌前，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读书看报，或者写篇日记打发时间。他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常常溜到下面去找他，走进手术室，把药店的门推开一道缝，探头进去眼巴巴地看着他，希望他会让我进去。

"迪萨，宝贝儿，你还没有睡觉啊？"他会微笑着问道。于是我便跑过去，爬到他的大腿上，紧紧地偎依在他身上，他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头。

"好了，好了，宝贝儿，闭上眼睛，想一些美好的事情。"他说，于是不一会儿我便睡着了。

安东尼和我父亲两人都有一双清澈的眼睛，高挑的眉毛，笑容



之中也都隐藏着忧愁。小时候我以为那是疲倦的表情，但现在想起来，想到他坐在药房书桌前椅子上的样子，我觉得那是一种忧愁。当然他也累了，做为一名北冰洋沿岸区域的医生，其生活就是永无休止的工作。妹妹乔朗恩后来告诉我说，父亲亲眼目睹了很多人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这事儿也许是真的。

安东尼好像在沉思着什么，他看见我走过厨房，冲我笑了笑，问我愿不愿意出去散散步，然后再回来睡觉。

"就沿着小河走走怎么样？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们俩来到户外，天上繁星点点，把整个夜空装点得很亮，皎洁的月光洒满了通往小溪的山坡，照在山脚下温室的屋顶上。我们手牵手走着。他握着我的手，似乎比以前更为有力。

"迪萨，亲爱的，"我们来到桥边，他终于开口对我说，"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儿。"

我们俩在桥上停下来，看着河里的潺潺流水。不一会儿，我们又爬上山坡向我们的房间走去，这样的情景让我感到充满信心。

"我一直都在想一件事儿。"他又说。这时候，月亮躲进了云层，只有山上房子里的窗户中透出微弱的亮光。

"有时我觉得，"他迟疑地说，"我担心和你在一起让你并不感到快乐，有时我很担心……因为我这个人秉性难移……我真的希望我有所改变，但往往又做不到。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地在乎你，我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别人。"

我决定让安东尼就此打住，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他继续下去也太难为他了。月亮从云层里露出脸来，月光下，我亲爱的安东尼看起来是那么的可怜。

我设法安慰他，告诉他我也像他喜欢我一样喜欢着他。"我从没这么开心过，"我说，"这儿就是我的家。"

他伸开双臂搂住我，热泪盈眶。

"你还会再回来的，对吗？"

我不禁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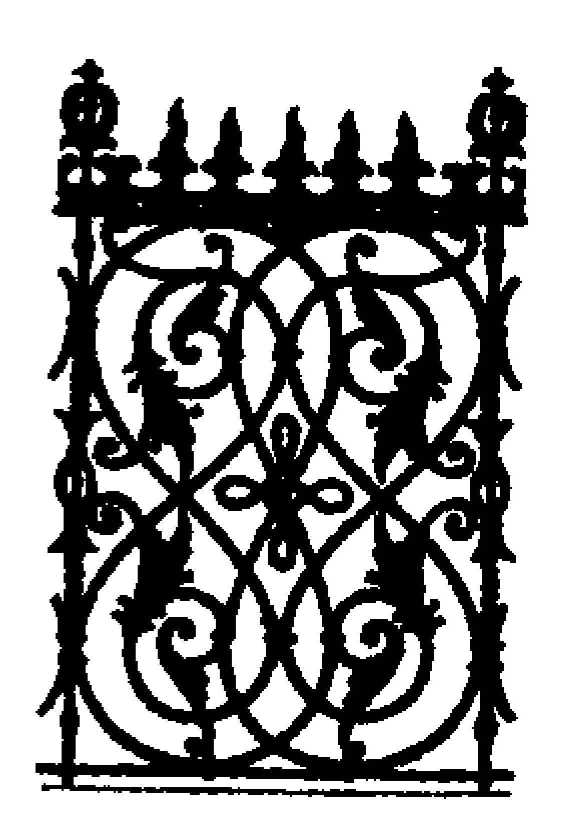
“我当然还会回来的呀，其实你们所有的人都应知道，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推迟了回家的日期。”

我们往回走，田野上吹来一阵阵凉风，野草随风摇曳，树叶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我们俩驻足聆听——这是春天的旋律。

“明天我要送你到利思去。”他说。

“明天再说吧。”我回答说。

2



我目瞪口呆。

“十一英镑！”我怀疑地尖叫起来，“你肯定还没答应吧？”

每次谈到钱，安东尼总想含糊其辞，这次也不例外。他说十一英镑已经够合理了，想想看，这对司机来说，将是一段四十八小时的行程，而且，他得加油，还得支付至少一个晚上的食宿费用。

“如果司机不能当天从利思直接开回来的话，他得支付两英镑出去。”

但我却早已算出了这笔账——当然是粗略地估算——汽油、一个干净卫生、可提供早餐的旅馆，再加上一些食品和饮料，顶多也就不过四英镑，我甚至都考虑了他可能会选择在一个比较像样的地方吃饭，尽管并没有什么特别贵的地方，但那还剩下七英镑。这部车已用了四年，如果它在四十八小时内的磨损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四英镑也就足够了。不可否认，这部车不错：是一辆美洲豹达鲁克斯牌车。记得肖恩·特鲁洛夫曾告诉我，这种车是 1957 年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但不是 1958 年生产的那种车。

所以我对安东尼说，我觉得这个价有点儿高，并让他与那位司机重新协商一下，我还提醒他，那司机还常常接送那些需要由司机专程开车的客人，我们总是直接联系他，让他开车出来，我们再把客人带到车上，换句话说，他从我们这里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许多客人。

“而我们又向他要过什么呢？”我问道，“没有，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提起这事儿。”

安东尼叹了一口气，往嘴里塞了块巧克力。我没有向他要巧克力吃。

“然而，当我们好不容易用得着他的时候，他却向我们开起了天价！难道他就狠心敲我们的竹杠？”

“我们说点别的事儿吧，”安东尼说，“老是说钱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我很不喜欢他说这话时的那种口气，并坦诚地告诉了他。我还说——也许我本不该提——最后常常是我来负责整理财务的工作。他应该还记得，我在1941年回来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是多么糟糕。

“可不管我怎么说，你还是一直不肯卖掉那张油画。同样，让你最后答应卖掉德文郡的那块房产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一想到我插手你的事情之前你就浪费了不少钱，我心里就不舒服。”

他起身向门口走去，可以看出他在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到了门口，他转身对我说：

“他给你打了折。六折优惠，现在满意了吧？”

“什么？”

“起先他根本就不想收钱，但当我坚持付钱给他时，他只收了这一些，一点点都不肯多收。如果你不信，可以亲自去接待处看一看他的价目表，就在书桌上。”

说完他就走了，看得出他在努力克制自己想摔门的冲动。

那天晚些时候，当我处理另外一些事情经过接待处时，我瞥了

一眼那份价目表。我得承认，我看了价目表后非常不快。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那位司机显然要比安东尼略胜一筹。我粗略看过价目表之后发现，他实际上给了我们五折多的优惠，可我却还冲安东尼发那么大的火，看来我是真的该走了。

那晚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谁也没再提及此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事儿无疑搅得我心神不宁，也让我预感到我的这次冰岛之行吉凶未卜。

开了三个小时的车，我们决定休息一下，吃一顿稍晚了点儿的午饭。我在汽车里打了几分钟的盹儿，现在一点儿都不觉得困倦。那辆美洲豹车保养得很好，里面的空间又比较大，司机也很高兴，也没什么无聊的事打扰我。我一觉醒来后，他告诉我说我并没错过什么风景，因为一路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是下了一场雨，不过刚开始下就停了。我睁开眼，看见车窗上还有几滴雨水。

坐在车的后排觉得很舒服，没有什么来打扰我此刻的宁静。于是我不禁纳闷：在穿过英国乡村的旅途中怎么会一直感到如此安逸。也许是司机的那句话给了我答案：我睡觉的时候沿途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看的风景。睡着以前，我看见车窗外面只是一望无垠的田野，田野被一排排树篱墙或漂亮干燥的石墙分隔成不同的小块。乡间里蜿蜒曲折的小路和周围的一切搭配得恰到好处，仿佛是自然天成，鬼斧神工。显而易见，这儿的景致别具一格，比其他地方多了一份宁静，没有尘世的喧嚣，却有自己的秀美之处。今天早上映入眼帘的这番景色与冰岛相比，虽谈不上风景秀丽，却也能让人感到宁神静气，浮想联翩。当经过那如镜的湖水时，我想起自打我第一次开始独立思考，独立做出决定时，我就一直避免到野外或那些荒凉遥远得让人感到害怕的地方去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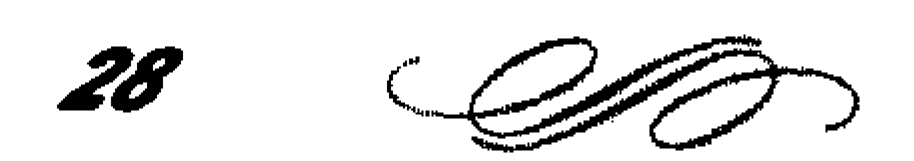
我们的车从那优美平静的湖水旁经过时，我联想到冰岛那粗犷的自然风光，巍巍耸立的高山，还有那终年积雪覆盖、很少见到阳光的土地。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我，突然间又想起了那些早已忘却的旅程。忽然，我感到有点不舒服，于是叫司机把车停下。我径自来到湖边，水面上有一只渔船，上面有两个人。他们的行动很慢——也许是距离太远的缘故，他们看上去好像根本就没有动。刚刚下过雨，空气干净清新。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呼吸到嫩绿植物的芳香。这时候天空中云开日出，阳光像一面黄色的织锦，铺满了整个湖面和那只渔船。我感觉舒服了一些，于是我们又踏上回家的旅程。

司机给我打开后门，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以前好像没有晕过车，今天肯定是有点儿疲倦。"

透过车窗观赏外面的风景，我不禁想起了英国人和他们的品性。

英国人——概括地说，尽管我所指的主要是上流社会的人们以及家族历史久远的人们——生性比较拘谨，而且恪守中庸之道。他们尽量不向外人流露他们的情感。要是他们哪天做了个心理测试，也只会让自己知道结果。他们尽可能不拿自己的事去烦扰别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比那些一有机会就向他人倾诉的人更让人厌烦了。我的话听起来好像是我觉得他们冷酷保守，实际上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其实许多英国人都很热情，对别人照顾得也很周到，和他们交往起来也比较轻松。

正是由于他们的拘谨和保守，我才记不住安东尼曾跟我直截了当谈论他对性的价值取向带给他的焦虑和苦恼。从我们一起来到迪通饭店的第一天算起，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他一次也没有谈起过。那天他悄悄问我："你不觉得我们只需稍稍努力一下，就会办好一家一流的旅馆吗？"

我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我是没办法办到的。"

"你还不能？没有谁会比你做得更好了。"

"哦？我也拿不准。等到战争结束后再说岂不更明智吗？战争期间是不会有人到这里来的，而且样样东西都是定量配给……"

"旅馆要想营业，必须现在就得准备，"他反驳道，"战争终归是要结束的，没有人希望光靠吃面包过日子的。"

二十年来他从未向我抱怨过他的命运坎坷。在一些人看来，他已经过得够好了，没有理由怨天尤人。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探究事情的真相，没有必要把路上每一块石头都翻过来看看，也用不着整天荒废时日，为那些本来可以有所改变的事情而忧心忡忡。那样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丝毫益处。

有时为了控制思想情绪，不得不在自己身上狠狠地掐一下，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样做值得，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某角落一篮子刚孵出的鸡，或者能听到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鸟儿的歌唱。只要我们的灵魂能长期静谧安详，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都会让我们感到快慰。

来这儿的路上我有点感冒，所以一坐下来就点了份儿热汤；服务员很快就端了上来——因为我是这儿惟一的一位顾客，其余的12张餐桌全都空无一人。

村庄里有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绿油油的河岸构成它与其他村庄的天然界限，小河对面是比温弗德村庄。几十户人家的房子拥挤在几条古老的街道两旁。我简直不相信，这里居然住着两百多村民。我问女服务员，她说她也不大清楚。从她的表情看，也许是觉得人数太少了，自己不好意思承认吧。这对我来说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记得我刚到雷克雅未克的时候，要是有人问我冰岛北部村庄考帕斯克尔（我生长的地方）有多少居民，我要么夸张地说一个数

字，要么一问三不知。

我们的车慢慢开过桥，驶进村庄，在我们遇到的第一幢浅绿色房子前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停车场，房屋的正面挂着标有“BP(英国石油公司)”的牌子。当时我感觉有点饿了，可司机说他要检查检查油箱，加一点油，于是我们离开那段颠簸的土路，来到这里。司机早已准备好了他自己的午饭，于是我让他一个人留在车上，独自走进村庄找个地方买点东西吃。有家饭店离这儿不远，顶多不过四分之一英里。我的感冒是因为天下雨引起的，而我却又把大衣放在了车的后座上，于是我只好加快步伐。我知道如果不赶快找个地方避避，这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会把我浑身淋透。我当时一定走得飞快。待我一溜烟冲上马路时，卖面包和杂货的老板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喝了一碗汤后，我感觉全身暖和多了。我喝完汤以后，服务生又给我端来味美可口的煎蛋饼，这更是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它很快让我想起一个有关庞德夫人的故事：她在诺曼底开了一家饭店，并以卖膨松细嫩的煎蛋饼闻名遐迩。有人甚至把她做的煎蛋饼比作水上芭蕾舞演员。于是，自然就有些游客专程慕名来到圣米希尔山，为的是一饱口福。而猜一猜庞德夫人到底使用了什么魔术般配方做出那么好吃的煎蛋饼，成了人们的一件乐事。有人说她在搅拌鸡蛋时加了水，有人认为不是加的水，而是加的奶油；还有人坚信那个神秘的配方其实就是鸡汤。直到1932年庞德夫人退休以后，她的一位同乡罗伯特·韦尔才想起给她去一封信，想解开这个谜。她的回信发表在《餐桌》杂志上：

亲爱的韦尔：

来信垂询煎蛋饼的做法，兹述如下：

把蛋打入碗中，快速搅拌均匀，在煎锅上抹些黄油，把蛋倒入煎锅，然后反复摇动煎锅即可。

我真心希望这份儿食谱对您能有所帮助，先生。

安娜特·庞德

煎蛋饼十分可口，再加上一杯葡萄美酒，使我一直暖到心里。安东尼最后终于同意留下来，不去送我上船（他一直拉着脸，像在抗议着什么，可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临别前，他建议我记一本旅途日记，他说写旅行日记可以让我很好地度过这段旅程。日记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可以排遣心中的郁闷。事实上，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只是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事，连安东尼都不知道。所以，我倒是乐于接受这个建议并收下了他赠送给我的一本日记簿。那是一本精美的日记簿，纸张很厚，而且很光滑，是用皮革线装订的。

干完一杯葡萄酒之后，我发现天气慢慢地晴朗起来。顷刻之间，阳光射进我旁边的那扇窗户，照亮了整个房间；那些空着的桌椅、那本日记簿、我的双手和墙上的那幅浅蓝色背景的白马壁画，全都沐浴在阳光之中。我的感觉好极了，一大早困扰我的疑虑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对这次旅行又充满了信心。放下刀叉时，我看到那个蹬三轮车的小孩儿又从窗外经过，他小心翼翼地在满是泥泞的路上穿行。我打算把这件事记下来，于是在本上画了一幅画：一个小孩儿蹬着三轮车，一位妇女坐在窗前观望。我粗略地勾勒出那位妇人的轮廓，但对窗户外面的那盆郁金香却进行了较为仔细的描绘。

上午，我们驱车经过一个农场时，我想起了在考帕斯克尔度过的童年。我看到两个小女孩——我想应该是姐妹俩——在路旁不远的草地上玩耍，稍大一点儿的女孩儿顶多不过十岁，另一个看上去比她差不多要小两岁左右。我不禁回想起我和妹妹乔朗恩童年的岁月：我们也经常坐在草地上，玩耍着雏菊花。上午，我没有过多

地去想这些事情，也许是因为我感觉还稍稍有点晕车，所以不打算想更多的往事。但现在我却乐于去回忆往事。我要记录下童年的一件件往事，把它们都记录在安东尼送我的那本精美的日记簿里。反正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只能坐在窗前无聊地望着窗外。

我叫服务小姐给我再来一大块奶酪，一杯葡萄酒。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仅仅一个煎蛋饼，一杯美酒和从半开的窗户透进来的几缕阳光居然使我的情绪瞬间高涨起来。

妈妈怀孕了，那天早上他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的时候，我听到她告诉爸爸，她快要临产了。确实，我一眼就看得出妈妈快要临产了。现在的她就像当初生弟弟卡里的那样，行动不便。

我十岁，在家里排行老大；妹妹乔朗恩九岁，我们俩从小就是要好的朋友。当然，还有弟弟卡里，他还不到四岁。

我并不希望再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因为我知道，如果再添一个孩子，就得让我来整天照看。乔朗恩会尽量帮我，但我却要被妈妈"委以重任"。

我鼓足勇气表示抗议时，妈妈说："你是最大的一个，我们谁都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

乔朗恩小的时候就是我照看的，现在我又得照看卡里。我并不是不喜欢他，只是不管到哪里都得把他带上，这实在是有点儿不便。更糟的是，他现在越来越烦人了。昨天，本来我和乔朗恩打算谈谈心，可他却使劲儿打我们卧室的门，还大喊大叫。连楼下的女佣都能听到："我想要我的画儿!"他尖叫个不停，"我要我的画儿！"乔朗恩床头挂着一幅画儿，上面画的是一列火车。"我要进去看我的画儿！"

我现在感到有点儿焦虑不安：父亲到邻村看望病人去了，我想妈妈也快要临产了。我看见父亲骑马跑下山，干燥的路上扬起滚滚



尘土——已有将近三个星期没下雨了。他常走那条小路，马儿都已熟悉路了：顺着那条古老的河床一直走到尽头，又沿着红色山丘脚下的小路进入山林，再往东边那块不毛之地走去。

但这次，飞扬的泥土似乎一下子就把他给吞噬掉了，我感到非常害怕。我用手遮住刺眼的阳光，一路追赶过去，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消失了。我停下脚步，喘着气，脑子里想象着他正微笑着对他的马儿和天上的云朵讲话。我稍稍冷静了一些之后，决定沿路返回到山坡上去。

“出事儿了吗，迪萨？”乔朗恩问道。我建议和卡里一起去码头看看。

“没什么事儿。”我说，“咱们去看看有没有海豹。”

我们慢慢地走着。路上经过一家公司，那里要下午三点钟才开门，又经过一些晾晒东西的旧架子，还有停在旁边的渔船。我们之所以慢慢地走，是因为我总觉得妈妈在喊我们。我每次听到有人喊叫，就停下脚步，扭头看看后面，然后又继续往前走。

码头上一片荒凉，有时甚至让你觉得这个村里住的只有鬼魂，没有一个人影。我们一直走到尽头，看到海蜇和成群的鱼苗。然后，我和卡里便坐在岸边的一块大岩石上，乔卡（妹妹的昵称）则在一旁熟练地玩打水漂。我心不在焉地看着乔卡和海湾上那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海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父亲六点钟以前就会回家。

我想我得五点钟以前把牛群赶回家，还得早一点把卡里带回去。我打开前门的时候，女佣人走下楼来告诉我说，妈妈已经躺下，“刚刚躺下。”她说。

她把乔朗恩和卡里带进了厨房，让我先去照看妈妈，再去管牛。另一名女佣人正在楼上伺候着妈妈。我极不情愿地上了楼，我多么想能够跑到外面去，离开这幢房子，走得远远的，直到一切都结束才回来！

刚开始，妈妈并没注意到我就静静地站在门口，她脸上和眼睛上的汗珠，都告诉我她正忍受着分娩的痛苦。她时不时疼得蜷曲着身子，女佣人不停地给她擦着脖颈、胸部和前额的汗水。我知道她很快就要疼得尖叫起来。这时候，妈妈忽然看见了我，示意我到她身边去。她冲我笑了笑，表情既有点奇怪，又有点勉强。因为痛苦，她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她吻了我一下，说："你不是要去赶牛吗，亲爱的？"然后又抱住我反复地说着："我的乖女儿……"阵痛袭来时，她把我抱得更紧，让我感到浑身不舒服。于是，当她一松手，我就赶快逃跑了。

牛群像往常一样，仍在长满石南的山梁上吃草。见我来了，它们便和我友好地打招呼。我不想急着回家，一路上，我对牛儿们悄悄地说，我以后不会要孩子的，永远也不会要。它们似乎略表同情地点了点头。我们沿着牛走过的小路慢慢走回来时，父亲已经到家了。我顿时感到浑身轻松了。

我、乔卡、卡里还有女佣们都在厨房里吃饭，父亲则在楼上陪着妈妈。我漫不经心地挑拣着饭菜，竖着耳朵听楼上的动静，可什么也没听见。吃过晚饭，卡里上床休息，乔朗恩和我还有一名女佣人一起来到牛舍，女佣人让我赶回房间去拿她丢在那儿的扫帚。正当我弯腰去捡扫帚的时候，我听到了楼上的窗户里传出来的第一声尖叫。

尖叫里蕴含的痛苦简直难以言表。我跑了起来。"你要去哪儿？"乔朗恩在我身后喊道，但我没有理会她。可我感觉得到，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直到我消失在山脚下。可当时我还是停不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奔跑，越过古老的河床，绕过沼泽和小溪，一直跑到峭壁下的温泉。每当我需要独处时，这儿就是我的容身之所。

我趴在地上抽泣，好像世界末日到了。最后，我止住哭声，翻过身来仰躺着，两眼凝视着天空，倾听小溪的潺潺流水声。小草在微风中摇曳，轻轻地拨弄着我的脸颊，我渐渐地平静下来。我以后绝



不要孩子，绝对不要！

过了一会儿，天空开始向我压了下来。我看到它仿佛落到地上，并将我盖住。我感觉一阵颤栗迅速传遍我的全身，随后便是一种吉祥的感觉，像是进入了天堂一样。我想，当时我肯定是睡着了，紧接着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事情，就是父亲正在亲吻我的脸。

"我想在这儿我准能找到你，迪萨，"他把我搂到怀里说，"你又添了一个小妹妹。"

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天空又恢复了本来面目，火红的夕阳映照着天边的几朵晚霞，映红了整个天空。突然间，整个天空弥漫着一片恐怖。我浑身颤抖，把脸埋进父亲的脖子里放声大哭："我不要妹妹。"我哭喊道，"我不要她，我不想回家，你们别理我！"我在父亲怀里挣扎着，不停地捶打他。他没有吱声，把我搂得更紧，我不停地哭闹，最后好像精神错乱一样，一个劲儿地说着胡话，完全失去了理智。我听到自己一直都在说我那天早上在岸边看到的一个苹果；我说那个红苹果是我在两块岩石的缝隙里发现的，但却忘了把它捡回来；我说我想回去把它拿来；我说我不想回家，永远都不想再踏进家门。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岸边的那个苹果，那个在两块黑色岩石中闪着红光的苹果。"我忘了把那个苹果拿回来，"我哭道，"我忘了把它……"

父亲帮我脱掉衣服，坐在我的床边，直到我进入梦乡。第二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床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玻璃做的闪闪发光的红苹果。

冬雨绵绵，整个世界好像变小了。大地让人感到忧郁而沉闷。小河里正在上涨的流水与被雨水淹没的田野融为一体；远远望去，小桥几乎是形同虚设。这样的天气，我有时也会出去走走，观看那川流不息的河水，听听潺潺的流水声。连续几天的雨使整个空气变

得湿漉漉的，我听腻了雨点儿敲打的声音。

一走到桥上，我就能看到老马歇尔小屋旁的马厩，那儿已经没剩下几匹马了。最近几年，我们只养了三匹马，但他却喜欢它们，我也觉得养几匹马对他也是一种慰藉。有时候，我一走到那儿就想起当初结核病流行的时候，我和乔朗恩被迫睡在马厩里的那段日子。

妹妹比约克患结核病时才刚刚一岁。她最先患上，一周后卡里也被传染了。我和乔朗恩侥幸逃脱。为了不被传染，我们只有睡在外面的马厩里。卡里的病逐渐好转，后来终于彻底康复了。比约克却未能幸免。我不止一次地求父亲答应，让我在比约克的最后几天坐在她身边陪伴她，可父亲坚决不同意。我为此难过了很久：她死前我竟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十一月初，尽管我和乔朗恩都参加了比约克的葬礼，可我对葬礼已经没多大印象了。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为她的死而深深自责过。我曾经对父亲说："我不想再要一个妹妹。"在我精神错乱的时候，我惟一记得清楚的就是"我不想要她"这句话。

走近马厩，所有的马都扭过头来看我，我甚至能看清它们的白眼球。我刚要开门，却又想起了厨房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处理，于是马上调头，朝小桥快步走去。

在过去的年月里，我到过许多地方，而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自言自语地说："以后一定还要来。"这些年来，这样的地方已越来越多：可能是一家既能用餐，又能欣赏到泊船的港湾的饭店；可能是丛林中的一片空地；或许是一个山村；也可能是海边白色的沙滩。"我以后一定会再来的。"我心里这样想，甚至有时会在日记本上涂画几笔来提醒自己。但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旧地重游的梦也开始逐渐消失了。

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在提及下面的事儿之前，我得事先声明它



并没有在我心里占多大分量，只是我们刚好路过一间温室，它使我想起离我们的房子不远的那些温室。雅各布经常从那儿买花给我。我们每次在田野上漫步回来，都会有意无意地在那里停住。于是，雅各布就说："等我一会儿。"我有意不理会他的话，他却假装相信我的样子，认为我并不知道他是去给我买花。不一会儿，我就会看到他跑来对我大声说："给你一个惊喜！"然后把一束鲜花递给我，"哇！"我装出一副目瞪口呆的神情，一把搂住他亲吻了几下。

回想起那些曾经去过的地方，我似乎已不再感到悲伤。我知道，为生命中的一些短暂的时光而遗憾是毫无用处的，对此谁都无能为力。于是，我只是努力地回忆雅各布给我送花的情景：红色的郁金香，白色的紫罗兰；想起他的微笑，他那双强壮、被太阳晒得黝黑、却又如此细心温柔的大手。我沉醉在往事的回忆中，忽然，我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我想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和雅各布住的那个村庄离迪通饭店不远，开车顶多半小时，但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任何机会回去看看。

我一直以为，男人比女人更害怕死亡。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即使有那么一天，我也不想更多地去了解它。我想我死之后，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也就是说，我并不指望世界的彼岸有什么东西存在——哪怕是黑暗的世界；只希望是一片空白，浩渺无垠。当然，如果上帝能从天堂（就这点来说，我可并不想抵达另外一个终点）给我赠送一个小册子，里面有美丽的插图和详细的文字描述，他为我们这批选中人天堂的人赐福，我自然是再高兴不过了。只不过，无论是通过信使，还是在睡梦中，我从未收到过这样的福音。所以我坚信，生命消亡之后将会是一片空白。

几星期前，这里闹了一次流感：流鼻涕、咳嗽，许多人卧床不起。

我幸好没被传染上，安东尼却染上了，而且症状不轻。我倒蛮希望自己能躺在床上边品茶边读书，安东尼他们则围着我转，所以我向万能的上帝祈祷由我来替他承受这一切，只是，就像上帝常常忘记送给我那本关于幸福的小册子一样，我的祈祷也只是痴心妄想，永远没有回音。

安东尼仍然卧床不起，我以为他不久将要永别于人世了。从他病倒的第一天起，他就在希望与恐惧中挣扎：他希望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病毒感染，二十四小时后就自然会康复，但他又害怕患的是不治之症。他每小时被测一次体温，似乎一天比一天烧得厉害。最后，他心中的恐惧明显战胜了希望。他那忧伤的神情让我感到，他心目中已列出了那些他将要去怀念的事：春天清晨渗进花园的那几缕微弱的阳光，盘中的无花果、韭菜拌山鸡，还有美酒一杯，好书一本。那天晚上我进来看他的时候，还发现他哭了！

无论雅德雷医生如何解释，安东尼就是不信。"我能从骨子里感到，"他对我说，"我快要离开人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迪萨。"他的语气很是伤感。"你知道，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是不是？……"坐在他床边，我实在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看到他自怜自惜的样子，我不禁觉得有点好笑。在他渐渐康复的过程中，他的感情也显得很复杂。恐惧把他折磨得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虽然他为重新回到这个世界而高兴，可同时却也有一点腼腆和尴尬。

我曾经做过一件不该做的事。我自己也不知什么原因。平常我不太喜欢和别人开玩笑，安东尼也承受不起别人和他开玩笑。但那天厨房里似乎一切都不大对劲儿：我们订购的羔羊肉根本就不符合我的要求，我们一直等着用的蔬菜迟迟没有送来。我厌倦了这里千篇一律的劳作，我反复问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缺乏生活品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想方设法把一家旅馆搞得像模像样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缓和气氛，安东尼像往常一样对我说："这样的事总会发生的，你以前不是也都经历过这

些吗？我劝你别给自己找麻烦了，亲爱的。”

我一分钟都不想在厨房里呆下去了，于是我便跑到楼上去静一静。他也跑到楼上来劝我，并顺便换了一件衬衣。当他光着上身从浴室里走出来时，我觉得他好像也有点忧虑。

“我背上有个斑点。”他说。

“是不是胎记？”我问。

“它好像还在长，比以前大多了，而且边缘也已不大整齐。迪萨，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希望……”

往常，要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哄哄他让他安下心来。这次我根本听不下去这些，只是随便应付了一下。

“也许你说得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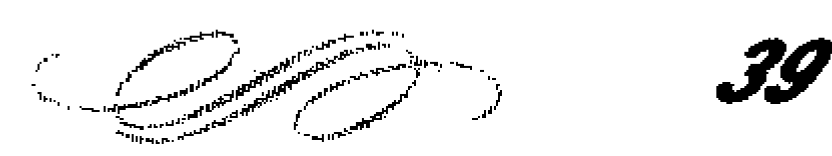
这下可说错了话。他赶快跑回浴室，在镜子前面极力想扭过身子，看着那块其实不过是一块不会带来任何危害的胎记黑斑。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他问道，“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它在长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赶快告诉他，那块斑根本就没长。安东尼却不信，认为我不过是想让他宽心。但是，当我跟他说起刚才我被惹恼了时，他却又不知所措，就像一个小孩儿对妈妈开的玩笑感到害怕似的，而他自己压根儿也弄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跟他开这个玩笑。

我向他道歉，他尴尬地笑了笑，然后我们手牵手走下楼梯。我从他紧握的手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脆弱。

途中我不由自主地注意起车外的电线杆来。它们排列在公路的两旁，继而向西蜿蜒延伸，然后跨过逶迤的牧场，翻过连绵起伏的群山，消失在无尽的远方。坐在那辆美洲豹牌车里，我感觉很是舒适。司机一直在跟我讲他儿女的事儿。我闭上眼睛，路边的电线杆



似乎还在我头脑里晃动。我觉得自己似睡非睡，好像漂浮在缓缓流淌的江面上。我突然发现自己和妹妹乔卡一起坐在开往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公交车上，到商学院去报到。离开这个冰岛北部最大的城市——阿库雷里后，我们一直在聊天，现在我们两人都静静地靠在座位上，望着窗外的景色。

前面那座低矮的小山丘上有一座废弃的农舍，农舍门前坐着位老人，口里嚼着稻草。路旁不远处有一群羊在吃草。我们的车走近那群正啃着青草的羊群时，它们都抬起头来望着我们；坐在门前的老人依然凝视着秋天海湾里那片沉静、昏暗的海水。海湾的左侧是陡峭耸立的悬崖峭壁，乱石密布的山坡上零星点缀着一片片石南草。这个地方和遥远的冰河地带一样，都是神话中侏儒和巨人出没的地方。海底还躺着我的两位前辈：我的外祖父和舅舅。他们是冬天在这里捕捞鲨鱼时丧生的。祖父经常把鱼肝油卖给丹麦人。我母亲小时候常常拿着用鱼肝油换来的金币玩耍。我一直在思念着我的母亲。

前方出现一片沼泽地。我们的车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前行，一路上颠簸得非常厉害，有时简直无法忍受。但看到车窗外的电线杆一个接一个，忽高忽低地跳过的情景，却让人感到一种乐趣。当我们经过最为平坦的一段公路时，那些电线杆又让我想起一些人，那些为人正直，表情严肃的人们。

父亲的老校友维尔嘉摩尔是最高法院的一名律师，他领我们吃了饭，又把我们安排在嘉达斯特拉提街 9 号宾馆的一间客房里住下。这家宾馆是由丹麦人奥尔森夫人开的。

我想好好准备一下入学考试，父亲也尽可能帮我们复习功课。我和乔朗恩相差一岁，可今年秋季，我们都将上一年级。爸爸和妈妈经常送我们一块去学校上学。当然，我想上高中，可妈妈说那对于女孩子来说不合适，于是也就只能如此了。

乔朗恩睡着了，她的头枕在我的肩上；我也靠在她身上，闭上眼

睛。

亲爱的妈妈:

昨天,我们随船给您寄去一封信,只是时间太短,没能把卡里的鞋子一起寄去。那双鞋花了19.50克朗,我们实在找不着比这更便宜的鞋了。很不巧,今年秋天似乎没有任何大甩卖,不管是鞋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都一样。昨天,我、乔卡、奥尔森夫人的女佣艾娜和表姐迈娜,我们四个人一起玩了惠斯特牌。迈娜长得很是小巧,不太听话,别人吃饭时她总是在旁边捣乱。吃晚饭以后我们全都去奥尔森夫人的姐姐汉森夫人家。汉森夫人是一个寡妇,与她的女儿住在一起,我们在她家玩得很高兴,只是回来的路上恰好遇上了瓢泼大雨,我们全都被淋得像落汤鸡。

在昨天的信中,乔卡忘了告诉你我们隔壁的邻居:她是一名老内科医生的女佣。她是和这对夫妇的养女一起到这儿来的。在我们另一边儿住的是两名德国妇女和一个小男孩。有两名牙医也在这里吃饭,还有两名丹麦男子,一名丹麦女孩儿,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冰岛女孩儿。另外还有两位在办公室工作的女职员,两名女裁缝和另外一个不知道干什么工作的男人。我们每月只付100个克朗就能享受这里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我们很幸运。

爱你的女儿 迪萨

1934年9月21日

附:奥尔森夫人的烹调技术真是不错。来到南方雷

克雅未克的几周时间里，我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上周星期天，我们在烤箱里烤了一盘羊肉，还炖了一锅鲜汤，在调味料里放了一些红醋栗果冻。整顿饭的味道美极了。奥尔森夫人向我道出了她的秘诀：不要把肉在烤箱里搁得太久。我们把肉取出来的时候，中间还是鲜嫩的粉红色，口感脆嫩，有入口即化的感觉。

我知道你从不支持我的这个爱好，但别担心，我保证这绝不会影响我做簿记。尽管做簿记确实让我感到厌烦……那肉吃起来有点石南的味道。

最近刚刚寄来的一份轮船公司的资料，使我了解到这艘宏伟的古尔弗斯号轮船是我们国家的骄傲和自豪。我自然很高兴。由于我不愿意乘飞机，除了乘船，别无选择。我最近一段时间常常说，我并不怕死，所以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如此讨厌坐飞机。

我收到的那本小册子上说，古尔弗斯号船高 330 英尺，宽 48 英尺，船舱分为 3 个等级。这艘船总共可容纳 210 人：其中头等舱 104 人，二等舱 62 人，三等舱 44 人。轮船公司还向人们炫耀他们船上的工作人员和乘客的比例：几乎每三名乘客就配有一名工作人员。除了乘务员和乘务员助理外，船上还有 7 名女服务员，9 名餐厅服务员，2 名酒吧服务员，2 名酒吧招待，另外还有包括厨师在内的一帮厨房工作人员。船从哥本哈根出发，途中停靠利思。轮船今天晚上到港，明天下午就启航。这次到冰岛的航程总共需要两天半的时间，只是行程的安排使我们将不得不在船上呆三个晚上。

我想充分利用旅途中的这段时间。首先，我想把我在商学院里写给父母的信再读一遍。乔朗恩去世以后，她的丈夫冈纳在床边桌子上的一个信封里发现了那些信，便把它们寄给了我，此外我自己还想写点儿东西。我打算把我的一些烹饪经验和心得写下来。别

人常常问我一些有关食谱的意见，可我除了写一些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事项外，很少认真地写过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在烹饪中从来就不喜欢照搬条条框框的东西，也不喜欢把科学上的精确度用在烹饪中。对我来说，每道菜都是我表达心意的最好方法，仅凭语言是不能完整地表达清楚的。而且那些规定得精精确确的菜谱，我认为总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人们连做饭都要规定好，我一想到这事儿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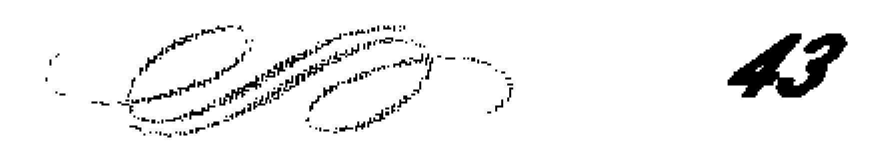
比如说，前天我就在烤鸡里偷偷地加上几颗无花果。我也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加的，因为那时我忽然有种直觉。我想要是安东尼在品尝烤鸡的时候也许会喜欢加了无花果的味道。而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从网球场回来后，他进餐时的表情告诉我，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有时我看到蜜蜂在阳光下嗡嗡劳作就会有一丝感动，于是在做田螺时就加上点蜂蜜；有时树枝上一只唱歌的小鸟会让我想起在汤中加入一些黑刺莓或红醋栗；有时微风鼓起角落里的窗帘布的时候，我就在桂肉烤梨里顺便加上一些乳牛肉。为什么？是不是微风送来了田野的芬芳？是不是它告诉我有人在思念我？

既不能破坏这份雅兴，又不能掀起宁静中的波澜，我如何才能把这种情感诉诸笔墨呢？

当然，总有人能很好地把食谱和烹饪技巧写下来。来到英格兰不久，我就开始读埃利扎·阿克顿的作品。我还喜欢欣赏伊丽莎白·大卫发表在《观察》杂志上的文章。她的作品几乎从不矫揉造作，也不过分多愁善感，从不用诸如“水多肉厚”或“嗞嗞声”之类让人鄙夷的词汇，拿她同《星期日周刊》撰稿时相比，她此时似乎有更大的自由。但这些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都是我个人的想象而已。

亲爱的爸爸：

冬天突然降临。我们正在公园里玩耍，突然开始下



雪。我叫道:“乔卡，下雪了！”“哪儿？”她心不在焉地问。“抬头看看天嘛,”我说，“难道你没发现天在下雪吗？”我们追了一阵雪花,又横穿过马路赶回到湖边的家中。一个小男孩儿向我们走来，他边走边说他很害怕下雪,他独自一人。“我怕下雪,”他说,“那是从天外飘来的东西。”

我们在城里玩得很高兴。昨天我们用将近100克朗买了件大衣,大衣的领子是黑色的海豹皮,海豹皮最便宜(每张17克朗),而且也最漂亮。奥尔森夫人和我昨天做了鲑鱼,我们把整条鱼放到锅里炸,然后放到桌上,点上蜡烛，吃起来。谁都夸这道菜的味道好。他们的表情也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喜欢吃。

妈妈已经问过我两次我和班里的男生关系如何，她不是在担心我永远都不会谈恋爱吧？您可以转告她，我觉得他们一个个都傻乎乎的，不过乔朗恩也许不这么认为。

前天，我在街上遇到了维尔嘉摩尔·博格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走在一起,他看上去醉醺醺的。

爸，您不觉得他酗酒了？谢天谢地，他并没注意到我。

1934年10月28日于商学院

今晚我就住在温德米尔。小玛丽琳——或者确切地说,应该叫做玛丽琳·托马逊夫人——和她的丈夫在这儿开了一家乡村别墅，名叫霍尔别克希尔。三月初,我已决定这次旅行时,我曾写信问过她近况如何，并表示想与她再次见面，重叙友情。我们之间的“冷战”已经有很多年了。这次我专程去和她言和，摒弃前嫌，重归于



好。她给我回了信，邀请我去利思时，一定要到她那儿住上一段时间。她信中的措辞小心谨慎，但我还是能从字里行间隐隐感到她的一片诚意。

去霍尔别克希尔途中，看到道路两旁的树木拖着长长的影子，像是被砍倒了似的，横躺在通往霍尔别克希尔的狭窄的马路上。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只字不提上次争吵的事，可她最后还是提起了这个话题。

我之所以一直喊他“小玛丽琳”，是因为她来我们这儿工作时还不到二十岁。她身材瘦弱，骨架很小，比起同龄人来，她发育算是较慢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本来姓斯特勋。在这儿工作的头一个月，她是一名房间服务生，帮忙洗洗东西，打扫打扫花园。这些工作干起来很累。其他女工们都自己想办法放松放松：逛逛商店，玩玩宾果游戏，打打纸牌，或者去跳跳舞什么的。玛丽琳却不像他们那样，她不喜欢玩儿。一有空闲，她就到我的厨房来。起初她只是不动声色地站在我旁边，专心致志地看着我做菜。不久，她就开始帮我的忙，打打下手。她生性温厚，干起活来乐此不疲。我非常感谢她的帮忙。

要想雇佣几个女工到厨房帮忙很不容易，这比找清洁工还难。几个月以后，小玛丽琳便完全由我调遣了。我一直以为，想当厨师得先学会干厨房里的其他杂活。于是，最初几周时间她只是帮我洗洗碗碟，做做清洁；几周以后，她就开始帮我准备饭菜了：洗菜、切菜、净肉、检查菜坛子里有没有放香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无论大事小事，在别人眼里不管有多么乏味，她都能认真负责地把它做好。

她干起活来总是任劳任怨。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点，是因为我见过很多在厨房里做帮工的女孩儿，她们干不了几周就会跑掉。但我得告诉你，我并不是说话武断。当她被自悯自怜之心冲破头脑时，我就建议她读读乔治·奥威尔写的《伦敦巴黎沉浮记》一书。我自己则在很久以前就习惯于承受生活的压力了：恩师西威辰和布勒

斯丁历来都不会对谁大发慈悲，也不会特别照顾谁，但我却从来都是毫无怨言。是的，我从来不牢骚满腹，怨天尤人。

六年来，小玛丽琳一直都是我的得力助手。我尽心尽责地教她，她自己也确实很有天赋，慢慢就不再需要我的指导了，她甚至还能读懂我的心思。在我还没有开口说要锅时，她就已经把锅递过来了。我觉得西红柿上那片罗勒叶不妥，她就会把它拿走换成另外一片。所有这些，都不再需要我开口，我们的工作配合默契，完全是心心相印。我敢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双方都感到非常开心。

但就在这一切顺利发展的时候，暴风雨突然来临。长期以来我都习惯在主楼东边的温室里迎接新的一天到来。那蜿蜒起伏伸向远方的草地和田园景色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我甚至习惯于看小溪对岸赫尔姆戴尔地产上的两间小屋，起伏的灰色屋顶，半掩半开的门洞里面一片漆黑。那天早上，我在那儿没坐多久，马丽琳出来了，并走到我身旁坐了下来。当时肯定不过六点一刻，阳光像一层薄薄的霜雪，覆盖着整个大地。我们就这样紧挨着坐着，谁也没有说话，享受着这份宁静。我沏了一杯茶给她，这时候她才开口："我要结婚了。"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晴天霹雳。

毫无疑问，她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才没有将茶杯掉到地板上。我从来没有见到她和任何男人往来，而且认为她一直很正常，因为没来我厨房干活以前，她几乎都是呆在家里。她要么在温室里读书，要么到外面散散步，要么就是打理一下花草。可现在，她的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不能没有她，盛怒之下，我吼道（也许比我想象的更为粗鲁刺耳）："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的话把她吓得目瞪口呆。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理智一些，于是努力改变我说话的语气，"他是谁？"

"威廉·托马逊。"她很简短地答道——但事实上我想她说的应是"威廉·托马逊先生"。



得了得了，我心里嘀咕着，接下来你就要称他为“阁下”了。我说话竟有点迟钝起来。于是，我只是问了一句他是干什么的。她解释说他是温德米尔湖畔地区的一名市场蔬菜商，他的货在那一带声誉比较好。玛丽琳最先是从伊丽莎白·大卫发表在《观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他的。后来我们温室里闹了一次灾害，急需青椒和其他 一些蔬菜，于是不久他们便联系上了。他们在电话上聊得很是投机，不久又开始定期通话，再到后来玛丽琳便亲自上坎伯利亚去看他。只不过我当时总以为她要过去是和她亲戚一起住的。

“你真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吗？你觉得嫁给一个你几乎一无所知的人，而且还要随他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住理智吗？”

她说她爱他。

我不禁又想了想这事儿，说：“你在蔬菜这方面也有了不少的经验，是吧？”

她站了起来，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本以为你会理解我，以为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惟一可以让我信赖的人。”说完便转身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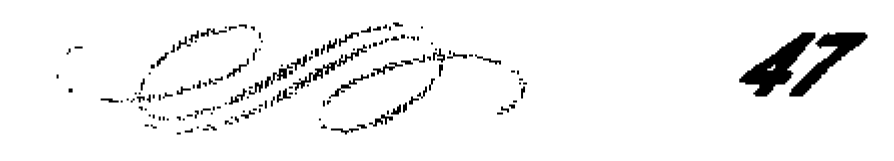
“玛丽琳！”我紧跟在后面叫她，“玛丽琳！”她没有回头。

初升的太阳使温室里逐渐变暖，但茶却早凉了。

一个月后她离开了我们。临走时，我让安东尼代我送了她一条从外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项链，我自己因感冒卧病在床，没能下山去为她送行。

亲爱的妈妈：

我们开学已有一周半时间了，我们的新教学楼在顶层。新教室比去年的教室光线要好，也要暖和一些。从我们坐的地方往窗外看，可以看到外面优美的景色。我们的课程和去年一样，只是多开了一门商品学课程。这



门课简直无聊透顶，但我并不打算过多地说这些或者是有关簿记的事儿，免得让你又放心不下。

我还没告诉你，我们的船停靠码头时，我一眼就看到了鲁玛，她边挥手边喊："迪萨，回来啦？"我一上岸，她就向我奔跑过来。

"暑假里你瘦了，"她说，"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后来我又听到其他人也说了类似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去取我那顶改过的帽子了。乔卡到哈夫纳夫约杜尔商店给我们买拖鞋。只有在那儿才能买到真正合脚的鞋。

别的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代我向那些女孩们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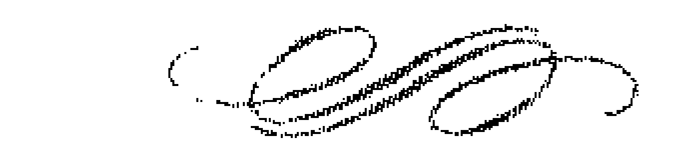
爱你的迪萨

1935年10月17日

附：的确，目前我正在博格宾馆的厨房里帮忙，上封信我竟忘了提起这事儿。很幸运奥尔森夫人认识这里的男主厨西威辰先生，他让我在每周五、六晚上做兼职。我知道从他那儿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上周末，菜单上有鱼汤和牛排。本周星期六要举办一个宴会招待来访的西班牙官员。西威辰要给他们做鹅肉吃，还有饭前开胃的松鸡肉汤。我真希望那天会快点儿到来。

你放心，这不会影响我的学习的。周五、周六晚上其他女孩儿绝大多数都要出去，他们有的去看电影，有的去溜旱冰。

小玛丽琳走后的那晚我整夜没合眼，快到午夜的时候下了

一场暴风雨。那棵古老的白杨树枝条在狂风中直打着房子的三角墙，倾盆大雨不停地敲打着窗户。我向来都认为白杨树对我很友善，它好像认识我似的，每当我外出散步时，它就要跟我打招呼。各种各样的小鸟都到它的枝上来栖息。记得有一年夏天，在它上面曾同时筑了三个鸟巢。整棵大树就像是一个社区，而成员之间却又是那样的和谐融洽。只有现在，树枝那么使劲儿地抽打着房屋，使我感到焦灼不安，我忽然觉得像是有人正焦急地想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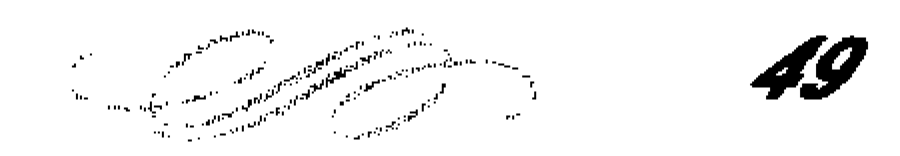
自从那次在温室里谈话以后，我和玛丽琳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疏远了。我躺在床上扪心自问，是不是我对她不好？是不是出于嫉妒才对她那样？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干吗不设身处地替她着想呢？我是不是应该向她表示祝贺，而不应让她感到她所理解的爱最终只会给她带来不幸呢？从床上坐起来，我又一次地问我自己，是不是我的言辞有什么过激之处呢？

我试着使自己冷静下来，可窗外的暴风雨声却令我感到害怕。我透过窗帘之间的缝隙看着外面的闪电，接着又听见震天的霹雳。我企图从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思考问题。我所得出的结论仍然相同：我之所以那样做，首先是因为我关心她。当然也有为我自己考虑的一些因素。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几乎超过了其他所有人。我不敢想象失去她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对她就像是对待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所以，当她突然告诉我那让我震惊的决定时，有这样想法的我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如此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此的无情。

是的，毫无疑问，她太令我失望了。我想她自己也知道。我曾经当着她的面有意识地对肖恩·特鲁洛夫说："有些人只考虑自己，不为他人着想。"

打那以后不久，她主动要求多呆几天，我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再麻烦她了。

思前想后，我觉得虽然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我可能会过



分地吹毛求疵，但总起来说，我对她够好的了。我确信我是出于对她的终生幸福考虑才有如此举动——至少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小玛丽琳走的那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天快亮的时候风停了。破晓时分，我穿上衣服，打开窗户。我感觉很疲倦，一股暖风吹进来，丝毫也没有让我感到清醒。于是我来到楼下的厨房里，点燃一支雪茄，解解心中的郁闷。阳光越过楼板，渐渐爬到我身上。我打开门，一步步地走到外面去接受阳光的洗礼。雨后的泥土散发出迷人的清香，小草在一夜之间变绿，一只小鸟嘴里衔着小虫飞过，消失在东厢房的后面。

我来到白杨树下，靠在它的躯干上。我满脑子还是昨天晚上想的那些事儿。白杨树像以往一样，又让我感到一种慰藉。可现在，我觉得它好像有话要对我说。

我最亲爱的妈妈：

昨天我又到电话局去了，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不得不放弃。他们还是没有接通考帕斯克尔的电话。

如您所想象的那样，那次谈话之后我一直都在琢磨这事儿。爸爸和您在银行给我找了份工作，我万分地感激。我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别的女孩儿都想要这份工作。但经过了好几个夜晚的思考，我还是改变不了我最初的决定。

如果我放弃那个出国进修烹饪的计划，这样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昨天西威辰先生说他保证我能在哥本哈根安格丽特摩4号的一家饭店或者通过他朋友在伦敦的一家饭店里找到工作。想想看吧，妈妈，哥本哈根或是伦敦！我兴奋极了，我亲了亲他的脸，他对我太好了，太照顾我了，他希望能尽快得到我的答复。



不要对我生气，妈妈，拜托您别生气，您知道我是多么地爱您和爸爸。

爱您的迪萨

1936 年 3 月 12 日

爸爸看起来显得疲惫不堪，他第一个从船上下来，走到离岸上还有一半的路时，他停住脚步四处张望一下。其实，这时候我就在离他不到十码远的地方向他挥手，但他却没看到我。他看上去心力交瘁，精疲力竭，一直站在那里，直到他后面的一位妇女推了推，又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才继续向前走。

“你在这儿呀，我亲爱的迪萨，”我向他跑去时，他终于舒了一口气，“我上哪儿都找不着你。”

乔卡正在上打字课。父亲的行李太沉了，于是我们喊了一辆出租车去嘉达斯特拉堤。正当我们要上车时，一个人从我们的车后面跑来，朝我们使劲儿地挥手，试图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的车停了下来。

“医生忘了带走他的包，”那人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在甲板上看到的。”

我们向他表示了谢意，然后上车离去。那人年纪轻轻的，却格外臃肿肥胖，与他的实际年龄不相符。我回过头来看到他佝偻着身子，拖着脚往前走。

我们的车离开码头后，爸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妈妈很担心你。”

我无话可说，只好缄口不言。

“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必要规劝你，让你恢复理智呢？”

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直奔主题。最后我只好用可怜的语气，结结巴巴地说：“啊，爸……”

这时我才从他眼里看到了一丝笑意。他说："看来你是决意做一个流浪的吉普赛人了，亲爱的。"

在车中我们俩谁都没再说话，到了嘉达斯特拉堤街第9号，我帮司机把行李搬进去。爸爸慢慢地走进屋里，他与奥尔森夫人打了个招呼，并谢谢她照看我们姐妹俩。然后，就直接上床休息去了。

那天晚上我和乔卡放学回家时，父亲已和朋友维尔嘉摩尔以及其妻子托兰恩一起到外面吃晚餐去了。他让奥尔森转交给我一封信。我马上把信打开，乔卡趴在我肩上与我一起看信。

波希米亚·阿斯蒂斯·乔恩斯蒂尔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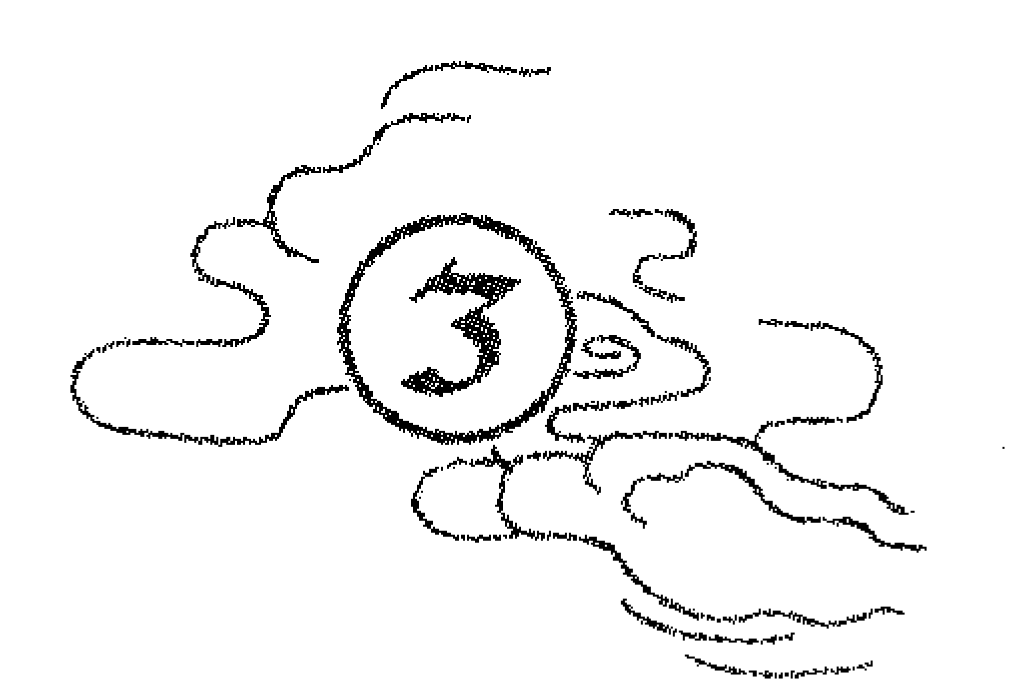
终有一天你会发现生命是如此短暂，我们的时间也极为有限。正因如此，我也不打算再劝你什么了，我知道这样做也是徒劳的，毫无意义，但我得对你提三点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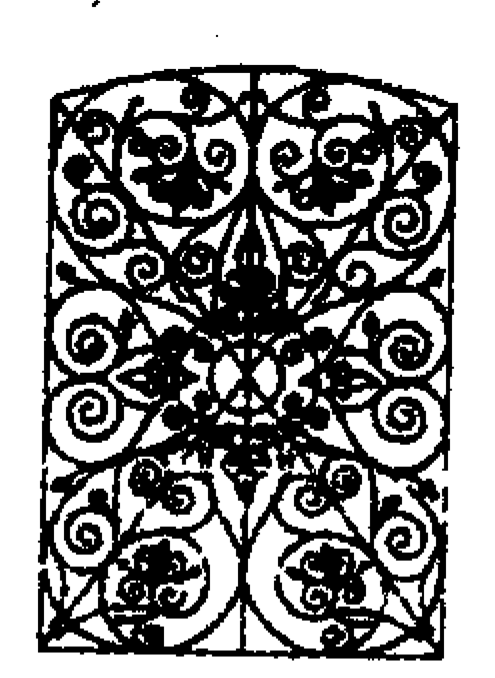
第一，我打算明天就去拜见西威辰先生，最好是两点到四点之间，我想跟他谈谈伦敦那边他为你做的安排，我想单独和他谈谈。

第二，我希望你这次考试取得不错的成绩，也好让你母亲高兴高兴。她确实也应该得到这样的安慰。

第三，我希望你本周六晚上在西威辰厨房里帮忙，同时能出色地表现一番。当晚八点钟我在博格旅馆预定了一桌两个人的晚餐。现在乔朗恩肯定就在你旁边和你一块儿看信，告诉她我很希望能请她做我的客人。

你的父亲


3



一双无私的手，明亮而勇敢的双眼；开朗的笑容，浓密乌黑的头发，挺直的背；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

我这样想着。

每次我凭着记忆勾勒出他的形象时，最先想起的是他那双映照在白纸上的手的轮廓。他手握钢笔，正坐在那破旧的书桌旁，书桌是那年春天我们在市场上狠了狠心才买下来的，一直把它放在朝着花园的那扇窗子下。天已黄昏，我给他的茶中加入热水时，他朝我转过身来，我看见他的两眼在对着我笑。

“雅各布，天黑了。”我打开桌上的台灯说。

轻柔的灯光慢慢地、静静地展开，先是照亮了我的脚，随后在房间另一端的床也沐浴在灯光中。我俯身抚摸着他，他用手指头转动着钢笔，我看见钢笔的影子映在我面前的那张白纸上。

“我们到湖边走走好吗？”

我们没有关灯，手牵着手走出了屋子。当我们来到那些搁浅在岸上的船边的时候，我看到山上那扇窗子里射出昏黄的光亮。我想

指给他看，但我转过身来，发现他已不在我的眼前了。

船上漆黑一片，我的手却在黑暗中抓着他那只手。

服务员给我端来咖啡时，我肯定正在想那金维鸟和沙锥鸟，所以我才没像往常那样马上表示谢意。那顿饭非常丰盛——肉汤、鲑鱼、烤鸭——只是我对进餐时的那些陈规陋习感到大惑不解。船长让我紧挨着他坐，能和他共餐当然是莫大的荣幸。

大约晚饭前两个小时的时候，旅客们各自回到了船舱。我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一位男子走过来与我聊天儿。他也是从苏格兰出发的，不过当时我没怎么注意。

我知道他刚获得了冰岛古典文学博士学位，明年就要在哥本哈根任教授。我没跟他多讲话，只是一个劲儿点头，因为我不想别人打扰我的这份宁静。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并自作多情地告诉我说，现在那些乘客大都休息去了，但过一会儿他们就要从头到脚洗个干净，再穿上他们自以为很靓丽的破烂衣服。他还说，从利思出发的第二天晚上尤为重要，又有一批乘客上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们需要很快摸清他们的底细并想法打动他们”。他说起自己来，仿佛已超然于世俗之外。毫无疑问，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

“您将被邀请与船长共进晚餐，”他说，“并和那批重要的客人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打听你的消息。”

上船时我注意到每位乘客都带了许多行李，有人甚至还带了铁箱。不用说，他们的衣服肯定都是被小心地折叠好，然后又用干净柔软的纸包起来的。我猜测，我所看到的那些小箱子里肯定放的是些衣服刷子、缝纫用具或化妆品什么的。有些旅客还带了皮箱，但没有哪一只皮箱比得上安东尼的。想到这儿，我不禁笑了。安东尼的皮箱里有一些金属小格子，可以放洗脸皂、修面的刷子、洗手皂、

牙刷、牙膏、牙粉等，还有各种型号的小袋子，用来放刮胡刀、梳子、发刷、指甲剪，指甲锉、鞋带、润肤霜、脸霜和剪刀之类的东西。每次出行前，安东尼都会仔细检查一下箱子里有没有东西遗漏，并确保已带上了润肤液，看看刮胡刀是否依旧锋利。他的东西保管得都特别好，每当服务员或挑夫把箱子从汽车搬到火车，或是搬到楼上他住的旅馆的房间时，他总是嘱咐挑夫要格外小心。

不，它们——那些由绅士们带上船的小箱子——都不能与他的相比。我的天啦，看看那些绅士们吃饭时摆的那谱儿：一个个打扮得时髦新潮，他们的妻子也一个个都显得趾高气扬的。很明显，他们是在效仿电影里的安德雷·赫伯恩或维伊雷。

烤鸭的味道不错。但是，服务员端上咖啡的时候，我又在想金维鸟和沙锥鸟。我似乎听到了我在考帕斯克尔的卧室外面沙锥鸟那婉转的歌声，看见金维鸟伴着凄厉的叫声，从路边的沼泽中惊起。

“要咖啡吗？”那名丹麦服务员问我。

我点了点头。猛然间，我意识到要想回头已经太晚了。

那位研究冰岛古典文学的博士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话。他说，等到时机成熟了，他要写一本斯堪的那维亚人航海记。

“那汹涌澎湃的海浪，”他说，“白浪滔天；一束束巨大的阳光，就像一只五指张开的巨手。”

我静静地听着，却根本没见到什么滔天的白浪和汹涌澎湃的波涛。因为，从利思出发后，我只感觉海上微风拂面，温顺的大海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平静。岸上的房屋变得越来越小，海鸥展翅飞向远方，眼前是一团团的垃圾。三个夜晚，我将在船上呆三个夜晚。我要说些什么呢？我又该对他们做何解释呢？

“我找到了《埃吉尔英雄传奇》的真正作者。”博士说。

“是吗？”

“我被邀请在冰岛大学就这个专题举办一次讲座。我得看我有没有时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天空万里无云，强烈的阳光有些刺眼，我戴上太阳镜。为什么我要踏上这次旅行？

“每个人都在打听你的来历，”我听见博士又在说，“我说我也搞不清楚你是什么来历，我对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你。你是不是住在英格兰？”

我找个借口走开了。真是多管闲事。这是冰岛人特有的嗜好。安东尼应该不会把我也归结为这一类人吧？而我这样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我知道他本意是好的，但我的确很想一个人静静地呆会儿。

“她是谁？她住英格兰吗？阿斯蒂斯·乔恩斯蒂尔——你们认识她吗？你们以前有没有人听说过她？”

来到自己的舱室，我把门反锁起来。我闭上双眼，却又害怕睡着了。昨天晚上，我在梦里两次见到自己的模样，脸颊胳膊还清晰可见，但却不见他在我身旁。梦醒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跳才慢慢平静下来。然后，我从床上起来，到浴室里把满身的汗擦干。

“她是谁？她住英格兰吗？”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

我随身带了几本书，几张照片和一些旧的信件，打算在旅途中重温记忆中的往事。

我终于摆脱了那位博士的唠叨，来到船舱——我暂时的避风港。我打开去英格兰的那天晚上父亲给我的那本小书《拯救自己》。书上附言写道：送给年青朋友们的几点建议，以真人真事为例，有成功人士的日常生活为佐证。1892年由雷克雅未克出版社出版，塞默尔·斯麦尔斯任主编，由古夫摩萨奇教区的牧师奥拉夫·奥拉夫



桑翻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见这本书经常摆在爸爸诊所的桌子上。我想他在时运不济时，是否会经常读这本书，以此作为一种慰藉。

“送给你，迪萨。”他给我道别之后，又加了一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把我抱得紧紧的，久久舍不得松开）。“送给你，迪萨，你把这本书放在你包里带走，说不定哪天你会用得着它呢。”

我们的船离开港口，驶出海湾的时候，乔卡和父亲就站在船坞里。我还没走到船舱，他看上去却是那么的瘦弱。有时，尤其是我睡不好觉的时候，很难回想起他的身影。

小玛丽琳和我一直聊到很晚。而我不得不承认，她一直都保持着较高的厨艺。我品尝第一口龙虾时，我就知道这准出自于一个厨艺与我旗鼓相当的人之手。

“快别这么说，”她难为情地说，“我所知道的一切还不都是您教的。”

晚饭过后，我们站在阳台上，倾听着熟悉的夜语呢喃，吃着奶酪和水果——梨、草莓、苹果、樱桃。以前，劳累一整天之后，我们就会坐到温室外面畅所欲言，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细细品味着那寂静的夜晚；而现在，我们又如从前那么友好，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一样。

别墅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温德米尔湖畔，尽管它没有建在较高的地段上，但风景依然美丽。放眼向南望去，可以看到海面和兰代尔·菲尔。今天，我们来得较早，能够看到岸上的蛎鹬，还有正潜入水中抓鱼吃的燕鸥。别墅虽不大，却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让人觉得安静舒适。正如我从照片上猜到的那样，这儿曾经是一位牧师的住宅。司机停车的地方虽是新建的，却并没有破坏这里的风景。整座房子都重新粉刷过。我们不用再去那些供应早餐的旅馆了，司机也可省去一笔费用。当然，我从未想过要去过问他们的收入状况，但就我所知，玛丽琳是和她丈夫一起经营这家饭店的。旅馆的客房也很舒适。小玛丽琳的记忆力很好。

换句话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向所有来坎伯利尔湖区参观的客人们，推荐霍尔别克希尔旅馆。

快到小玛丽琳那儿的时候，我心里居然感到有点儿不安起来。我不知见了她后，该说些什么好。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夫妻俩都出来迎接我们，而且很明显，他们已等了很长时间。玛丽琳抢先司机一步，帮我打开了车门，她丈夫仍站在原地不动。她变丰腴了，但看上去体态匀称，恰到好处。她成熟多了，也更有魅力了。她的笑容和眼神显示出她这些年来一直充满着自信，但她对人却仍是那样的真诚。她上前与我拥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似的。挑夫接过我的行李，并搬到屋里去。我们松开后，她丈夫也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接着又告诉司机把车停到屋后面去，然后就带我们到厨房里去吃点东西。

我住的房间坐北向南。我打开浴室的水龙头，把浴缸里放满水，然后躺在里面。透过那扇敞开的窗户，我可以看见外面的湖水。一只蝴蝶飞进我的房间，绕着我飞来飞去。我满心愉悦地欣赏着那只蝴蝶的舞姿。阳光照在它那薄如纸片的翅膀上，使它们看上去熠熠发光。所有这些让我感到快乐和舒适。我想今天晚上一定会过得特别开心。我感觉到他们夫妻俩生活得非常幸福，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忠贞不渝。我躺在浴盆里，望着窗外的湖水，不禁又想起他们的事儿来。像以往一样，我觉得我错误地判断了他们这桩婚姻。我想了一会儿，感觉有点儿内疚，但仔细一想，我又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对那些早已忘记的事耿耿于怀。重要的是，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美满，这使我感到很宽慰。我从浴缸里起来，迎着微风，擦干了身上的水珠。

穿好衣服之后，我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房间比较宽敞，黄亮亮的壁纸，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绚丽多彩。床边的书桌上

有一盏小台灯，一束略带红色的黄玫瑰，还有一本园艺手册；茶几上有一本介绍这家饭店以及邻近街区的小册子；一个银质的香烟盒，一些干草，还有一本有关烹饪的书。几年前他们颇费口舌地要我来参加编著，要是当时我不参加编写的话，现在我该富裕得多了。晚上，玛丽琳告诉我，饭店里包括楼下那间画室在内的每个房间，都放了这本书。我打趣地问她，是不是想把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都吓跑？

一枝葡萄藤沿着游廊爬到了房屋的墙上，藤上还没有长葡萄，但在月光照射下的绿叶，让人感到赏心悦目。我们吃了顿便餐，喝了杯纯味的马斯卡特葡萄酒。托马逊先生——或者依她叫作比尔——仍留在别墅里没有出来。玛丽琳说他还在和隔壁的一个马夫一起修马鞍。一位腼腆的女孩儿给我们端来了果盘，据玛丽琳介绍，她正在教她如何招待用餐的客人，但这个女孩儿并没有留下来，而是转身走开了，剩下玛丽琳和我两个人。当她端来水果和奶酪时，玛丽琳突然对我说：

"我常常想念我们在温室外面度过的那些晚上。"

我说我也很怀念。

"你曾给了我那么多好的建议，我经常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把它们记下来。"

说实话，我并不记得我曾给过她什么建议，不过，我并不想再去深究那些往事。她看透了我的心思，并对我解释说："也许是您的思想对我所起的作用超过了您给我的那些建议。但我仍然遗憾，没有把您的那些建议写下来，否则就不会忘记了。比如说，那个用苏打水洗澡的人，他认为那样做可以提高他的生育能力。当然，这只是我所忘却不了的其中的一个故事罢了。"

我说我肯定还告诉过她一些比这更有用的东西。

"你还教我如何区分野鸭和家鸭，你说野鸭的脚是红的，而且要小一些。"

我很是惊讶，她却笑了。

“事实上，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寻找红色脚板的野鸭，可是一只也没有找着。”

我们俩都捧腹大笑起来。

那天晚上，我又和她聊天儿，与她一起倾诉往事，感觉真好。她要我就着波尔葡萄酒吃奶酪，但我却觉得那马斯卡特酒更提神可口。于是我们又打开一瓶，喝了起来。我们一边尽情地喝酒，一边欣赏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一直到深夜。她丈夫早已睡了，伺候我们的女孩儿也去睡了。湖面上吹来一股暖风，吹动葡萄的枝叶，游廊旁边儿无花果的树叶，也在沙沙作响。夜色之中，我似乎听到了丁丁当当悦耳的铃声。

“你要给我写信，迪萨，”她突然对我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都可以。”

第二天早上天气较暖和，初升的太阳把薄雾染成了淡黄色，我们与玛丽琳夫妇一起在厨房里吃过早饭后，又开车出发了。我透过车窗使劲儿地向他们挥手告别。我决定在去冰岛的路上写信给玛丽琳。

今天一大早，女服务员的托盘掉到了地板上，哐当一声把我给惊醒了。这时已是将近八点钟了，有人过来帮她收拾。听声音，来人是个男的，他们一边慌忙地清理地上的玻璃、茶匙和陶器器皿的碎片，一边低声地说着什么。女孩儿一定是有些惊慌失措，因为我没有感觉到她有任何动静。也许这是她的第一次工作经历吧。

这件事使我想起布勒斯丁饭店里那位上了年纪的服务员。我打算把这段故事写下来寄给小玛丽琳。我答应过要写信给她，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萦绕，而且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我懒洋洋地从床上坐起来，一看到外面低沉昏暗的天气，我就不想起床了。我觉

得这样躺在床上心里很轻松。在布勒斯丁最初几个月里发生的事，全都涌上心头，但这并没有搅乱我内心的平静。

在一个考帕斯克尔女孩儿看来，1936 年乘船去利物浦简直就是一次探险。乘火车去伦敦让人感到既新奇又陌生。今天早上，我回想起那段时光，最使我感到兴奋的就是布勒斯丁和布朗夫人来迎接我的那一幕了。看到老板亲自在车站来接我，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像父亲一样，和我打了招呼，并告诉我说，他请他的朋友西威辰关照我。正当我想用蹩脚的英语说几句话，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时候，布朗夫人又叫来一名脚夫，搀扶着我的胳膊。

“你就和我住在一起好了。”她对我说，语气很坚决。

“你可得小心点儿，她是要向你收租金的哟！”布勒斯丁打趣地说。他们都笑了起来。

不，回忆往事根本就没有打扰我的平静。让我感觉很奇怪的是，我居然同时又想起了弟弟卡里，他现在就住在美国的西雅图。他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打那以后，我们彼此一直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许是读了爸爸写的那封信，才唤起了我对弟弟的回忆。

“卡里已被美国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了。”我到布勒斯丁餐馆六个月后，爸爸写信告诉我说，“他的成绩远远超过他的同班同学，看来，他今年春天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从阿库雷里中学毕业。”

毋庸置疑，爸爸一直都以他的儿子为荣，为他骄傲。可是从字里行间我能读出他心中的遗憾。爸爸说家里就他和母亲两人，孤零零的。照他的话说，就剩他们老两口儿了。

卡里每年都会寄给我一张圣诞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还有一份英文写的有关去年一年的成绩单复印件。我觉得美国这种习俗有点奇怪，但还是好好保存着这些卡片，并为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而高兴。

我蜷缩在舒适的被窝里，思绪万千。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忘记了那天晚上和玛丽琳在一起时的一个重要情节。我不禁哑然失笑：居然如此疏忽大意。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竟然如此脆弱不堪。是不是我的记忆力太差了？我是不是未老先衰？于是，我又躺下，我和玛丽琳在一起的那个晚上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吃饭时，我总觉得小玛丽琳似乎要对我说什么。她坐立不安，一直都在留意那个服侍我们的女孩儿，生怕她偷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那女孩儿终于离开我们这儿，洗东西去了。不时传来洗碗的流水声和碗碟餐具的碰击声。这时，玛丽琳才冷静下来，语气十分平缓地对我说：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和比尔没有要孩子。"

这个问题——确切地说，这种道白——确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告诉她，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件事儿。虽然我说的是实话，可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得出，她并没有相信我所说的话。

"我不能生育，"她说，"我们已经试过好几年了。"

我对这样的谈话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如有可能，我会尽量避免：要么转变话题，如果有第三人在场的话，我干脆就走开。可那天晚上我却无法脱身，我既不能转变话题，又不能抽身离去。于是，我只好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说他们俩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这是问题的关键，有孩子固然是好事儿，但毕竟不是判断美满婚姻的惟一标准。

她静静地听我讲话，但我知道，她向我吐露这些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我的同情和安慰。我一说完她就凑过来，悄声对我说："我们一直都在考虑领养一个孩子，但我老是举棋不定，迪萨，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比尔说一切由我作主，可我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迪萨，我心里从来没有这样矛盾过。"

我感到更不自在了，不过我还是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担心。



起初她说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领养的孩子会认为他们不是他（她）的亲生父母——“你懂我的意思，”她补充道，“生身父母或者别的什么。”——但后来她又担心，她能够领养到的孩子大部分都来自一些问题家庭，因而这些孩子可能不好管教。

“当然，我对遗传学一窍不通，”她说，“但我总还是免不了有些顾虑。”

她陷入了沉思。我们俩静静地听着外面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风掀起一片片树叶，好像在寻觅一件永远无法找到的东西。我清了清喉咙。我承认，我很难在这件事情上为她出什么好主意。

“但我想，一般说来，母亲抛弃孩子的原因很多吧？”我说，“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没什么发言权的。”

这时她养的那只猫也到走廊上来了，跳上她的膝盖，咪咪地叫，好像也在为主人发愁。说完了这些，她转了话题。但我却开始担心起明天的事儿来，我的苏格兰之行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我想离开静谧而连绵起伏的田野，来到冰雪覆盖的伯德尔山，山谷里那条蜿蜒曲折、怪石嶙峋的小河，还有河边的羊群，它们试图淌水过河。所有这些都使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冰岛。于是，我不禁纳闷起来：我真的准备好了这次返乡的旅程吗？

广场尽头的街上挂着一幅白色的帆布，公园四周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帐篷。我们一下火车就直奔伯爵公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人头攒动的上空那高高耸立的帐篷。如此拥挤的场面并不奇怪：这是马戏团在伦敦表演的最后一个晚上。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还有这么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有的孩子还很小）到这里来。我先被这景象所打动，后来才明白，这里九月中旬的天气原来如此温暖宜人。

“这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布勒斯丁那天早上把头伸进厨房里来

对我说，“昨天晚上，我是开着窗子睡的觉。”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容易着凉，所以布朗夫人禁不住跟他开起玩笑来，问他：

“恐怕你是围着围巾，戴着帽子睡觉的吧？”

他也很爱开玩笑，于是也调侃道：“噢，冰岛来的乔恩斯蒂尔小姐，你是不是在秋天来临前也试过？我感觉我有点像个铁面无私的监工。”

的确，来到英国已经三个月了，我很少出门，而且在布勒斯丁饭店的空闲时间本来也不多。有时候我的压力很大，可我从来就没有抱怨过什么。在当时的伦敦城里，没有哪一家饭店能与布勒斯丁饭店媲美。喜欢到布勒斯丁用餐的人中有演员、政界人士、王公贵族、商界名流，还有城里的一些像里茨、莎沃尔等最有名的酒家的客人也到这里来用餐。要是来晚了，是很难预定到座位的。尽管饭店几乎天天客满，我们还是尽可能想办法给他们腾出位子，满足客人们的要求。

“这可是给詹姆士·赫瑟林顿爵士预定的位置，”他们总会大声嚷着说，“他是由……陪同前来，你们必须想办法。”

“很抱歉！”

可那天晚上我请了假，决定陪我的同事朱丽小姐去看马戏。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布勒斯丁和布朗夫人。

“好啊。”他同意说。

“可以，不过你们一定要当心猴子。”她叮嘱道。

他们俩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我反应较慢，没有马上领会到她所说的“猴子”实际上指的是男人。

有一个滑稽小丑在一个帐篷里倒立行走；另一个帐篷里有一位演员在表演吞火、耍刀，还常常伸出舌头来逗弄观众。我们在小丑倒立行走的帐篷前徘徊了一会儿，看到一位大力士正在观众中找人和他比赛扳手劲儿。我们浏览了每个帐篷的节目后，各自买了一份



冰淇淋，在公园中央的长凳上坐下。朱丽为人随和，我们吃着各自手上的冰淇淋，彼此都很少讲话。当然，小丑的表演把我们大伙儿都逗笑了。还有那位驯狮员，他假装管不住狮子，大声吆喝着说天要下雨了。毫无疑问，我们的交流本应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可马戏团演员的那些滑稽表演和魔术表演使我们看得着了迷，因而顾不上说话了。其实，那些假东西大家都知道，但大多数观众还是被他那精彩的表演征服了。

最后，我们站了起来。朱丽看了看手表后说，她得马上回家了，她回家的路程比我要远。我们分手前，她问我是不是非要乘地铁回家不可，我叫她不用为我担心。她很快走到了公园对面，消失在北门外；而我却决定往回走，从马戏团帐篷的方向走到地铁站去。

我刚刚回到观众中，就感觉到这里的气氛与早些时候不一样。人们急急忙忙地拥向广场上那座白色的帐篷，似乎是为了在那些小丑和畸形人中寻求庇护。出于好奇，我也随着人群挤到了帐篷台上那条长凳前。人们争相抢着离戏台最近的座位，有的人简直不顾自己的风度，横冲直撞地争抢座位。我也在倒数第二排靠中间的地方抢了个位置坐下。

“把畸形人带上来！”我一坐下就听见有人大声吆喝。突然，我注意到戏台右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道：“这是非洲丛林的一种怪物。是人还是兽？基维博士将让你一见分晓。”

戏台上挂着一幅厚厚的紫色布帘，它原先是用作剧院幕布的，现在已是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了。幕布中间有一个口子，有一个小孩爬到戏台上，从幕布上的口子向里瞧，孩子的父亲终于把那孩子从台上拉了下来，把他重重地塞在座位上。

远处响起了雷声，观众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仰望着天空。远处肯定在下阵雨，但演戏的地方却还没有下雨。

我看看表，表演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但就是不见基维博士的影子，也不见刚才说的那个非洲怪物。人群中有人开始咕哝起



来，那个小孩也开始烦躁不安，哭起来了。我真不明白，他们的父母干吗不早点带他们回家睡觉呢？我也感觉有点疲倦，于是打算回家。正在这时，幕布升起，基维博士神采飞扬地在戏台上亮相了。他两腿叉开，站在台前。他穿白色马裤，脚上穿着长统皮靴，上身穿着闪闪发光的茄克。腰间扎着皮带，一边挂着鞭子，另一边挂着一把铜绿色钥匙。博士虽然打扮成那样，但还是显得和蔼可亲。他长得膀大腰圆，容光焕发，头上戴一顶白帽子。眼睛显得有些小，而且缺乏灵气——与猪眼睛没什么两样。他的双眼在帐篷里四处张望，有的观众忍受不了那双眼睛的扫射，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也有几个观众死盯着眼睛，和他对视。这时基维博士笑一笑，把他那上了蜡的胡须向上捋了捋。

“真是险象环生哪，”他用假声低沉而粗鲁地说，“说不准地点，也说不准时间，它们会像野兽一样用爪子狠狠地抓我们。甚至在这温暖宜人的夜晚，也不例外……”

帐篷里的观众发出一阵唏嘘声。

“我说的不是狮子或老虎，不是毒蛇，也不是鳄鱼，更不是在戈壁滩上追了我好几天的黑色野人。所有的危险其实都是可以预见的。”

他边说边在戏台上来回走动。这时，我注意到他的脚有点跛。观众们的眼睛像缓缓摆动的钟摆随着他移动，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末了，他停下脚步，拇指抓住皮带，心平气和地说话，好像是在评论天气的微妙变化：

“只有那些我从未见过的奇形怪状的妖魔鬼怪才让我吃惊不小。它们似兽非兽，似人非人。”他放低声音，然后大声吼道：“对！真的是怪物、是怪物啊！”

观众们显然被这一声吼叫吓呆了。有的抓住旁边的人，开始大笑起来，然后又相互低声细语，缓解当时的紧张气氛。

“你们竟然还笑得出来，你们会觉得好玩儿，要是你们亲眼看见

那些怪物的眼睛，看你们还敢不敢笑。”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后台，台下的观众们可以见到后台有一个笼子一样的东西，起先我没有注意到里面的动静。基维博士举起他的鞭子向空中一甩，“噼啪”一响，霎时一个三只脚的东西一跃而起，同时发出一声尖叫，那叫声让人毛骨悚然。博士假装吓了一跳，观众却被真正地吓得瞠目结舌。

“你可吓坏我了，”他大声呵斥道，“是我放你出来的，你可得给我规矩点儿！”

那家伙像只狗被人踢了一样，发出一声哀叫。

“得了，虽然你保证不乱来，但我还是不想解开你的铁链。”

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了铁笼跟前，手里挥舞着挂在腰间的钥匙。他俯下身子，把铁笼打开了一半，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前台。

“过来！”他命令道。

那怪物丝毫不动。

“过来！”

随着铁链的丁当声，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家伙从铁笼里出来，然后走到戏台中央离演员约几码远地方，突然停住脚步。

那家伙身材矮小，或者说就是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侏儒。他的穿着打扮显得稀奇古怪：身上穿着骨头串起来做的裙子（我猜测可能是一些股骨做的）；头上戴着一顶与两肩并齐的绿色斗篷。他的脸也被涂得五颜六色：红色、黄色、黑色；他长着高得出奇的前额，眼睛又鼓又大；两只耳朵像干瘪的李脯，小得几乎看不见。

博士正视观众良久，然后就开始把他是如何在南非丛林里抓住这个“怪物”的经过大侃一番。然后，他又吹嘘他是怎样驯养这个怪物的（我清楚地记得他用的是“驯”而不是“教”），最后他便开始向观众展示他的训练成果。他将鞭子向空中使劲儿一甩，皮鞭发出凄婉恐怖的“噼啪”声，那怪物立即“金鸡独立”，尔后又腾空而起，吐出舌头，向观众做鬼脸怪相。观众们哄堂大笑，小孩们也全无了倦意，兴

致勃勃地看着那怪物表演。博士把手里的鞭子甩得更响，他的喝令声更大。他突然双臂交叉，神情傲然地说：

“大伙儿看看，这家伙的智商至少与狗不相上下吧？”

大多数观众对博士的嘲讽哄然大笑，而我却注意到有些观众的表情却显得不太自然，也许他们认为这样的娱乐不怎么好。

“你今天的表现不错，我看我应该让你获得自由。”他说。

台下的观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是一阵咯咯的笑声，好像他们自己要获得自由一样。台上的侏儒抖了抖身子，但没有移动半步。

“你们说他会不会讲话呢？”基维博士问观众，“你们信不信我会教他讲话？这算得上一个奇迹吧？”

他盯了盯侏儒，说：

“十三！”

显然，博士所讲的数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跟我说！”他命令道，“十三！”

侏儒发出一种叫声。

基维博士凶巴巴地走向前去，高举手中的鞭子，又重复着说：“十三！”

这时候侏儒才用冰岛语大声凄凉地叫道：“Argara thiargara!”“Kettir, kettir……”

观众一阵紧张，我也吓呆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也吓坏了。

“大家听我说，它是一只野兽，”基维博士大声说，“十三！跟我念十三！”

“席……席……”

“好，好，就念十三。”

“席……”

“十三！”

侏儒头上响起了啪啪声，鞭子打在怪物的腿上，怪物一跳。



“十三！跟我说‘十三’！”

“席……”

“席……”

“席……”博士学着怪物不准确的发音。

“席……”

这时候博士歇斯底里地叫喊道：“听着，十三！十三，听清楚！”

博士说着用鞭子抽打侏儒，侏儒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叫，一纵身扑向博士。博士摔倒在地上，四肢朝天。侏儒冲向前台，两眼怒视着观众。只听一阵“嘶嘶”的声响，侏儒向观众喷出一股火焰。

侏儒嘴里喷着火焰，向观众扑来。观众们吓得惊恐万状，纷纷离开自己的座位；惊慌失措的家长们牵着自己的孩子相互碰撞，不顾一切地躲闪。我也随着人流退到了街上，要不然也会被踩倒在地上。有些观众在混乱中跌倒在地。我想把一位中年妇女扶起来，可我也被重重地撞倒在地上。我本能地伸出双手，可一下子却没有起来。正在此时，他伸过手来拉我。原来他也被推倒了。我仔细观察他的脸庞，慌乱中他显得异常平静。他的眼里还含着一丝笑容。我以前好像见过他，但一下子却想不起来在哪里。

当我们重新站起来时，他自我介绍道：“我叫雅各布·希梅尔法。”听口音，他好像是德国人。

我没有马上答应。

他说：“我有时候到布勒斯丁餐馆吃饭。”他说着话，眼角里透出幽默的神情，“我是不是在那儿见过你？”

我记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我想可能是我在布勒斯丁饭店当女招待时他见过我，但我没有承认我曾经做过女招待，我觉得这样有点伤面子。

虽然完全可以用不着别人扶，我自己就可以起来，可当他伸出手扶我的时候，我没有表示反对。

“吃点儿点心会有帮助吗？”

“他是冰岛人。”我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

“我说的是那个侏儒，他讲的冰岛语，他是猫，他嚎啕大哭，一只讲冰岛语的猫。”

他笑了笑。

“是这样的，他讲的是冰岛语。”

我们耳边响起雷鸣的掌声。

天开始下起雨来。

“星期六跟我一起去听音乐会，好不好？”我们分手时他邀请我说。

“好啊！”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们俩都忍不住笑了，我的脸涨得通红。

他说，他认为音乐会一点钟开始。

“那我就用不着晚上才下班了。”我回答道，我说话时嘴有些不听使唤。

“具体时间我明天打电话告诉你。”

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家里，没有经过车站。布朗夫人还没睡觉，她觉察到我的变化。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

第二天，天气潮湿而沉闷，可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直到布朗夫人说她决定将她那台老式的瓦卡特里斯特牌吸尘器卖掉，并说她已缴了星期六的报纸的广告费时，我才回过神来。

“我星期六还得去参加葬礼，我把这事儿完全给忘了。我不在家时，请你帮我接一下电话好不好？我下午三点钟回来。”

我觉得很难受。天气好像突然间变得越来越沉闷。这台吸尘器已快成古董了，这东西在南北战争前可能有点用，可如今谁还要

它呀？看在她为我所做过的一切的份儿上，我无话可说，只有按照她的吩咐办。

我告诉雅各布我去不了啦，他可能马上听出我的言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失望，所以，我给他再多说也无济于事。他回答说："我们下次再去吧，祝你卖个好价钱。"

我对他表示感谢。

"另外，你说她打算把什么东西卖掉？"

"一台老式的瓦卡特里斯特牌吸尘器。"

"瓦卡特里斯特牌子吗？"

我们俩都笑了。

布朗夫人是星期六中午出去的。我整个上午几乎都守在电话旁，可电话铃就是不响。

"也许电话机出毛病了。"我不停地说。我拿起电话听筒，确认电话机一切正常。

"我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儿。"

我刚要离开家，电话铃就响了。我简直有点欣喜若狂，因为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可能要错过的音乐会的场面。不过，我还是镇定自若地拿起了电话。

"下午好！"对方传来一位男子的话音，尖声尖气的。

"你们是不是登了一则出售瓦卡特里斯特牌电子吸尘器的广告？"我回答说："对呀。"

"我的运气真好！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寻找还能够使用的这种牌子的吸尘器，它还是完好无损的吗？"

"完好无损，"我回答说，"连一点划痕也没有。"

"我真是幸运极了，"对方又问，"你要多少钱？"

我把布朗夫人交代的价格告诉他，但我马上又补充说，价格还可以商量。

"四镑三先令！"对方惊奇地说，"我可不愿意出那么低的价钱。



我出五镑，怎么样？”

“这样当然好，”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咱们成交吧！五镑就五镑，我什么时候来取？”

“随时都可以！”

“现在我就来搬，怎么样？”

“很好。”

“好，我一会儿就到。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儿不远。”

不一会儿就有人敲门。

“他马上就来了，”我想，“要是布朗夫人知道这事儿，她一定会很高兴。”我脑海里浮现出买主的形象：六十开外的小老头儿，秃顶，两鬓花白，目光和蔼可亲——所有这些都是在我打开门之前的想象。

“雅各布！”

“我刚好路过这儿。”

我简直说不出有多高兴，我想他也注意到了我的表情。

“你不是去听音乐会了吗？”

“我想见见你，顺道买了午餐。你吃过午饭了没有？”

他手里拿着纸袋。我禁不住靠着门朝纸袋里偷看：里面有水果、奶酪、面包、馅饼还有红酒。

“你吃了吗?”

“没有。”我回答说。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让他进屋坐。

我们俩坐在屋里的圆桌边，坐在这间屋子里可以俯瞰整个广场。我们把梨子和奶酪切成小块放在面包上，然后又倒上葡萄酒。很显然，我已经把吸尘器的事儿和那位小老头买主忘得一干二净。幸好，雅各布及时提醒了我：“你卖吸尘器的事儿怎么样？”

我吃了一惊！

“他应该到了吧。”我自言自语说。

“买主是谁？”



我告诉他说，买主是一位风趣幽默的老头儿，而且他还坚持要给我五英镑。

“是吗？他叫什么？”

我说我压根儿也没有问过他的姓名。

“是不是年轻人？”

“不是年轻人，至少从他的声音判断，不像年轻人。”

“声音听起来有点刺耳，是吧？”

我点点头。

“是不是我这样的？”

说话间，他改变了声音，与电话里的声音如出一辙。“是不是完好无损，我真幸运。四镑三先令，小事儿一桩，给你五英镑，起码给五英镑。我怎么说也得付不少于……”

“雅各布！”我惊叫道，“你真坏！”说着我向他扑去。他一边大笑，一边躲闪，我在后面追赶他，“你骗我，你坏！”我使劲儿地摇他，他顽皮地抱着我，阻止我。我用力地在他怀抱里挣扎，他使劲地搂着我，直到我们俩的嘴唇碰在一起。

我无力挣脱他的拥抱，也不愿意挣脱他那让人难以形容的、力大无比的双臂。

我早就应该感觉到有种预兆。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样的清楚明白，只不过我这个人不相信巧合而已。基维博士的滑稽表演可能早就是一个不祥之兆。雅各布当时帮了我，我充其量向他道一声谢，说一声“后会有期”。我当时应该马上回家，不该跟他进咖啡馆，使自己陷入这种莫名其妙的欢快之中。

我还记得布朗夫人对我说的一席话，“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儿，可你要记住：他是犹太人！”如果我听了她的话，一切都会比现在好。

我们俩的关系已是这样了，尤其自从那天晚上他向我表白以来更是很明显了。要是我还想得起基维博士和那位被称作怪物的冰岛侏儒，我会明白这现实的世界，一切的一切也就会有所不同了。

我鼓足勇气告诉布勒斯丁，我准备到乡下去呆几个月。他先是一言不发。

“到哪里去？”他问我。

“到一个避暑山庄去，离巴思不远。”我回答说。我没有告诉他我真正的打算：我准备和雅各布一起到乡下去住。

他瞅了我好一会儿，不作声。我明白他在猜想我的事儿，可他很谨慎，不提雅各布半个字。“可能这事儿对你来说也不容易。”

我气得不得了，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如果这样的话，”他接着说，“想让你来经营这家餐馆算是没指望了。你也别向我作什么保证。”

我很想回敬他，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什么时候动身？”

“三个星期以后。”

“抓紧这几个星期的时间，”他说，“你离开城里就学不到烹饪技术了。”

他是在说我干不了什么事儿！我要拿出我的真本事给他看看，这几个星期我要一直干下去，一天也不休息。

“话题扯得远了点吧？”布朗夫人说，她了解我们在说什么。

“谁说我干不了重活？”我质问道。

余下的几周时间里，布勒斯丁假装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可我知道他在笑我固执。事实上，我的判断没错。

雅各布费尽心机想改变我的主意，可我就是不领情。他当时正好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心情愉快，可以出去散散心。他在大学出版社找了一份搞校对的工作，也盼望着到乡下去走走。起先，他的快乐使我更加不满，在此之前，我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取笑他。



我记得，当时我感到简直无地自容。当然，我对雅各布的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难道爱情的结果就是失望吗？和布朗夫人久久地拥抱，依依惜别，我是多么的轻率！我对母亲撒谎说，我到萨默尔塞特去找布勒斯丁，这样做也十分幼稚。

简直盲目极了。

吃过饭，我们开始聊天。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我来的时候所坐的小车感兴趣的一位机械师。他对我很惊诧，以为我在小车方面很在行。我对他解释说，这纯属偶然。而他看上去却是对小车及其机械构造非常熟悉。于是，他开始大肆谈论有关他的零备件和船在岸边停靠时所购买的气化器方面的知识。由于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便出于礼貌地点了点头，对他所谈论的事表示附和。他将话题转到古尔弗斯号船的机械上，并邀请我到机舱里去。我当时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于是就不知不觉地跟他到了船的机舱。

我们在机舱里呆了一会儿，说实话，我倒挺喜欢呆在这里。机器的轰鸣声让人感觉信心十足，有安全感，说明船在安全地向前行驶，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汽油夹杂海水味充溢着整个船舱，使我感到精神鼓舞，信心百倍。

我们从机舱里出来，听到一阵阵玻璃器皿和陶器碰击时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还闻到一股混杂着水蒸气的烟味。机械师邀我到吸烟室同他一起坐坐。我本来是不愿意与那里的人为伍的，可我还是随他一起去了吸烟室。

晚餐吃得很轻松：我很幸运与两位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讲冰岛语的丹麦人一起吃饭。为了让吃饭时的气氛轻松和谐，我谎称自己不懂丹麦语。所以，和他俩在一起吃饭很是轻松愉快。

现在我可有点招架不住了。我们刚走进吸烟室，机械师就向旅客们一一介绍我。在这以前，我一直坚持着不和别人往来，现在逃

不掉了。他肯定认为他这样做是在帮我。他认为我是害羞才不和别人交往的。

"她会开小汽车。"他首先向人们介绍说。他居然很成功！

"会开小汽车，嘻嘻！"一位面色苍白的少妇嗤嗤地笑着说。她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帽子，长长的手指缝里夹着雪茄烟嘴，手指在烟嘴的映衬下显得越发纤细白皙。她旁边的一位男士大肆吹嘘他最近准备买一辆史蒂贝克牌小汽车。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不过，我还是尽可能显得有教养，要不然机械师会认为我这个人傲气十足，摆架子。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也在猜我的心思，他是在同情我：这也许纯粹是我的想象而已。他把我带到一个靠角落的地方，问我听了这段谈论小车的长篇大论后，需不需要休息一下。然后，他招手要服务生过来。

我刚刚坐下，那位研究古典文学的博士也在我对面坐下。我不太喜欢他的表情——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颓废的表情，我不敢再看他一眼，不然我会感到毛骨悚然的。

"我快用完了。"他对我说，边说边端起杯子，喝下最后一口。"我喝完了，"他又重复说，"喝完了。"

"真丢人！"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回答道。

"我在哥本哈根呆了三年，在爱丁堡呆了两年。我父母都以为我参加过考试了，他们都认为我是冰岛受过最好教育的人。"

"你认为是你首先发现了《埃吉尔英雄传奇》的作者，对不对？"

我看了看我的周围，机械师走了，我却得留下来，再呆一会儿。

"我父亲是渔民，他是渔民。"他嘀咕着说，好像只知道这一件事似的。

服务生给我送来了雪利酒。

"英戈尔夫尔一会儿就回来，他到船桥上去了。"

"我母亲在一家面包厂工作。我是家里的长子，西吉二十岁，我妹妹艾达是今年接受坚信礼的。他们全都会在码头上来接我。我



父亲会用他的手拍着我肩膀说:‘儿子,我们为你自豪。’我母亲也会说:‘霍尔格雷姆博士,你很快就将成为一名教授了。’”

他大笑起来,然后突然脸一沉,开始抽泣起来。

“三年里我一次考试也没参加。”

他开始忏悔,天哪,他真的开始忏悔了。

“他们为了我省吃俭用,数年如此!”

桌子旁坐着两对夫妇,我发现那两个女的在偷听我们这边的谈话。

“今晚我准备跳海自尽,我要在船到家以前跳海。”

他的这种表白使旁边的两位女士吃了一惊,她们推了推她们的丈夫。我却受够了。

“跳海!这个主意不错,”我说,“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他吃了一惊。

“我要跳海自杀,结束我的生命!”他又说。

他的话音很小,却十分严肃认真地重复着说:“我要就此了却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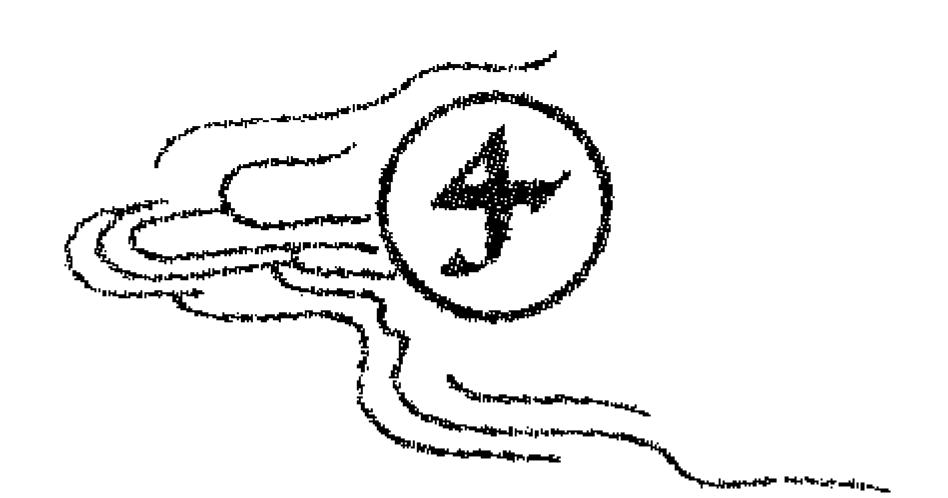
“噢,你干嘛不行动呢?天气这么好,海水这么平静,这可是自杀的好天气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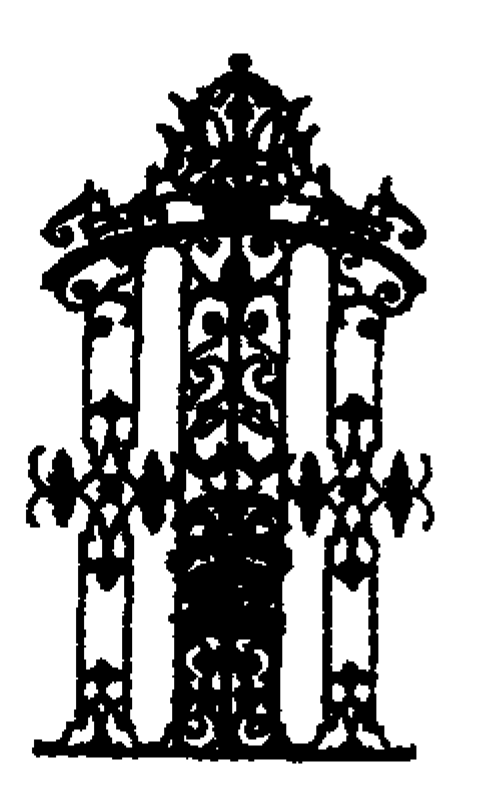
我站起身来,他却像一个丧家犬。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嗯?!”

旁边的两对夫妇在交头接耳,我猜得出他们在嘀咕什么。他们懂什么?他们了解这个人的经历吗?

我可是了解我身边坐着的这种人的,我就知道这号人会怎么样。


4



费朗兹·希梅尔法拥有两家工厂，一家在柏林，另一家在杜塞尔多夫；他还经营一家珍本古书书店，一家屠宰场；另外，他还是一家报社的合伙人；还开有卖雨伞、阳伞和遮阳篷的商行。

“他们当然很有钱啦，”布朗夫人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雅各布无心继承父业，也很少提及他父亲的事儿。

他曾说：“雨伞和阳伞的惟一差别在于颜色不同而已。要是上帝发明一种东西，让人必须找东西遮掩的话，我父亲无疑还会高兴得很。”

我从未见过他父亲，可从照片上看，雅各布的长相和他父亲应该很像，可是雅各布的嘴却长得像他的母亲。他母亲很漂亮，大大的眼睛，披着一头波浪似的秀发。我曾经问起过雅各布有关他父亲的宗教信仰。

“他们已彼此同化了，”他笑着回答我说，“他们和你一样信马丁·路德·金。”

他说他自己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

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有关布莱克的诗歌：

不管人类是福是祸，
我所关心的是，
人类是不是真的愚钝。
去吧！丢掉神祇，用智慧武装。

他所引用的这首诗是多么的深刻！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是人类的愚昧和彼此的误解，而不是邪恶、背叛和狡黠。他说，欧洲大陆的头头们都是一些"卑劣的蠢货，一些只知道围着自己肮脏的地盘吵闹不停的小人，你争我夺，吵吵嚷嚷，最终扭作一团，厮打起来"。无论历史学家们怎样尽力划分是非曲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莫不如此。

我们坐在刚搭建好的帆布帐篷檐下。天下起雨来，我们的身上却是干的，没有感到任何烦恼。我们望着路边沟里流动的雨水，山谷里的尘土缓缓下沉。雅各布斜靠在椅子上，打字机的嗒嗒声也停了。我那天早上买的野兔肉还在简陋的火炉上煮着。我们坐在蓝色的帐篷里，安然无恙，一片祥和。这里没有战争的硝烟，也没有任何危险威胁着我们。

雨停了，泥土里冒出水蒸气，他搂着我。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望着我，他那修长的手指轻柔地抚摸着我的乳房。

"就在这外面？"我问他。

"那就给'他'带路吧。"他轻轻地说。

"就在这里吗？"

"把'他'牵着……给'他'带路。"

他那双棕色的眼睛，我想，有时尽管我好像感觉还有其他眼睛也在看着我，可我还是想起了他。我满脑子时常都是他的身影在晃动，但有时我脑子里只有他那顶贝雷帽。我突然感到害怕，蓦然坐



起身来。“安东尼！”我大声呼喊道。可当他睡眼惺忪地走进我的房间时，我自己也说不清我叫他进来干什么。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天。我常常在太阳西下的时候坐在阳台上，静候着黄昏的来临。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从山谷里传来一阵欢笑声。那是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两人都听见了那甜美动人的笑声，它是随着一阵轻风飘来的，好像一位手风琴手在远方奏起的旋律。风停了，笑声也随之而消逝。我们想象中的那位少女的笑声停了(我们俩都认为笑声是一位少女发出的)。这时候，风向转了，霎时间那笑声随风又起。

“迪萨，那少女的笑声和你的一样好听。”

“我的笑声可没有那样动听。”

“非常像。”

“我吗？”

“那笑声简直就像汩汩流淌的清泉。”

“不会吧。”

雅各布模仿着那笑声：“嘻嘻，呵呵呵……”

和煦的春风轻轻抚摸着我们的脸庞，我们俩沉浸在美好的夜色之中。我们拥抱在一起，情意绵绵，难舍难分，感到彼此的脉搏在一起跳动。

第二天早上，我到保尔顿电话局去给我母亲打电话。我出发的时候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可当我走到村外的时候，天开始下起雨来。我骑着自行车，没有风，只是下着大点大点的雨。因为没有带雨衣，我的衣服很快就被淋湿了，紧紧贴在我的身上。几分钟的功夫，我就全身湿透了，像只落汤鸡。进村的路上有一座小教堂，我还记得当我骑车经过教堂时，牧师就站在门口，我记得他笑盈盈地向我挥了挥手。我还记得看到了我的屠夫朋友，我路过时他站在肉铺

里，他显得兴高采烈——这些也许都是我的幻想。最后几天，我的脸被阳光晒得红彤彤的，这时候有雨水洒在脸上，感觉好极了。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和考帕斯克尔的电话联系上。

“迪萨吗？出了什么事儿？”

“没事儿，妈，我订婚了。”

对方没有回答，我只听到对面电话里有噼噼啪啪的响声。

“你说什么？孩子。”

通话效果很不好，可我还是不断地说着话。“我们回到伦敦后，打算今年秋天结婚。”我告诉母亲说，“他叫雅各布，雅各布·希梅尔法。他是德国人，妈妈，我非常爱他，真的！你可能不信，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漂亮极了。花园（实际上就是一片草坪）旁有一条小溪，园子里绿草茵茵，鸟儿成天为我们歌唱。在离我们住的山谷不远的农庄可以买到黄油、奶酪、鸡蛋和鸡鸭。在这里，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和睦相处。”我还告诉母亲有关屠夫的事，以及图书馆旁边的小饭店，我在那儿当厨师，每周工作三个晚上。“这家小饭店叫‘布特勒客栈’。”但我没有告诉她，因为老板遭人投诉，我只能做传统的英式饭菜。我说，我和雅各布今年到伦敦去过两次。“天啊！与我们这里比较，伦敦的东西比这儿要贵得多。妈妈，买一磅黄油要花……奶酪的质量也不见得好。我能见到朱丽和其他同事们倒也挺高兴的。”可是，我没有告诉妈妈我与布勒斯丁闹僵的事，其实布朗夫人告诉我说，他叫我秋天还是回到他们那儿去工作。“我们可能先回冰岛去，雅各布也说这样比较好。唉，妈妈，我觉得幸福极了。”

对方还是没有回话。

“妈？”

我想，可能是电话断了。

“妈妈，你在听我讲话吗？”

“我记得你说你是和布勒斯丁一起到乡下去的，”她说，“你以前从未讲过你现在所讲的事，他叫什么名字？雅各布？可是，以前你

说你是和布勒斯丁去那儿的……”

“啊，妈……”

“你把你爸你妈都给骗了，现在你居然说你已订婚了。你简直是疯了，孩子？你是怎么啦？你竟骗你爸妈，你还说今年秋天就要结婚了，你简直是发疯了……”

我开始呜咽起来。

“妈，你不理解我……”

“是的，我一点也不理解你，我不明白你居然会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你爸……你居然背着我们这样干，你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的，阿斯蒂斯。”

这时传来手风琴的歌声，最初听起来完美无缺，后来就完全跑调了。风停了，歌声也没有了。一个个音符漫天飞舞，飞到天空，在浩瀚的苍穹游荡，游荡——毫无目标地游荡。

七月份，雅各布的弟弟大卫突然来信说，他很快就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在森林中走了一天回家后才看到他的信。信封上的笔迹很漂亮，我当时还以为是出自一位女子之手呢。信封是蓝色的，信纸也是蓝色——浅蓝色。

我们走了一整天的路，感到既疲倦又兴奋。我们在一面小湖里浸泡了一会儿，才感觉到轻松了许多。湖——实际上就是一个小水塘，掩映在苍翠的绿叶丛中。雅各布高兴地潜入水中，朝我游过来，抓住我的脚趾。刚开始我很着急，以为他潜入水里时间太长，心想可能被湖底的水藻缠住了，动弹不了啦。这时，我的脚被抓住了。他浮出水面将我抱住，我才放心地大笑起来。我们在塘边吃午餐，煎鸡蛋、熏鳇鱼、奶酪都已经凉了。我们还喝了半透明的红葡萄酒，这种酒喝起来比较爽口，而且不会刺激脑细胞。吃完饭我们便小憩一会儿。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西下的太阳把树影拉得长长的，塘

边石板已经开始变凉了。我们乘着夕阳西下的余辉，迈着缓慢的步伐，回到属于我们两人的家。

“他要在我们这儿住一个晚上，”雅各布看完信后对我说，“还带着另外一个人。”

他很爱他的弟弟，盼望着早点儿与他见面，同时也很想见见他未来的弟媳。大卫与他的女友深深相爱。雅各布读了他弟弟描述他女友的言语时，像家长一样脸上露出了笑容。信中的言语流露出认真与率直。

大卫和他女友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才到。我们看见他们从车道走到房子跟前，大卫一只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牵着他女友的手。他的女友身穿白色裙子，白衬衫，头上戴一顶白色帽子。她身材高挑，看上去就像一束皎洁的月光。雅各布吻了他弟弟的面颊。虽然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的弟弟，我还是吻了他的面颊。他弟弟长的仪表堂堂，比雅各布标致得多，只不过他的个头没有雅各布那么高大。女孩儿的名字叫安娜，她和我轻轻地握了握手，雅各布吻了她一下，表示欢迎。大卫在女友面前表现得殷情周到——简直像个仆人一样。我和雅各布在一旁看见都笑了，就像欣赏一个小孩儿的动作一样。

“你快到树阴下来，我去给你拿椅子。这座位怎样？舒服吗？我给你拿个垫子，现在舒服些吗？”

安娜要到厨房给我帮忙，被我婉拒了，她就坐在阳台上，并叫大卫给她一支香烟。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大卫不断起身把她的烟头丢到烟灰缸里。每当大卫俯身时，她就摸他的脖子，然后又轻轻地吻他的耳朵。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显然是不让我们听见他们的谈话。女孩儿可能在想，我不会注意他们的，但我不敢肯定。我想大卫的脸一定是红了。

雅各布提议我们一起到小河边散散步。我们走到第二道山谷的时候，那女孩儿说她想歇会儿再走，大卫立即尾随其后。我们到

江边时，我朝后面瞅了瞅，她还坐在阳台上，大卫坐在一边，望着我们。我敢肯定，他们是想趁我们看不见他们的时候，到我们住的房屋里去。

话虽这么说，我做的晚餐还是既丰盛又可口的。看在大卫的份上，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先喝了菜汤，然后，又吃了蓝色奶酪和火腿烤面包，最后还吃了梅干烧鸽子。我们喝的是雅各布到伦敦买回来的新鲜葡萄酒，这种酒味道爽口。我们尽量避免谈起有关德国的事情，但无论怎么样也回避不了这个话题。女孩没有搭讪，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我记不得话题是怎样转到了天主教上来的，但大卫说，德国政府还在指责修道士们乱性的问题。雅各布毫不隐瞒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可当大卫张口表示赞同时，他女友开玩笑地问大卫：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修道士的？”

她就坐在雅各布和我之间，显得讨好雅各布，不时地在我和大卫的谈话中插上笑声。每当雅各布发表精彩的言论的时候，她总是极力喝彩讨好。她的父母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移居纳米比亚了，可她对我们只字不提。我从大卫的信中得知她好像现在还是学生。

她吃饭的时候也抽烟。开始的时候，大卫认为她抽一支烟并非有意添乱，后来当她从衣袋里再拿烟抽时，他也就不注意她了。酒足饭饱后，他的精神也好起来了，开始向我打听冰岛马，言语中透露出他是一位好骑手。雅各布问他住在慕尼黑的家人的情况时，他却显得兴奋而轻松。

“你的朋友洛尔怎么样？”

大卫回答说，两星期前他在伦敦遇见他孩提时的朋友和她的妹妹，还和她们一起吃过饭。

“我们在一起吃饭时，正好下雨，”他说，“她妹妹担心她回家时会淋湿衣服。洛尔开始逗她玩儿，我们在一起哈哈大笑，就像小时候一样。”

安娜知道雅各布是在拿她寻开心，于是她脸色马上就变了。

“洛尔还是以前那样对人热情奔放，而且风趣幽默。”雅各布说，“她还是那样，一点没变。”

我用肘弯轻轻地碰了他一下，他意识到自己的话扯得太远了，于是开始修饰自己的言语，可适得其反。“我真是搞不明白，你是怎么和那些漂亮小姐套上近乎的？”

我们三个人都吃完了各自的那份鸽子肉，安娜却显得没胃口，她只是在鸽子胸脯上戳了几下，然后就搁下了刀叉。我看得出，她是在使性子。

我们都不喜欢动，所以一吃完饭，就坐在桌旁喝起咖啡来。外面夜幕已降临，可由于屋里点着蜡烛，还有壁炉闪烁的火焰，我们感到温暖而舒适。我不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时候转到了游泳的，也许是我提起了那口池塘和岸边的石头，那块白天被太阳晒得炽热，当太阳一偏西马上就凉快下来的大石头。我开始谈论起那口池塘，安娜突然轻轻地咳了一下，背靠着椅子，向我们转过身来：

“我非常喜欢游泳，即使打仗期间也一样。”

她看了看大卫。

“你还记得我在圣·塞巴斯蒂安写信告诉过你的事，是吗？亲爱的。”

大卫低头不语。

“那里的海滩真是美不胜收，”她又说，“每次吃完午饭以后，大家都去游泳，因为游泳的人越多，有人就越有机会逃跑。那里的难民经常偷渡到法国去，他们假装像我们一样去避暑。说起来有点不光彩，但也还是挺有意思的。西班牙的海岸警卫队员一下子就能认出他们来，他们游得特别快，根本没办法把他们抓回来。”

“接下来怎么办？”雅各布面无表情地问了一句。

“喏，警卫队就开始射击，我们拼命往岸边游，最后水里除了剩下几个偷渡者外，我们全跑到了滚烫的沙滩上。最终结果，既简单



又悲惨。警卫队的枪法真是百发百中。”

我们大家静静地坐着。壁炉里的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我知道大卫不想谈这事儿，所幸的是，我们没见到一具尸体，海潮把他们卷到他们要到的一个目的地——波尔多海。”

第二天她起得很晚，起床后，他们俩一起来向我们道别。大卫真是百依百顺。雅各布吻了他弟弟，又拍拍他的背。

他们两人都走了，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妹妹乔朗恩写信告诉我说，她要和药剂师冈纳·奥拉夫桑结婚了，我真不知道是喜是悲。但从妹妹来信对他的描述来看，这个人似乎有天大的本领。他们俩的事我可管不了，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也不问问我的意见怎么样。她在信里确实提过冈纳这个人两三次，却没有告诉我他们会这么仓促就结婚了，而且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我要强调说明一下，她结婚的确没有必要非经我的同意不可，可她不征求我的意见，又让我心里大为不快。我本以为我们两姊妹的关系是很好的，她不至于到现在这个时候才给我讲这事儿。因此，我感到很气愤。与此同时，我也比较明白地向她暗示了我和雅各布的关系。当然，我没有告诉她我们“姘居”的事儿。“姘居”是那个时候人们说的词语。我认为我这样小心翼翼，完全是怕给她引来麻烦。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实际上我并不完全相信她。从她以后的来信中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尤其那封信的附言，令我感到义愤填膺。在我亲自给妈妈打电话讲我准备和雅各布订婚的事前，她早就提前告诉我母亲了，只不过她写给母亲的信还没有寄出去而已。

又：妈妈向我讲了你们在电话中所讲的内容。你清楚，她已拿你没了法子，我想劝她，但无济于事。爸爸一

声不吭，你说我该怎么办？……

还好，她愿意重写那封信，她在信中删掉他与冈纳到北方的考帕斯克尔去旅行的事儿。“我很高兴妈妈和爸爸很快就喜欢上了冈纳，而且他们彼此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并删掉了有关冈纳家庭出生背景的叙述。“奥拉夫——我未来的公公——曾经和我们的父亲一块学过医。这件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现在可好，她在父母面前成了天使，而我却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叛逆者。

“你一定要让人相信你们是夫妻关系，”布朗夫人在我们去萨默尔塞特时对我说，“乡里的人讨厌未婚男女住在一块儿。他们比其他 地方的人更厌恶……”

“今年冬天你们没有住在一起，对吗？”乔朗恩在信中问我，“妈妈说你们住在一块儿，可我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她还假惺惺地说，想帮我在母亲面前说说情呢！

她写信告诉我她和冈纳结婚的事儿，我还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谁能责怪我呢？

早在1938年，我就认识了安东尼，当时我和雅各布在萨默尔塞特才呆几个月时间。安东尼住在他家的一幢小别墅里。我记得别墅的名字叫“白林庄园”。而今，那幢别墅——那富丽堂皇的别墅已经被拱手让给了别人——被没收了。每次经过那幢别墅的时候，我都要驻足凝视片刻，而且心里充满了敬畏之情：我从自行车上下来，然后把自行车平放到草坪上，或将它稳靠在墙上之后，我便走到门前或者在门前的树桩上坐下。这幢房子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四周的草坪被修剪得平平整整，就像一幅波斯地毯。这些草坪在别墅的

周围呈现出一片翠绿色；与房子相映衬，又略带蓝色，所以，有时候别墅看上去就像湖面上的一个小岛。我嘴里常常叼着根草，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久久凝视，浮想联翩：想象着住在别墅里的感受——我早上从宽敞的楼梯下来，迎着朝阳伸伸懒腰；打开窗户，呼吸刚刚修整过的草坪里发出的阵阵清香，聆听鸟儿欢快的歌声。

后来，安东尼从冰岛把我营救出来时，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看见我坐在大门口不止一次。他有点尴尬地低声说他经常拿着望远镜看我。

安东尼与他的两个姑妈住在一起，两位姑妈成天不苟言笑，所以他就成了我和雅各布的常客。他常常喜欢吃完晚饭就到我们这里来，手里通常拿上一瓶酒；或给我带些小玩艺儿什么的；或从他们家佃户那里带点奶酪或几个鸡蛋过来；或从他家书房里拿一本书——通常是有关诗歌方面的书。雅各布还在牛津大学上一年级的时候，他们俩就认识了。而我和安东尼，却是一见如故。

有一次我对雅各布说：

“你认识雪莉·琼斯吗？”雪莉·琼斯是我们的邻居，她是一位漂亮而充满快乐的姑娘。“我觉得那姑娘好像爱上了安东尼，我们是不是邀请他们两人一起到我们家来吃饭？”

雅各布对我的提议，反映非常冷淡，这令我感到吃惊。

“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他反问我。

“难道你认为他们不配吗？”

“当然很相配，可……”他犹豫不决地说，“我只不过认为这个主意未必很好，仅此而已，没别的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嗯，我怕他们俩合不来。”

“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他耸了耸肩。

“你看着办吧。”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可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雪莉频频地向安东尼送秋波,可安东尼却视而不见。

第二天雪莉来向我求助。

“他从来没有跟你和雅各布提起过我吗？”她问我。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她说没有。

她显得很失望,我也为她难过。她要我探一探安东尼的口气，我答应了。

这件事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从接下来一周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上就得到了印证。

我做事总是追求完美,并全身心地投入,而且喜欢干脆利落,独立自主。我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点,我认为迪通饭店的客人们也是这样评价我的。近几年我所接到的预定单数目可以证明一切;我只列举几家曾经报道过我的报纸和杂志,其中包括英国和国外的报纸杂志,如:《每日电讯报》、《时尚报》、《金融时报》、《城乡报》和《世界》杂志等。《城乡报》在头版头条这样说:“(我)是沙漠上的一片绿洲。”这家报纸大多数文章报道了我们如何在偏僻而又有限的环境下烹制出具有国际水平的菜肴。可我想说的是,文章作者除了表达了大多英国人的普遍观点外,没有自己对烹调的独特理论建树。这一点连小孩儿都能从他们的文章里体会到。

恰好此时一位肥胖的女人闯入了我的生活。她装模作样,评头论足,自以为是!

她是星期五晚上七点钟之前来的。她进来时没和我打一声招呼,而是一屁股坐在餐厅的椅子上,要了一杯开胃酒。她边吃边对我做的菜大肆“赞扬”一番——毫无疑问,她是在贬低我,实在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她十点多钟才驾车离开饭店,她那笨重肥大的身躯把小车压得吱呀直响。



一周以后，她的文章刊登出来了。这个白痴、伪君子的文章，我的天啊，读了让我十分气愤！

“鲑鱼新鲜可口，就是有点欠火候。”她想吃的鱼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好呢？难道要把鲑鱼做成牛皮那样老才好吗？她可是吃得一点儿也没剩！盘子是空空地收回到厨房来的。她可是连盘子都舔了，就连味碟儿里的佐料汁儿，也是被喝得一干二净的！

“烤鸭味道不错，就是有点儿硬。”如果说她认为烤鸭有点儿硬的话，只能说明她牙齿不好！连伊丽莎白·大卫吃了我们的烤鸭，也觉得我们的烤鸭是“入口化渣”。你说谁的话更可信？是相信伊丽莎白，还是相信那位“人面兽心”的家伙呢？难道要我们非得相信肥婆——简直就是一盘猪油——的话不可吗？

“而且她连单都没有买，”我对安东尼发牢骚，“她是白吃的！”

“迪萨，是你叫她不买单的。”

“我没想到她会恩将仇报呀！”

“别只是想到以牙还牙，这样会火上浇油的。”

“她居然说烤鸭太硬！”

“她除了说烤鸭硬以外，其余全都是说的表扬的话哟。”

“……她还说鲑鱼做得有点不熟。”

我坐在暖房里，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好了辩护词。我听了安东尼的劝告，没把信寄出去，只是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我把文章作了小小的修改，其余基本保持不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后悔不该写信。噢，别误会，我不是后悔写了信，而是后悔我的语言用得不够尖锐和犀利。我意识到有人可能会站出来替她说话，对她表示同情。

要是我把她吃剩下的鸭骨头给她寄去，有人一定会大吃一惊。我这样写道：“把包裹寄到她手上要花上一段时间，鸭骨头上面可能一点肉也不剩，这也没有关系。”我写道，她第二次来，我要给她多做几道菜，因为“她一回家就饥肠辘辘，一口气吃了四碟小菜，三个主

菜，还要外加点心”。我还承诺，要在大厅里放几把宽大结实的椅子。

当年秋天，我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欧洲饭店业主会议，我惊奇地发现许多人仍在议论我写的那篇文章。我从他们旁边经过的时候，他们一看见我就躲躲闪闪，就像小孩子恶作剧时怕被当场抓住一样，有些人简直一见我就害怕。

“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从来不求他们，去他妈的，我不会让步的！”

1938年秋天，雅各布非常担心远在德国的亲人。其实他像许多人一样，当初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纳粹迟早会成为德国上下必须铲除的心头祸患；也没有意识到纳粹的险恶用心。阿瑞安想为犹太人做点事却遭禁止，他一点也没有引起注意，只是说谁也别听人胡言乱语。霍夫曼小姐——他父母家雇佣的保姆——也一样，也不在乎这些事儿。我心里犯嘀咕：十有八九是他母亲写信时对他隐瞒了实情。因为他母亲为了不让他担心着急，有意把不好的事情瞒着。她母亲在信的最后总是叮嘱他：“亲爱的，好好干你的编辑工作。”

“你父亲和我都很好，一切正常。除了你父亲的前列腺有时发病之外，我们都托上帝的福，身体都挺好的。而且一直有沃菲尔医生的悉心照顾，你爸的毛病也就无所大碍了。昨天我们还和克鲁尔夫妇在一起喝过茶呢。”

信里总是写一些有关天气啦、音乐会啦、读了几本什么书啦，或者又结识了几个新朋友之类的事儿。

“布鲁门菲尔德小姐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她说人的肠子有三十英尺长，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夏天过后，雅各布感到他母亲信中的语气有点不一样了。虽然

她没有抱怨什么，也没有讲什么事不对劲儿，可她好像仍有什么东西隐瞒着。笔端之下，她在极力掩饰着什么，小心翼翼的。她写的信也比以前短，描写天气的言辞更多了，也不再谈去听音乐会或聚会之类的事情了，信中也不怎么提朋友的事儿了，和其他熟人的关系更加疏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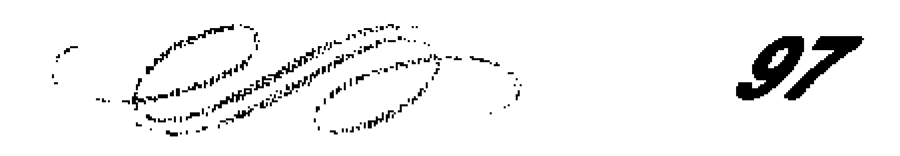
注意到这些变化的不只是我们，还有大卫，他在伦敦读书，现在也是心急如焚。他听人说，有关德国的情形也许要比我们所了解到的要复杂得多。他认为德国现在的形势和他母亲在信里所说的不一样：犹太人出门必须携带身份证的事，必须使用德国政府给他们取的名字，所有这些母亲在信中都只字未提。安娜——大卫的女友——那年冬天在荷兰读书。他放心她在荷兰，不在德国。我们并不想念她，也不清楚她究竟学的什么专业，只是由于大卫的缘故，我们才没有过问。

雅各布决定十月份回德国去探望他的父母亲。最初，他们兄弟俩准备一块儿回去，后来，雅各布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大卫留下来完成学业。他笑着说："没有必要我们两个都回去，除非你想回去看望你的旧情人，如果那样的话，安娜会怎么想呢？"

雅各布预定了十一月初的机票，并通知了他的父母。他母亲极力阻止他，不让他回去，而雅各布却坚持要回去，并在卧室窗户的日历上作了标记：他在十号这一天上画了一个红圈儿。在日历上十一月份那张画下方，有一幅降雪图，图里有一片杉树林，杉树上方是一轮圆月，那月亮就像他父母的眼睛，每天都在注视着他。白雪皑皑的森林一片圣洁。

我们于十一月初到达伦敦。雅各布在城里的一所私立学校找了一份当教师的工作，布勒斯丁邀请我到他那儿去工作。我们得在那儿租一套房子。

一想到能回德国看望父母，雅各布的心里感到很宽慰。他在日历上画完红圈后就兴奋起来。另外，数年来我们第一次达成了一个



共识:我们应当在伦敦结婚。我从来没有坦率地给他讲过我母亲对他的看法;而他却情不自禁地自己下结论。这次是我向他提出去登记结婚的。我兴高采烈地看见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们一路上吵了一架，可还是我作出了让步。我们两人和解了,一想起最先发出和解信号的是我时,心里面就有一种宽慰。

雅各布在布勒斯丁那儿订了一桌菜,可直到我们要踏上开往伦敦的火车时,他才告诉我这件事儿。他是想让我大吃一惊。然而,我们离开伦敦到乡下之后一直没有原谅老板,因此一到伦敦,我就叫雅各布退掉了那桌菜。他想尽办法说服我,可我就是不妥协。这时候他发脾气了，第一次对我大加指责。我也提高嗓门儿毫不示弱,予以回敬,但不一会儿我又开始后悔了。

我心悦诚服,甘拜下风。

我们十一月六日到达伦敦,那里天气寒冷潮湿,还下着雨雪,寒风凛冽。伦敦的天空就像伦敦街上行人的脸——阴暗而冷漠。我们尽量不让这种天气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在帕丁顿街乘出租车到卡姆顿,一路上大家都沉默寡言。雅各布有一个熟人在卡姆顿,那人在曼彻斯特做生意,于是把他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住。到了卡姆顿,我们的疲劳得到了缓解。我们在客厅里点起一堆火,屋里一下子暖和起来。我们躺在火旁边的地毯上取暖。我搂着雅各布,把屋外灰暗的天气、刺骨的寒风,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俩沐浴在一片温馨和惬意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四处打听租房信息,我们得亲自出门去找出租的房子。我们俩现在的理想,就是能够厮守在一起。他一离开,我就心烦意乱,魂不守舍。我不能把我的感受向他倾诉,因为,我知道,他听了会增加他的烦恼。

直到十一月九号,我们才在我们初恋时的海德公园附近租到一

套房子。房子不大，后面有凉台，从高大狭长的窗户可以俯瞰街上的景色。客厅窗户下面的树枝上有一个鸟巢，里面的鸟已飞走。我们的房东身材矮小，为人处事谨小慎微。我们想等雅各布从德国回来后再和房东签租赁协议书。房东头上戴一顶帽子，他和我们告别时总喜欢脱掉帽子，并管我叫"夫人"，这令我有点高兴。

我们晚上在布勒斯丁那儿吃饭，我们一出现在饭店门口，整个就乱了套：布朗夫人向我扑来，在我的脖子上狂吻。我们坐在厨房边，布勒斯丁也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我想，我和老板各自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我们彼此无多少话可说。我们的餐桌上摆上了一道道美味可口的菜肴。待其他客人纷纷离去以后，布朗夫人特意为我演奏了一首钢琴曲。我和布朗夫人一起唱歌，雅各布只是点着烟在一旁听——他经常这样做。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慌，这种恐慌稍有机会就会向我袭来。雅各布的表情怪怪的，显得很陌生。他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张开双臂搂着我。

回家的路上，我们决定第二天去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

然而，我们的这项计划变成了永久的泡影。

雅各布准备乘坐的航班已被取消了。我们两人像幽灵一样，在屋里转来转去，厨房里饭桌旁的报纸撒了一地。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像街头巷尾的小贩一样，对着我们嘶叫。我感到闷得慌，打开窗户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树上传来乌鸫鸟的歌声。雨早已停了，天气晴朗起来，四周一片寂静，这时突然响起了歌声，听起来总让人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似乎还预示可能有噩耗传来。床边的桌上有一本书，我拿起书，一眼也不想看。我不知道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可当我把它拿在手中良久，又将它放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注意到红色书脊上有一只鲜红的手印，还是湿漉漉的，我的手也染成了血一样鲜红的颜色。我惊恐万状，冲进盥洗间，疯狂地洗手，又用指甲刷使劲

地刷洗我的手，想把手上的红颜色洗掉，当时我感觉我的手火辣辣地痛，原来是我的手被划破了两道口子，鲜血直往外流。

前天傍晚，我们俩在一起开心地玩的时候，希特勒的士兵就在德国的城市里横行肆虐，肆无忌惮地践踏和蹂躏着犹太人：他们抢劫犹太人的财物，烧毁房屋，亵渎犹太教堂，殴打犹太人，滥杀无辜的犹太人。因为那天晚上，犹太人的商店的窗玻璃被砸得粉碎，街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所以那天夜晚被人们称之为“晶亮之夜”。

雅各布那一整天都在给他父母打电话，可一次也没打通。他焦躁不安，如坐针毡，不断给他家里打电话，其实他也知道电话根本无法打通。我们两人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两个幽灵一样在灰暗的灯光下形影不离。快到中午的时候，大卫来看望我们。他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他有些害怕，一动不动地坐在墙角的椅子上，眼瞅着他的哥哥雅各布。他哥哥不停地一会儿拿起电话，一会儿又放下。

每次雅各布拿起话筒，大卫就要问：“你还打呀？”一会儿他又说：“你能打通吗？”

这种沉闷单调和压抑使我越发胆寒，我真希望他从椅子上起来，穿上衣服离开这儿。“你还打呀？你能打通吗？”这样的问话，就像婴儿的哭啼声。他那标致的身材，我以前觉得那样的可爱，而现在他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自私自利，胆小怯懦。我简直有些讨厌他了，我尽力控制住内心的愤怒，沉默不语，但我感觉得到：雅各布看出了我的心思。

第二天傍晚，雅各布终于打通了电话，这时候大卫已蜷曲在墙角的椅子上睡着了。他好像在椅子上生根了似的，雅各布要我把大卫叫醒，我总是不情愿去做，我告诉他不愿叫他。

电话一会儿打通了，一会儿又断了，打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妈妈说，他家开的书店已被烧成灰烬（也许是疏忽才说出了这些吧），他家的其他财产却未受损害。一个月前，他家的报社股份已被没收。关于这件事她不愿多说。她说，他们家幸免于难，这已经是不



幸中的万幸了。

我从雅各布的话音里听得出来，他认为他母亲还有什么事儿瞒着他。他在电话里对母亲说："让我和爸爸说说话。"

对方没有回答。我凑近电话，听见雅各布的母亲在抽泣。她平静下来后说，他父亲在德国人横行过后的第二天早上就病倒了。她说可能是当时德国人不让他解小便，憋出来的病。母亲说，父亲经常遭受一阵阵剧痛的折磨，想尽了办法也缓解不了他的痛苦。他们一过午后就爬进小轿车。她不会开车，他父亲只好硬撑着驾驶。他们把车开到沃菲尔私人诊所。她说她从护士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感觉到情况不妙。护士说沃菲尔医生不在家。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今天回不来。"

可老夫妻俩听得见医生在里面的讲话声。

"我要直接和沃菲尔医生说话。"

"他不在，对不起。"

"我听见他在说话！"

"对不起！"

护士准备带他们到门旁，雅各布的母亲一下子冲到了沃菲尔医生面前，医生一直在接电话。

"要是我给你们犹太人看病的话，他们会收缴我的行医执照的，"医生说，"我冒不起这个险。我拖家带口的，我有三个孩子……"

医生往雅各布母亲手里塞进一张纸条。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们的。"

纸条上写着"赫尔曼·霍利医生"和他的地址。他们走出诊所，老人身体状况很不好，但在老伴儿的帮助下，还是爬回到他们的小车里。夜暮降临，马路上又湿又滑。他加快车速，可他的腿突然阵痛起来，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腿。汽车最终还是控制不住，从马路上驶出来，撞到路边的护栏上，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夫妇

俩的手都被划破了，脸也受伤了，不过两人的伤口都不深。方向盘折断成两半截，但老人抓住方向盘的半个断辐，最终还是将汽车驶到公路上。雨水夹杂着雪水和血水，挡住了父亲的视线。汽车的一盏前灯也被撞碎了。

父亲一到赫尔曼·霍利医生诊所，就瘫倒了。霍利医生为父亲排了尿，但他却向他们收取了比沃菲尔医生高出四倍的医疗费。

现在，老人已经是卧床不起了。

"他现在正服着药。"母亲说，"我们的事儿你们就别担心了。事情已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两天以后，雅各布买到了去德国的机票。我劝他就呆在伦敦，可我又不敢给他施加太多的压力。他焦躁不安。他认为他可以回去帮帮他父亲。

"我要尽快把他们救出德国，越快越好。"他说。

那天，天下着雨，我送他到机场候机厅，那里的椅子很硬，让人坐着难受。天空挂着一层层雨帘，窗棂上挂满了水珠。我们俩手挽着手，静静地坐着，外面风雨交加，雨帘像透明的塑料鞭子，在机场上空不停地挥舞。

我们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外面的雨停了，我向他作最后一次道别。

我把下面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作为我自己的消遣，以消磨时光。他们在吸烟室里打赌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陆地。"准点到达。"那位学识渊博的帕尔森博士说。他头戴帽子，来回不停地走动，号召那些有心参加赌博的人，押上一百个冰岛克朗。这时有人问道："要是有雾怎么办？"这时候我想到了你，或许是因为我看见床边桌上抽屉里的一本《圣经》，或许是因为我总觉得你就像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

我看见了那个家伙。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他肯定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他总是闲不下来，从不多言多语，不会说："我这样做会如何？那样做如何？"也不会问："难道我要把什么东西都付之一炬吗？兴许最好是让别人干，或许等到明天再干。是的，我希望推迟到明天做更加吉利。"

不，他决不逃避责任，人们天天都能看到他的工作成绩。战争、疾病、死亡、饥饿；口头许诺、背叛、嫉妒和欺骗；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人类永远会结党营私；我们听到阴暗角落里的窃窃私语，知道他们在酝酿阴谋诡计。他所做的事永远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他从未有过空闲，楼下的人也一样繁忙。

你呢？你怎么样？有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干吗要躲在烟雾里呢？

我曾经生过你的气。我不能理解你。我常常自我反省，我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可我慢慢睁开紧闭的双眼，我想，你的冷漠一定事出有因。我曾扪心自问：他是不是懦夫？也许他丧失了斗争的勇气。他使人们怀着被拯救的希望而活着，许诺人们会死而复生。要是让我用以下这种方式经营迪通饭店，效益肯定会好：让客人们喝西北风；给客人们许诺：用睡觉减轻饥饿。

要我相信你的存在吗？唉，我也是不得而知。要是我能轻而易举地以某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心安理得一点。可不幸的是，我不可能那样做。有时候，我把你和地下室的男孩子混为一谈。你们俩到底是谁隐藏在背后？我偶尔翻翻报纸，看到一些有关灾难的报道。可答案又在哪儿呢？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的桌子上，照在蘑菇上，照在黑梅上，照在鸭子和大雁的身上。和煦的春风把户外的白杨树吹得嗖嗖作响。在萨默尔塞特的家里我经常想起你。在那里，老奸巨滑的地主们一个个栽倒在那些厚颜无耻的暴发户的手里。许多家族历史源远流长的绅士们都遵奉中庸之道，他们蝼蚁不伤，到头来仍是一无所有，徒有虚名。还有，那些世代兴盛的人们也



不例外。我无意诽谤他们，相反，我在为他们难过。

霍尔格雷姆·帕尔森在向其他旅客挥舞帽子鼓动他们参赌的时候，我的思绪还在不断地驰骋。

“要是有雾怎么办？究竟怎么办？”

随着秋天的来临，即将消逝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也变得美丽动人起来。夜暮像燃烧升腾的烟雾笼罩着小河，飒飒的秋风声也开始减弱。我们一起在荷花池边漫步；我们手挽着手站在小树苗围成的篱笆前，倾听着各种声音，因为这些声音是那样的轻柔。

“关于那个花店老板的流言蜚语……”安东尼说。

我打断了安东尼的话，叫他别作声。

“你知道，那件事儿纯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

我记得小时候，微风时常将石楠的气味儿和沼泽里潮湿的、像绒毛一样的尘土吹送过来。有时候，我坐在地里等着爸爸干完活回家，我还听见远处的马蹄声。我脑子里响起爸爸当时说话的声音："迪萨，亲爱的，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呀？"

随着秋夜的临近，各种响声发生了变化。有时候我并不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还会想办法去回避这些声音。我有意识不从老房子的大厅经过，走路时故意轻轻地挪动脚步，故意让落叶的声响掩埋我的脚步声。

你在干嘛呀？大地不会辨别你的脚步声，你走过以后，你的脚步声自然就会消逝。

要是我站在大厅对面叫他的名字，连我叫他名字的回响声也听不见。“雅各布！”我大声喊道，“雅各布！”一片寂静。他走以后，我想尽办法和他联系，同样是一片沉寂。死一样的寂静。

安东尼的堂姐——高尔斯华绥女士，六十多岁。她身材高大，鹰钩鼻子，鹰一样的眼睛。圣诞节前她在我们这儿住了差不多一周



时间。这已是发生在两年以前的事儿了。“你们结婚吧，”她说，“不为别的，就为了面子。”

她用白色手绢儿揩了揩她那红鼻子上的汗珠，然后又对我说：“亲爱的，你的肉羹做得真好吃！要是我家的厨师能做出这样好的肉羹，那该有多好啊！”

她在我们这儿住了将近一周时间。让我觉得幸运的是，她得了感冒，在床上呆了三天。这几天我尽可能不和她讲话。

小时候她和安东尼经常一块儿乘雪橇去看他们的爷爷。

“你还记得我们摔倒那件事儿吗？你站起来对我说……”

“好肉羹，亲爱的。为了面子，不为别的。”

“我想要你弄明白，有关我们的事是纯属谣传，”安东尼又说，“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

我们一起走回家。我忍受不了这样的软弱，正打算责备他几句，我突然听见微风送来一阵悦耳的笑声，我只好住口。我敢肯定那是小孩的声音，而且是一个小男孩的笑声。好像他和他母亲一块儿走过来了。

“纯属无稽之谈！”他说。

田野远处带有蓝色的黄昏，就像轻轻向前推动的波浪，慢慢地覆盖着荒无人烟的海滩。

我们将在明天早上九点钟到达冰岛。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非常高兴能够从死寂、沉闷的旅途中解放出来，可一想到要回家，我又感到忐忑不安起来。

我将对他说点什么呢？我想说的话也就是一句结束语。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帮他。他能知道我的什么事呢？他想知道我的什么呢？我想他所知道的有关我的事情很少。

我一边听着秋雨打在舷窗上的声音，一边问自己：你干吗要这



样做呢？为什么？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有一位乘客说，他刚才看见两只海鸥飞过去了。我走到甲板上去，我想我看见了薄雾里的一只白色的翅膀，它变成一缕亮光消失在空中。我看见迷雾中有一块石头，上面长满了海藻，还有一头海豹。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我企图控制思绪，可又无能为力。

“小丑”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期待着夜晚的到来。他们刚刚理完发，湿漉漉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头上还冒着热气。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瓶开胃酒，满脸堆笑，一个个看上去就像苔藓上长的蛞蝓虫。他们轻松自如，不慌不忙。他们已是第四次整理领带，对着镜子喝酒了。

女人们一定还在往她们的鼻子上涂脂抹粉，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聚餐了，所以她们得精心打扮。明天，她们得重新回到那灰暗、忧郁的生活中去：晚上小孩哭泣，白天无所事事；晚上偷偷摸摸喝上一杯雪利酒，以此排遣她们心中的郁闷。轮船的螺旋桨还在不停地转动，船上的一道道铃声昭示着我们的航程即将结束。有时候某人晋升了，会举行庆祝会。“他晋升的是总会计师。”妻子对她的朋友们说，同时用钦佩的眼睛瞅一眼她的丈夫，丈夫则谦逊地低下头。其实，他心里认为自己即使做总会计师，也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他多年来辛勤苦干的回报。

我再次回到吸烟室，里面的人还在玩扑克。那位学识渊博的博士喝第一杯酒就显得醉意朦胧了。他极力躲避我的目光，很显然，他想起了我们上一次的谈话，所以他想尽力避开我。

他的一个同伴向我打招呼：“晚上好！夫人。你能和我们一起玩儿吗？”

我的思绪又转到了安东尼。

那年春天，我们打算将路边的石墙和我们的房屋与暖房之间的墙壁修补一下，北边的客房也得重新贴上墙纸和涂上油漆。当然，台球室和棋牌室也应该铺地毯了。安东尼说，网球场周围的护栏网也该及时换了，而我觉得温室里的玻璃也该马上换掉了。还有就是一年一度的大扫除，这件事儿通常是马歇尔干。现在我们不能指望他了，因为他一周前从拖拉机上摔下来，滑倒在木板上，把腿给摔坏了。

我对安东尼说："他身子骨大不如从前了。他老啦，这你知道。"

安东尼轻描淡写地说："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关。"我接着说："也许别人能代替他完成这繁重的春季大扫除。"

"最好由你来告诉他这件事。"他回答说。

毫无疑问，我们俩都没有勇气向老人讲这件事儿。不是我们没事儿找事儿做，因为离第一批客人的到来时间，已经不到一个月了。过去从劳务公司雇来的工人让我们很失望，而且价格贵得很，因此我们只好另外打广告，招聘临时工来帮我们打扫。

经过认真审查各方寄来的报价，最后，我们决定雇佣萨雷的两名工人。我们之所以选定他们，是因为他们自称曾在乔德温的格林爵士家里干过这种活。

乔德温的人都知道，那两位工人在他们那儿干过活。安东尼说："格林爵士的房子才建七年时间，就有人建议他把房子拆掉重建。格林爵士这人不错。"

我叫安东尼问一问格林爵士，摸清两位工人的底细。他因种种原因未能去做。

第一周，工人们干活挺卖力。他们住在东边的偏房里，大清早就起床，全天干活。吃饭也迅速，而且无多话可说，晚上睡得也早。两位工人都是三十多岁，一个身材瘦小，另一个粗壮矮小。头几天，



他们从外面开始，因为这几天天气温和干燥。暖房外几块石头很快就恢复了原位，大门两边的墙一经粉刷，也焕然一新了。他们开始在网球场周围安装新网栏的时候，天下起雨来了。我要他们进屋来躲躲雨，休息一会儿，可他们坚持披上雨衣，穿上雨鞋后继续干，外面的倾盆大雨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我感到更加轻松，我告诉安东尼说，要不是这二位工人，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刷油漆的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可就在这些时候，他们吃饭的时间也开始拖长了，晚上睡觉也比以前晚多了。每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就在台球室里玩牌，有时候他们还玩拉米纸牌游戏①，但大部分时间是玩扑克。我怀疑他们是在赌博。

安东尼有时候晚上去探望他们，在我看来，只有稍矮一点那人对安东尼比较友好，因此，我认为他肯定不会经常去看望他们。后来，我告诉安东尼，晚上过去，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儿。

他们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将近三个星期。在此期间，我外出短期旅行了一趟，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要带上玛丽琳外出旅游两三个星期。我们最远到汉普夏郡或德文郡，有时候到威尔特郡或康沃尔郡。外出旅游主要是为了寻找价格合理的新鲜蔬菜。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农场——每天要走访四五家。当然，我最喜欢去韦克菲尔德家。多走几家农场，和人谈起价来能做到心中有数，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话又说回来，我心里明白，他们供给我们的东西并非全都是好货。比如，我习惯于买汉普夏郡利普胡克的鸭和野鸡。我可以放心地将订单放在桌子上与韦克菲尔德先生做生意。他会看见下面的名称：“利普胡克养殖场，供应一万只野鸡蛋、送一些蒙古禽蛋，价格合理（我有意识将“价格合理”划上红线以引起他的注意），非受精的蛋不要，还有野鸭，等等。”

---

① 这是一种纸牌游戏，其基本玩法是形成三四张同点的套牌或不少于三张的同花顺——译者注。



我们还没有到索尔兹伯里的郊外，我就感觉有点儿不舒服。教堂的尖顶在我们前方的森林里露出来，天空中有几朵漂浮不定的云彩。教堂的尖顶就像一根食指，直指苍穹，形成一幅令人鼓舞向上的景象。无论是在车上，还是以后的时间里，我都没有表现出我身体不舒服。我们在一家养猪场外停下来，下车呼吸一下怡人的空气。我们像往常一样环顾四周。随着时间的延长，我感到越来越不舒服。我们决定在利普胡克吃晚饭，并在那儿住一宿。当我们吃完晚饭，坐在客厅里喝咖啡和葡萄酒的时候，我突然想回家。也许只有玛丽琳了解我的心思。于是，她马上收拾起行李，叫来司机上路回家。司机可能早就睡着了。

回家的路上，大地笼罩在白色的雾霭之中，天空时不时地从雾霭中露出笑脸。我们在艾冯郡一座狭窄的桥上停下，我打开车窗，听见夜幕中有猫头鹰的叫声。一缕光线从远处的乌云里透射出来。

我们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一点钟了。我们主楼窗户的灯光还亮着。我刚一打开门就嗅到一股烧木柴的烟味儿，烟窗里还在冒着烟，前门大大敞开。我径直走进屋，来到台球室。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邻居赫尔姆斯代尔伯爵，他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向我点头打招呼。我再走近一点，便看见了安东尼和那两个工人。安东尼用醉意朦胧的眼睛望着我。他喝得酩酊大醉，软软地趴在牌桌子上，一言不发。工人们也喝得烂醉如泥，但神智还有点清醒。

矮个子向我招呼："欢迎您，夫人。"

另外一个也说："欢迎您光临我家。不过，下次你进门时应该先敲一下门。"

"你的鞋也应该擦一擦。"

说完，两人像疯子一样大笑起来。

地板上到处是空酒瓶：威士忌酒瓶、杜松子酒瓶、红葡萄酒瓶、1951年酿的玛尔戈红葡萄酒瓶，还有一瓶1945年产的蒙顿酒。其中玛尔戈红葡萄酒和蒙顿酒是我作为一种投资存放起来的。赫尔

姆斯代尔伯爵这时已是鼾声雷动。安东尼从自己头上取下猎帽，两眼直直地盯着帽子，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它似的。

“我们的伙计安东尼上次赌博时把房子给押上了。”矮个子说。

“我们有字据为证。”另一个接着说，还向我摇晃着一张已经发黄的纸片儿。我一下子认出来了，这是我用的信笺纸，只有我房间的抽屉里才有这种纸。

“你们敢！”

“我们雇佣你为我们做饭，这样就有人服侍我们了。”

“还要为我们洗洗涮涮，其他人和你一样，也干这些事儿。”

“你们会为你们的这种行为后悔的！”

“安东尼，醒醒，醒醒伙计。说说那位花匠的情况。”

这时候，我气恼极了。我走到地下室，飞快地打开放武器的房门，抓起一把布朗宁式双管猎枪，快速上膛，冲到楼上。玛丽琳正好给我们送东西进来。

“迪萨，出什么事儿了？”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一口气跑到台球室，径直冲到牌桌前，用猎枪对着矮个子，然后又对准他的同伙。

“滚出去！”

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给吓呆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义愤填膺，对准壁炉开了一枪。枪声震响了整座房子，穿过烟囱，惊醒了树上的飞鸟，震动了阁楼里的鬼魂，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那两人惊恐万状，向门口冲去，落荒而逃。我紧追不舍。我见他们放慢脚步，又开始放枪。

“伤到他们了吗？”赫尔姆斯代尔伯爵大声问道。

我叫他继续睡觉。

第二天，我吩咐司机在村里去继续找那两个人，他带上那两人所用的工具以及他们应得的工钱。我盘算了一下他们偷喝的那瓶蒙顿酒的价钱，我敢说，他们从来没有喝过那样昂贵的酒。



拉斯托克警署狭小而简陋，就在图书馆旁边，大门上方挂着一个小牌子。从远处看，就像一只闹钟的发条和齿轮。从近处看，弹簧就像一束凋零的花，齿轮呈“S”形或者像1888年的3个“8”字形状。这幢房子曾住过一个开花店的人，现在能够记得这件事的人已不多了。可住在这里的警察没有把那个牌子取下来。这儿的警察没有多少事干，街上的车辆一点也不繁忙，居民们过着恬静舒适的生活。因此，他们大多数时间就是在那幅凋零花束的图画下面，接待来访的人们。

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完全没想到会遇到我所描述的事件——事实上，我和雅各布的到来对他们单调的生活是一种调剂。

那天上午，安东尼托人给雅各布捎个信，叫他尽快到警署去见他。我们骑车尽快赶到那儿，但当我们快到的时候，我的自行车前轮爆了。我叫雅各布一个人先去，我独自一人推着自行车到城里把轮胎补好。那天寒风凛冽，我却骑车骑得满头大汗。由于我的衣服单薄，所以还感到有些冷。

雅各布、安东尼和两个警察就在接待处的房子里，坐在桌子前的那位警官显得非常焦躁不安，口里不断重复着说：“肯定是弄错了。”说着，他看了看墙上的闹钟，然后又说：“他们应该当时就离开了。”

墙上的闹钟正在报时，外面有人不时地从窗前走过，并用手碰碰帽檐向里面的人打招呼。一切平安无事，雅各布打开门，并示意我和他一起出去。安东尼还坐在屋里的桌子旁。他脸色惨白，但还是勉强对我笑了笑。他好像一直在哭。

“有人指控安东尼有猥亵行为，”我们到了街上，雅各布向我解释说，“指控安东尼的人可能就是与他来往的那个年轻人的父亲。”

“你说有人指控他有猥亵行为？”我诧异地问道。



“与人同居。迪萨,他可能惹大祸了。”

我刚听到这事儿,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安东尼叫雅各布去与那孩子的父亲谈判一下,达成一个协议。警方也感到这种事有点棘手,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今天晚些时候,我去找那位老人谈一谈。”雅各布说,“这种事儿挺有意思的。”

小男孩儿的父亲原本就是一个十足的骗子,他是想敲诈安东尼一笔钱。小孩的父亲和雅各布谈判,男孩本人就在不远处来回走动。他父亲还在不时地骂他,吓唬他。这位年轻人看上去不到二十岁,他默默地听着他父亲的话,一言不发。雅各布觉得那男孩子看上去也是贼眉鼠眼的。

毫无疑问,那人的要求非常过分。但是,在雅各布两次起身准备走之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父子俩可一次性获得一笔钱。这笔钱是那家伙当初索要金额总数的四分之一。双方签下协议。协议规定,安东尼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猥亵,因此,父子二人今后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方式找安东尼滋事。

安东尼接到我们给他送去的协议书时,流下了眼泪。虽然这件事儿实在荒唐,但我们还是因为帮了安东尼一把而感到高兴。然而,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打听他对雪莉·琼斯小姐的看法。

每当我们做错了事,让母亲生气的时候,她就经常对我们这些孩子说:“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别那样说,迪萨。这样会玷污你的灵魂的。你们在上帝面前,应该品行端正。”

孩提时,我们觉得上帝的眼睛总是在盯着我,有时它简直和我形影不离,当然,上帝有时也被我愚弄了一下。或者说,我有意违背上帝的旨意。

到十多岁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上帝的目光是那么傲慢、自大，而且过分彬彬有礼。有时候，我脑子里浮现出上帝的身影：一个老人站在一条长凳上往鸽子群和欧锦鸟群里撒面包块儿。当鸟儿们在他的脚下争抢面包块儿时，他又生起气来。

岁月的流逝使我把这些东西渐渐地忘掉了。当乔朗恩和我都住在雷克雅未克时，以至后来我乘船来到英国这段时间，由于我总是无忧无虑，因此很少考虑过死亡或生命的结束。所以，上帝的凝视就悄然在我的脑海里消失了——还有他的正义之举：死亡；他洒向人间的爱——只是一种蔑视；他对人类的抚摸——只是一种打击；他对人类的怜悯——就是死亡。上帝离我而去，悄悄地；他向小鸟抛洒面包屑，然后便心满意足地看着他们在他眼下争抢。白天阳光明媚，夜晚温暖如春，就像一件硕大的斗篷掩映着人间沧桑和喜怒哀乐。我根本听不到一点责备的声音，也没有见过什么英雄壮举。

上帝的仆人轻声在我身边说："人生旅途，惟有死亡是归宿；仁慈的耶稣说：'赐给他最后归宿吧！'安东尼在你的教堂里默诵着你的这些教导，因为他知道是他自己的行为激怒了你。尽管你的谎言不断，用永无止尽的诺言诓骗信徒，生命的结束尤如灯火熄灭，什么也不会留下。"

我没有死守你的吻的青睐，也没有屈服于你那遮天蔽日的大手。我完全获得了自由——直到我打电话告诉母亲说，我和雅各布定婚的事儿。那天夜里，你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我，让我做梦也没有逃脱你的跟踪。你声声责备，诅咒报应。

我半夜醒来，一阵惊诧，感到身心疲惫不堪。上帝一直凝视着我。我和他的目光相遇，突然间我认出了那目光，转瞬间面纱被揭开，那凝视的目光，原来是来自我母亲的双眼。这目光若干年来一直在追随着我。

顾影自怜起不了任何作用，事情照做，一切如初。燃烧的蜡烛，那弱不禁风的火焰流淌着滴滴泪珠，可它在奄奄一息之际仍在寻求着自己的价值。我们无法知道暗藏的东西，只会顺其自然。我站在窗前，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我们惧怕黑夜的降临。我们不去审视自己的灵魂深处，只说这是命中注定。

半小时前，我服了一片止痛药，我感到神情恍惚。我的手指抓住药瓶，但却没有力气握紧，只好松开。尽管我眼前一片模糊，一个字也看不清楚，但我知道是《自己动手》这本书。

艾冯郡普尔特尼桥旁边的巴斯镇有一个小码头，码头上挂着漂亮的红灯笼。人们可以在灯笼旁边的座位上歇歇脚。我记得老人们经常来这里坐坐。那些退休的或者无所事事的人们常来到江边欣赏那川流不息的江水。然而，我还记得，我也看见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手挽着手迎着夕阳的余辉在码头上散步。他们头挨着头，说着悄悄话。他们不担心天下雨，就像在公园里一样，天一下雨，他们就可以争抢着冲到树阴下躲雨，这样会给他们增加许多乐趣。

大卫真正搞清楚了雅各布和他父母都住在布痕瓦尔德①的情况之后，我才独自到萨默尔塞特去领取我的行李。这些行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一些书籍和衣物之类的东西，都装在几个不大不小的箱子里。我把其他东西放在那儿，等以后我和雅各布两人一块儿去取。

晚上，安东尼也来帮我的忙。我们一道去巴斯镇。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江边散步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江面上吹来刺骨的寒风，凳子上方的雨篷显得破破烂烂，灯光也不如从前亮堂。安东尼想说服我，要我改变主意，不要回冰岛去了。

“你可以住在我那儿。”他对我说，“我那儿有空房子，雅各布很

---

① 原德意志联邦西南部一个村庄，法西斯德军于 1937 至 1945 年在这个村庄设立集中营，在这里残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译者注

快就会回来的。”

但是，他只是一厢情愿地这样说，是江风将他的话刮出来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吹跑了。其实，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呆不了多久。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使我想起雅各布。

“没有他……”我想开口回答安东尼的话，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知道，我们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德国人放他回来的时候，我也会回来的。否则，我只有永远呆在冰岛了。”

“到时候，你们两人都会回来的。”

“是的，我们俩都会回来。”

开往伦敦的列车继续向前飞奔，好像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火车的呼啸声划破夜空，好像要把人们记忆中的往事永远甩掉。我感觉极度困倦，却又无法入睡；我全身无力，但又感觉不到一丝疼痛。他为什么偏要离我而去？我为什么要让他走呢？

幸好，整列火车乘客不多。我有好几年没有乘坐过这趟火车了，但我还是记得我曾经在那一节车厢里呆过，里面的任何东西我都记忆犹新。我看见我前面座位上有一个小孔，里面的垫料已经从洞孔的中间凸出来了。座位的颜色是红的。

我们到达伦敦的时候，天在下雪。我简直被这里的天气搞得莫名其妙。

我还有希望见到他吗？我不知道，我搞不清是什么时候放弃了这种希望，我更不知道我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有没有效果。

众所周知，当时的布痕瓦尔德是一个集中营，可有关那里的种种内幕，我却是在后来才了解到的。我绞尽脑汁猜想集中营里的境况：我看见雅各布在干苦力。我自我安慰说，雅各布吃得了那份儿



苦，因为他的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随着种种谣言的散布，我想象的事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理想了。我脑子里有关集中营的情况就显得一天比一天可怕了。可是，我人在冰岛，这些事情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无论怎么设想，也于事无补。

我们回家乘坐的是布鲁阿夫斯号船，一路上很不顺利。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我就是呆在船舱里的。我患了感冒，胃一直不舒服。我的脑海里有时候出现雅各布在机场与我告别时的情景。他仿佛变成一个影子，我突然站起来，我的鼻孔好像被一块湿布堵住了，眼前灰蒙蒙一片。父亲答应我到雷克雅未克来接我。我想控制住，自己什么也别想，只想父亲接我时拥抱的情景，想一想我那思念已久的妹妹乔卡的笑脸。有时候，我肯定显得神志不清。船长后来对我说，他老在为我担心。我转念一想，觉得神志不清倒也不是一件坏事儿，这样我就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时间打发得也快得多。

回家以后，有一周的时间我卧床不起。有乔卡和她丈夫冈纳，还有他们三个月大的小女儿赫尔加的陪伴，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心情也很愉快。回家的头几天，父亲每天都来陪我，后来他要动身去北方，去那里探望他的病人们。父亲动身前在弗乔卢卡塔五十六号的波利·哈拉德逊家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哈拉德逊是一位银行经理。他说他妻子得了病，得的是一种忧郁症，自从他们的儿子出国以后，她的病情就加重了。

“她一定很虚弱，”父亲说，“他们家要雇一个厨师做饭。”

“要不要住在他家？”

“亲爱的迪萨，这得等你的病好了再定，你以后可以在博格宾馆的西威辰那儿找个工作，一切由你自己作主。”

父亲本人并不认识波利，但他说维尔嘉摩尔·博格对波利博士评价不错。

我养成了散步回家后抽雪茄烟的习惯。我每天坚持锻炼，恢复体力。有时候我去拜访林森夫人，但大部分时间就是去码头看海。

天大多是灰蒙蒙的，但有时候也晴朗无云。冬日的阳光照耀着万里晴空。在这样的天气里，晚上可以看见明亮的月光。十支一包的雪茄烟，我每天控制在五支以内，这样我每天都有期望的东西。

休息了一个月以后，我便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可以上班了。第二天，我父亲就给弗乔卢卡塔五十六号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已到了。

我们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这就是我过去常常站在港口注目观望的大海。我曾在码头上抽雪茄，将烟雾喷向那冷漠无情的海风。艾斯加山就在前方，大山上的罗马大教堂、天主教堂以及码头上的库房清晰可见。我闻到一股烟味，于是我的烟瘾也来了。我们乘坐的船快要靠岸了。海鸥在上空盘旋，好像它们得到了秘密情报一样，静静地在上空盘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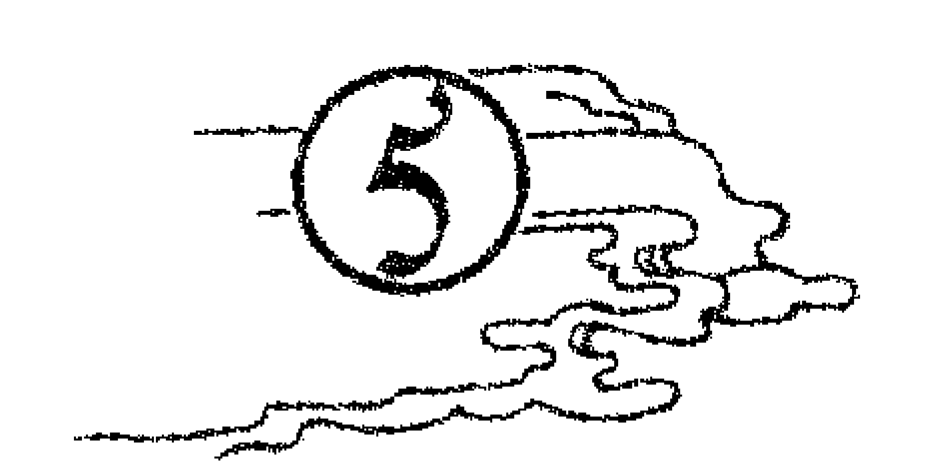
昨天晚上狂欢之后，船上的旅客们大都还沉浸在昨晚的欢快之中。有一位年轻人，他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歌手，尽管整个晚上大雾弥漫，但他还是打赌赢了。有时候，一看外面，他就说他感觉见到了冰岛。船长说，如果没有大雾，早就可以见到陆地了。霍尔格雷姆·帕尔森欢呼起来。歌手也唱起了《祝福你，夏日的阳光》，唱给那些还沉浸在威士忌酒和松子酒中的人们听。我离开甲板回到船舱里，爬上床，脸朝着墙壁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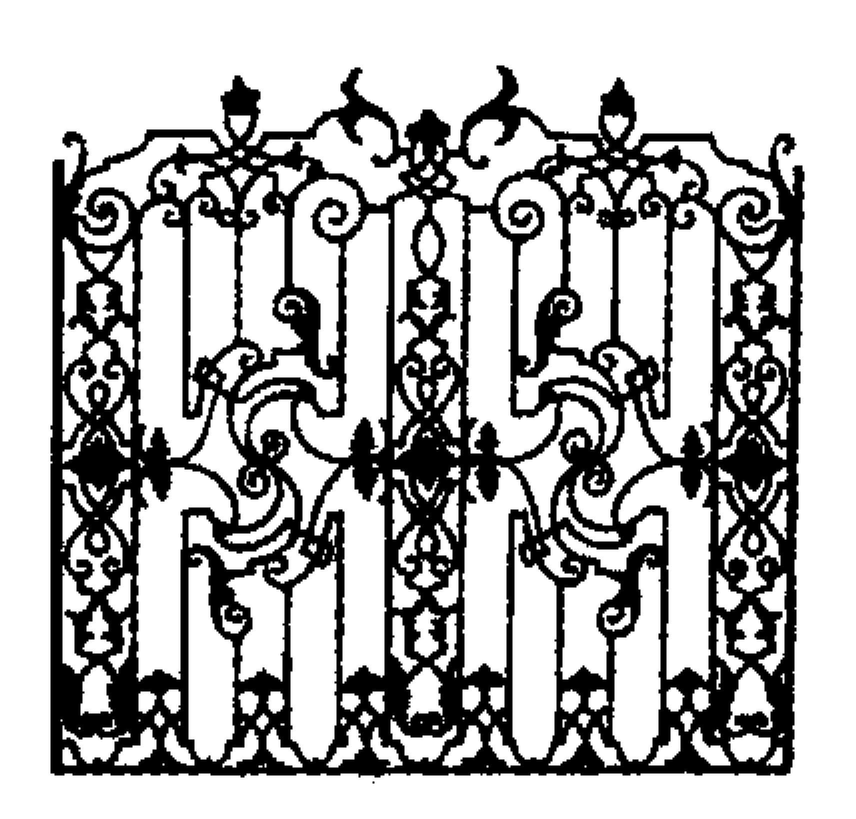
船上没有歌声了。旅客们一个个红着眼，脸色苍白。住在一等舱的一名男子和一位住在二等舱的女子整个旅程都住在一起。现在他假装不认识那女的，因为他的老婆和两个女儿正在码头上等着接他。母女三人都穿着红衣服，向正在靠近的船挥手。男子局促不安地向岸上的家人挥着手。博学多才的帕尔森一直沉默不语，他终于和他父母打招呼了，或许他现在正后悔当初没听我的劝告。

我到冰岛后，乘出租车到我下榻的博格宾馆。

“阿斯蒂斯·乔恩斯蒂尔，住六天。”接待处的女孩说。

当我打开房间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空虚。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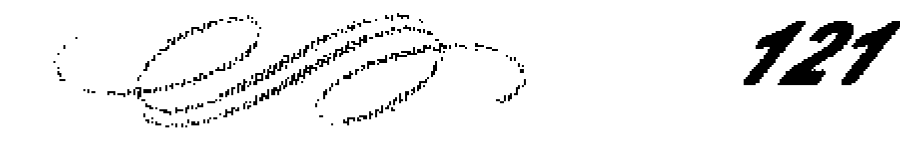
后来，我记不清楚，我第一眼见到的是一盘苹果，还是透过厚厚的窗帘缝隙里照射进来的阳光。自从离开英国以后，我就没有见到过那样的苹果了。红红的苹果，像红宝石一样发亮。我迫不及待地想走过去摸一摸。我走近桌子，果盘下面是一块圆形黄布。最后我停下了脚步，伸出一只手去抓太阳的光束，可手的影子最后落在灰暗的客厅里的苹果上，我立刻缩回手，让阳光继续照射在苹果上。

这时候我背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要是苹果被人忘记的话，也会腐烂的。"

说话的声音既温柔又熟悉，所以我也没感觉有什么害怕的。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然后又漫不经心地看着眼镜。他没有把眼镜重新戴上，而是用手指一会反时针，一会又顺时针方向摆弄着。

"天快要黑了，"他终于开口说话，然后将果盘上方的灯打开。"冬天的夜晚又黑又长。"他说。

我正准备说，要是他将厚厚的窗帘拉开，仍然可以见到光明。



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我今天早上被一群黄脯鹧叫醒了，”他接着说，“这些鸟在昨天晚上的一场雨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我喜欢欣赏这些鸟，所以一大早我就到凉台上去，迎着晨风，好好地观赏观赏那些可爱的小东西。”然后又沉默不语，完全停止住那无聊的话题。他邀我坐下，而他自己却站着，手里还拿着那块手帕，开始习惯性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冬天给我妻子带来很多不便，当然，要除去基督降临节，在这期间，她总是要参加圣诞节的准备活动。她在屋里整天忙忙碌碌，把每一间房子装饰好，从早到晚点上蜡烛。该做面包和薄饼时，她也能帮帮忙。我家的房子天天都弥漫着香味。她脸上露出了笑，亲爱的，她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可现在圣诞节已过了。有些人觉得冬天过得很慢。”

他的身材粗短，但不是很胖。他比报纸上的照片看上去要快乐得多；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但却显得冷淡；他两鬓斑白；他的双手却长的纤小，与他的体格一点也不相称。

“你不久就会知道，她冬天很少走出家门。天气不好，她就呆在床上，要是高兴一点，她就坐在对着阳台的门口，这样可以观察到外面的海滩。她是西部人，所以喜欢看海。你应该了解这些东西。”他笑了笑又说：“她是一位考帕斯克尔姑娘。”

我点了点头，含糊其辞地附和他，表示我理解了他的谈话。

“她老是消化不好，我们得想法让她多吃东西。我家的保姆尽心尽职，但她只知道一些基本的常识，其他东西就知之甚少。我想，吃一些营养好的东西可以让她恢复健康。我认为这样做肯定能奏效。”

他停止讲话，注视着眼镜片上的影子。他似乎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个话题。他正准备重新开始讲话，这时候楼上有人喊他：

“波利！上来，波利……”那人喊得声嘶力竭。

他开始朝外面走，显得有点焦急。他请我原谅，然后就出去了。听他的脚步声觉得他似乎走得很慢，甚至是拖着脚步向楼上走，他走到二楼，轻轻地敲开门，说：“我亲爱的……”

我打量着屋里时髦的家具：一张盖着红色绒布的沙发，还有与之配套的两张椅子；红木桌子，一个瓶花；一只鹰的标本；还有一幅女人画像，女人手里捧着一本书。那女人身材苗条，美貌动人。但我看得出，她眼神里分明流露出一种忧伤。我正打算走过去看一看，一位女孩进来了。女孩长得不高，显得活泼可爱，年龄不到二十岁。

女孩向我解释说：“那就是这家的女主人，这是她年轻时的画像。”

然后，她自我介绍说，她是这里的保姆，名叫玛丽亚。

“你好！我叫阿斯蒂斯。”

她打量打量我，然后冲到红木桌子旁，拿起放在一本杂志上的半瓶雪利酒。

“他喝不完这瓶酒，”她自言自语地说，“这瓶酒昨天晚上就放在这儿了。”

她用围裙的一个角摸了摸桌子上的灰尘，然后向我道别，祝我好运。

门外，云层遮住了太阳。桌子旁虽然有灯，盛苹果的盘子仍有一道影子，好像苹果的影子被盘子吞噬了一样，苹果上没有了光亮。我几乎已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不久，天上的乌云散去，下午晚些时候，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照亮了苹果，同样也照亮了我的心。

“其实不怎么费事儿！”我思忖道。

不一会儿，波利就从楼上下来了，确信客厅的门被他关好了。

他又开始讲他的经历：

“我曾经和一群与我素昧平生的人见过面。可当我与他们隔着



桌子面对面坐着的时候，我又感觉好像和他们似曾相识。我感觉到我和他们在同一张桌子，同一张椅子，一起讨论同一件事儿。我甚至想象我曾听他们和我讲一样的话，做同样的动作。霎那间，我好像看见他们中有一个人镶了颗金牙，这个人一直呆呆地坐着，我见他张开嘴，心里很不舒服。我想起了最近在《冰岛幽默》里见到的一则笑话，准备讲一讲。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是不讲笑话的。对方笑个不停，但只是抿着嘴笑。他终于与其他人一起放声大笑起来，他嘴里的金牙也终于放出了光芒。我兴奋得简直要发疯啦，这种状态一直伴随我度过了整个聚会。后来我想起了小时候祖母给我讲的话：人心的奥秘最深。唉，真是如此。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难。”

外面传来吵闹声，他听了听，一动不动地呆着。不一会儿，有人敲门，玛丽亚探着头进来，然后说：

“牧师来了，他在书房等你。”

“请给他一杯咖啡，我一会儿就来。”

“嗯，阿斯蒂斯。”

“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有关我的情况？你还没问我呢。”

他笑了笑。

“没必要，我们家不那么讲究。我知道怎么做，维尔嘉摩尔有没有给你讲有关工资待遇的事儿？”

我点头表示知道。

“如果不嫌弃这份工作的话……”

“我不胜感激。”

“……玛丽亚会带你去你的房间，给你介绍一下厨房里的所有炊事工具，你的卧室每天早上就能晒到太阳，厨房也一样。即使秋天，也能够晒到太阳。你周一就上班。如果可以的话，越快越好。这是迷信，你知道……这要看你自己的决定。”

“我喜欢周一开始上班。”我回答说。

他伸出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然后他便离开了。

我到街上去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又刮起了大风。我的双腿都是雪。离开房子不远时，我回头看了看，我看见顶楼上有一张面孔在看着我，那张脸像雪一样白。我一瞥见它，它马上就消失了。

路上的积雪覆盖了我的脚印。

在波利先生家的头三个星期，我没有见到女主人。玛丽亚常常是早晨来上班，晚上回去。如果波利家里有客人来访，她就晚一点回家。她单独有一间房子，在阁楼上，不回家的时候她就住那儿。但由于房子的供热不够，所以她在这儿住的时间很少。她负责传达女主人的口头指示，有时候女主人也写个纸条什么的。无论是口信或纸条，大都是关于做饭菜的事儿。例如，她要求我与她熟悉的两位船长联系，他们能帮忙搞到商店里买不到的东西。她还要求我和住在哈夫纳夫乔多尔的丹麦人取得联系，他专为丹麦使馆供应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我注意到，她的病在一天天好起来。天气好的时候，给她送的东西她会全部吃完，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她还喜欢在房间里放留声机，差不多都是莫扎特或威尔的作品。玛丽亚告诉我说，夫人赞扬我的饭菜做得好，而且说要亲自见见我，可目前还不方便。我听了没有说什么。

挂在炉边的那面蓝色的小镜子成了我的朋友。然而，凡是照在镜子里的东西，我都讨厌看。有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喜欢我和想念我的人，在用镜子看我。有时，我还联想到我和雅各布在附近森林里的水塘边嬉戏玩耍时的情景；在通往我们住处的车道上，车轮的辙印形成的小水潭倒映出我们俩的身影；有时候，清晨的地面升起一股水蒸气，好像是地球在呼吸着空气；有时候，好像地球在和我们交谈。

也许画架上那些人工绘制的花让我受到感触，至少是这些花让我回想起美丽而善良的东西。有时，我想到附近去请一个木匠，帮

我做一个相同的画架，按照我的指点涂上油漆。可我没敢这样做。

有一个星期六，吃完午饭不久，女主人终于派人来叫我去见她。

“她正等你呢，”玛丽亚说，“你最好快点。”

我早料到有什么事会发生。因为，打那天上午十点钟她起床后，玛丽亚就一直在忙上忙下。那天，她有点反常，因为大家都知道，她通常是中午才起床的。我想可能是安眠药的原因吧。我照了照镜子，捋了捋额头的头发，解下围裙，然后飞快地朝楼上跑去。

女主人坐在凉台门边的椅子上，两眼望着外面。她身着红色的丝绸衣服，戴着珍珠项链和手镯。整个打扮就像要出门参加晚会一样。玛丽亚为她梳了梳头，挽了头发。头发上还闪着栗色的光亮。她的房间里还散发出一股微微的香味儿。她动了动头，示意让我面对窗户，在她旁边坐下来。

“今天大海非常漂亮。”她开口说道。

说罢，她伸手打开旁边的留声机，放上唱片。

“你听！”她说。

“前进，前进！”利奥诺拉唱道，“前进，前进！”

我们俩静静地听着留声机，凝视着窗外的景象。外面有一群鸫鸟飞过。天边又起了一层乌云，我们静静地望着窗外。

“前进，前进……”

她坐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两眼闭着，紧紧抓住我的手。我们俩就这样，一直听到留声机的唱针抬起。我们两人就这样一直沉默不语。我一点没有感觉到这样有什么不好的。我感觉到，她的手温暖而有力，也有一丝恐惧。

她松开手，慢慢地站起来。我扶着门的把手，站起来准备离开时，她对我说道：“我们家的儿子在德国。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走到楼下去。

回家后，我既没有写信，也没有打电话通知我母亲。我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父亲和乔朗恩两个人都在努力改善我和母亲的关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总是不言不语，乔朗恩更加固执。我无法原谅我母亲，无论怎么努力都难做到。我叫乔朗恩也别提这件事儿。我告诉她，雅各布被关进监狱后，母亲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她没有到雷克雅未克来接我，没有打电话安慰过我；也没说过一句表示关心的话语。她的行为表明：她对我是冷漠无情的。我也没有当面向她讨过好。我告诉乔朗恩，就是在簿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就是我对她的意见。

但是，随着春天的临近，我每天都强迫自己呆在弗乔卢卡塔五十六号的房间里的桌子旁，企图把我们彼此关系的一些事情写下来。如果我认为结果会令人满意的话，我就有点想写信给她，谈谈我的意见。但好长时间过去了，我都没有下这个决心。然而，信一天天越写越长，终于有一天，我的信要写完了。虽然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把信放在书桌里也有好多年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一共写了五页，在那封信里，我表现得是那样正直、公平。出于种种考虑，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签上自己的名字，让它搁一个晚上，以备我想起了再修改一下，或者是删掉一些东西。我把信放到信封里，信封上没有写地址，然后把信放到我的抽屉里，穿上外衣，出门去。乔朗恩一直病着，我们俩差不多有一两周没有见过面了。可我在给母亲写信时，她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浮现。我决定去看看他们夫妇俩。可我出门之前，先得用厨房里的变味的干面包屑把水塘里的鸭子喂了。

太阳的光线惨白，天气既潮湿又寒冷，树林里微风习习。现在，天又要下雨了，风像狗被棍棒打了一样，嚎叫个不止，地上的落叶随风四处飞舞。房屋里的亮光没精打采，毫无生气。我心里免不了悲戚，眼里也露出忧伤的神情。我正准备想办法排遣心中的郁闷，突

然又目睹了发生在莱克来加塔的一件怪事。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可要不是因为该事件的责任人后来又出现了，蒙蔽我双眼的面纱揭开了，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现场除了我和坐在古老的戏院门前的那位老人以外，便没有其他 任何证人了。当时老人望着天空，他手里好像拿着一袋面包，好像又空着。

我看见湖上有一只天鹅。我看到天鹅刚刚飞起来就失去了平衡，它还是拍打着翅膀艰难地继续往前飞。它似乎是受了伤，有一个翅膀飞不动了，所以没飞多高就没有了力气，最后一头栽倒在路上。我隔它不远，准备跑过去救它，这时候一辆小车开过来了，在天鹅的前面刹住了车。司机从车上下来。我认识他和那辆车，因为他的老板哈努尔·斯坦逊——一位编辑和进口商——常到弗乔卢卡塔来。天鹅躺在地上，扑打着翅膀，想站立起来。司机站在路中央犹豫了一会儿，走近天鹅，看了看天鹅，后退几步，呆呆地站在那儿。这时候，车的后门开了，哈努尔·斯坦逊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然后从车上下来。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显然是喝醉了酒。

“为什么不走啦？”

“我不想压到那只鸟。”

“死了吗？”

“没有，还活着。”

“嗯，把它弄开，我们整天没有碰到过这倒霉的东西。”

一位年轻的女子也从他的车里出来，她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地朝司机走去，靠在他身上站稳身子。我见过哈努尔·斯坦逊的妻子好几次了，可这次出事时，她可能还呆在家里做针线活，或烤面包卷，或许在女子学院参加聚会。哈努尔·斯坦逊叫那女子回到车上去，别来凑热闹，可她毫不领会。

“真可怜！”她说，“它在哭，你们没有看到它在哭吗？”

哈努尔·斯坦逊发火了。

“把那东西弄开！马上弄开！”

司机听了他的话后，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于是他的老板便亲自动手。他直奔那只鸟，抓住鸟的脖子，把它扔到了路边的水沟里。那女子惊叫道：“天啊！”司机转过了头。编辑兼进口商把自己当成一位猎手，他笑了笑，好像自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样。但他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天鹅转过身来，用嘴啄了一下他的屁股。他惨叫一声，企图摆脱天鹅。他一边拍打天鹅，一边冲向小车，大声向司机求救。天鹅松开口，回到路上，嘴里还叼着一块从编辑和进口商的裤子上扯下来的布片。

老板冲到驾驶室，喝令司机和那女孩到后座上去。他开着车飞快地向前狂奔的时候，我看见车的后门夹住那女孩的裙子，裙子的边角在车外随风飘荡。

红色的裙子在刺骨的寒风中飞舞。

乔朗恩出去了，我进门的时候，她丈夫从窗前那绿色的沙发上站起来，然后又坐下。他在看书。他的背面是艾丝加山坡上飘着的灰蒙蒙的雪片，灰暗的天空和灰蒙蒙一片的大海。他们的小孩赫尔伽还在熟睡之中。

“她到外面买东西去了，”他解释说，“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他看看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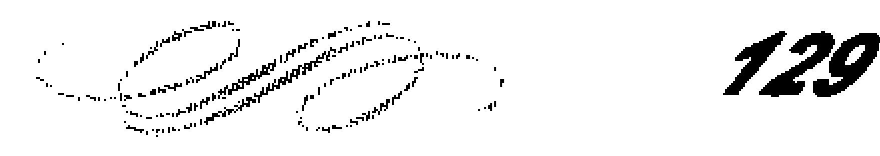
“她早就应该回家了，早该来接替我照看孩子了。”

我叫他去干他自己的事儿，孩子只让我一个人照看就行了。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事儿可做。”我说。

他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诚实可信，惹人喜欢。当然，他不是那种特别好玩儿的人。我对他一直怀有好感。乔朗恩死后，他老是责怪他自己不好。

几年前，我听人讲他又找了一个女人，虽说我一点儿也不了解



那女人的根底，但我还是替他高兴。可是，虽然我没有把握，但有一种感觉，那个女的要么是一名教师，要么就是在幼儿园工作。

赫尔伽安静地躺着，小脸蛋被窗台的灯光照得略有一点发亮。她长得像她母亲，我想现在她还像吗？我呆在这儿的时候，我想去见见她。

这套房子不大，但里面布置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干净净。乔朗恩在房里摆满了各种好玩的小饰物：玩具圣杯、圣坛和小鹅卵石。我从英国寄给她的两个红色盒子、祖母留下来的一个闹钟（已停了）、一方砚台和羽毛笔、还有一只白色的鹡鸰鸟蛋（鹡鸰鸟蛋是我们小时候在河边玩耍时拾到的，父亲曾叫我们把它永远留着作为见证，证明我们小时候是多么的顽皮）；起居室里的圆桌子上铺着一块蓝布，有一瓶干花，一本诗集，还有乔朗恩用黄丝带捆起来的一扎信。我看了一会儿，走过去将信札拿起来。我认出了信封上面的笔迹：是母亲的笔迹。

那天早上，我把乔朗恩在巴思给我买来作为我的生日礼物的项链戴上，现在两手情不自禁地摆弄起来。我感到一阵颤抖，打破了整个房间的平静。我恢复了平静，然后犹豫不决地将信札捡起，打开丝带。信封上写着乔朗恩·乔恩斯蒂尔，弗雷克卡斯蒂古尔街二十四号。上面贴有两张二十奥拉的邮票。信札最上面的那封信上面盖的邮戳是两周前的时间，我打开这封信。

看了里面的内容，我大吃一惊。要是我不读这封信，我心里肯定会高兴得多。或者是我离开这里前，将它放到我的衣袋里，永远不打开。我反复读那封信，想弄清读完这封信后我有什么反应，我的行为是否仍旧正常。天哪，我简直忍不住笑了。

“……我对她的行为举止已熟视无睹了，我真是鬼迷心窍，明明知道她不听话，还要挖空心思供她上学。给她在商学院缴了昂贵学费，她不愿意去上学，白白地浪费了



钱，我又给钱让她周游列国。我告诉她，只有她才有这种条件；有权选择一些莫名其妙的、稀奇古怪的课程。可即使这样，她仍是那样不思回报，忘恩负义。她从小就固执，喜欢一意孤行，最近几年更是连父母的话也置若罔闻。我早已习惯她在我面前的非难指责，盛气凌人，最近几个月来更是变本加厉。尤其是她被那个犹太人鬼迷心窍以后，气焰更加嚣张。从此以后，我反复在想，她是否在背着我们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能不能再相信她，我怀疑她是不是讲的老实话，还有没有自知之明……"

我放下信，凝思良久。我不知不觉摆弄着我的项链，项链划伤了我的脖子，我的手本能地一缩。我把衣服拿来穿上，走到街上的时候我才感到天冷，冷得直发抖。这封信还在我的衣袋里。

我回到了弗乔卢卡塔街五十六号时，才想起我把乔朗恩的孩子一个人放在屋里了。

从英国人占领冰岛的那一天起，这家的女主人就一直卧床不起。她前一天还邀请我到老剧院听音乐会，波利博士在维尔嘉摩尔·博格家打桥牌。那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山上蓝天白云，海湾波光粼粼。所以她提议说，我们听完音乐以后，步行回家。我记得，我们是手挽着手一起回家的。走近湖边的时候，我们看见戏迷们从老剧院鱼贯而出，然后分散在这美好暮色之中。剧院正在上演一出新创作的喜剧，观众们出来后个个喜形于色。女主人说："迪萨，春天到来令人感觉心旷神怡，你说是这样吧？"

最近几天的天气转阴了，有时夜晚还下雪；天鹅早早地飞到湖上来。我们听音乐会的时候遇见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说他们刚刚从沼泽地回来。他们是被安排到那里干活的。



“春天的到来是不是令人心旷神怡？”

现在，女主人卧床不起。我的雇主在城里整天忙忙碌碌，没有功夫照顾她。得病之初，女主人不思饮食。晚上，玛丽亚说，女主人想喝汤。有时候，我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她为什么不和我见面。即使她重病在身的时候，也只是叫玛丽亚在我们中间传传话。我现在才明白，这是一种傲慢的情感在作怪。我也在想，这样对我们彼此都有好处。

她因病蛰居在床差不多有一周时间。她终于从床上起来了。她丈夫向我们传达了她的旨意：家里任何人不得提及被占领的事儿。比如说，她到了我们跟前，我们要小心谨慎；播放新闻时，我们不能打开收音机；报纸不得随意乱放。玛丽亚给她读晨报，主要读一些讣告即可，或一些大众化文章；女主人总是背对着报纸，所以她也看不到头版头条消息。

玛丽亚和我都知道，这种掩耳盗铃的事儿，长不了。被占领的头几周时间，女主人每天都蛰居在家里。但到了六月初，她的医生打电话，要她自己到他诊所看病。我肯定，医生这样做也是处心积虑地为他自己考虑，让她自己去，而不是像往常一样，他亲自到弗乔卢卡塔来给她看病。

每次她出门看病我们都被弄得非常紧张，胆战心惊。所以说，她出去一两个小时，回来后显得平静自如。这种情况使我们惊诧不已。玛丽亚说：“她没准儿已经接受了这种现实。”但我却认为，可能是医生给她开的药比以往的剂量更大了。

女主人说，她每次去市中区的诊所时，她坐在车上都是把眼睛闭着的。而在医生的怂恿下，她回家的时候睁开眼睛看了看外面。她向我们描述说，她看见街道上到处是当兵的，在博格宾馆旁边的军车上装满了军人；邮电局的地下室的窗子前堆满了沙袋；山上的防空掩体坑也是一排排沙袋。她的话音低沉，眼神凝重。她像是在给我们讲什么新鲜事儿一样。她讲完后不久就在客厅里的椅子上

睡着了。

我们大家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认为最糟糕的事儿也就因此而过去了。但一周以后的防空演习给她的震动使我们都害怕。

波利博士曾经告诉女主人，要她提高警惕，但她没有给玛丽亚和我提及她对这种演习的恐惧。防空演习中午开始：首先是一阵警报声，向人们发出信号，尔后是一连串变换声调的吼叫声，紧随其后的是一阵炮声。几秒钟之后，城里的所有电话一起响三十秒。她的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作了的。

"波利！"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波利……"她的叫声如往常一样，把最后一个音节拖得很长。

其实，他就在她身边，但她还是大声呼叫。

虽然后来的叫喊声不如刚开始那么可怕，但她还是无法适应防空演习。我自己却是尽可能去适应它。回首往事，我始终认为，她对防空演习的反应，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我的救星。虽然战争迫使我回到冰岛来，但我记忆里的种种往事，却时时让我无法解脱心中的郁闷，所以，为女主人多分担一点忧愁反倒给了我某种安慰。真的，她真的拯救了我。

六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客厅和她邂逅。她身穿一套黄色的晨衣，衣服上印有白色雀鸟的图案，她的背朝着门。在她身旁的桌子上有一份晨报。

"阿特里，"我听见她口中不断地呼喊着她儿子的名字，"阿特里，我的乖孩子！"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呼叫声吓了一跳，赶快跑到厨房去让自己松弛一下神经。

1940年仲夏，有两位政府官员成了弗乔卢卡塔的常客。事实上还有好几位所谓的"知名人士"也是波利博士家的常客，不过他们



来这儿通常是向波利博士求教或者寻求援助的。而这次和往常不太一样。我的老板不仅仅繁忙不堪,而且有时候还非常焦急。尽管他想像往常一样跟我开开玩笑,但是他的笑容却异常的冷淡,两眼也显得无精打采。虽然他走路时总是轻手轻脚的,不想打扰别人,可我每天晚上都能听见他起床的响声。我睡觉时总想着保持警惕,所以总是睡得不沉。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天晚上,当我到楼下去取一杯牛奶的时候,我发现他站在办公室里,灯没有开,里面黑黑的,他两眼盯着窗外射进来的灰暗的灯光。他背着双手,像一尊雕塑,一直呆到天亮。早上八点钟,玛丽亚来上班的时候,他才躺下去,不过没有睡着。他神情恍惚,说起话来总是颠三倒四的。他对我说:“阿斯蒂斯,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有两个人要来和我交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三点钟……如果你……”说话就这样断断续续,然后两眼又盯着天空。我问他:“三点钟吗?是不是三点钟,波利博士?”他回过神来,回答说:“对,一些蛋糕,也许就这样吧!他们有两位,如果方便的话,就来一块蛋糕和咖啡。”

他提到的那两个人的确来了,但他们来显然为了帮助他,而不是来寻求他的支持。我听见他们对波利博士说:“我们会尽力而为的。今天下午,船从芬兰启航。那个城市叫做佩查莫,它位于拉普兰的最北端。但他得首先到哥本哈根……我们得请求驻丹麦的德国使馆协调一下,最好找伦特-汾克大使……乔治亚也得一同前往,可她的儿子比约还呆在德国……”

德军四月份入侵丹麦的时候,冰岛与哥本哈根的海上航行中断了,许多等着回家的冰岛人不得不滞留在哥本哈根。乔治亚是冰岛驻丹麦大使斯文·薄乔逊的夫人。薄乔逊是1944年冰岛从丹麦独立出来后的第一位冰岛总统。我听说,他的儿子比约和波利博士的儿子阿特里是好朋友。

“我们要给阿特里捎个信。我们还得和斯德哥尔摩的维尔嘉摩尔·弗莱恩取得联系。他把信转给哥本哈根的乔恩·克莱伯。乔

恩与汾克大使关系甚好。”

他把两人送走，分别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他知道这是他能想到的惟一方法。他像一个在水里要淹死的人，把救命的希望维系在细微的绳索上。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

女主人现在比以前精神状况好多了。她常常中午才起床，打扮停当后就下楼来，有时候她还走到外面的花园去观赏鸟儿和植物。她走到我工作的厨房门口时说：“天气终于暖和起来了。”她常常坐在墙角的椅子上。我站在火炉旁做饭的时候，从我挂的镜子里看着她，我心里想，我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帮帮她，让她开心点儿？有时候，她给我讲起她童年的故事，讲述她到国外旅游的经历，还告诉我她在安格勒提尔有间她十分喜欢的房子。她几乎不怎么关心我的任何情况，或许是出于漠不关心，更可能是出于对我的体谅。她喝咖啡的杯子是蓝色的，上面有一幅田园画，画的中间是一棵树。这个杯子是她母亲遗留下来的惟一的一件纪念品。她轻轻地呷着咖啡，嘴里不时地咯嚓咯嚓地嚼着糖块儿，老是念着相同的一句话：“没准儿我还要偷偷再吃一块……”

客人们常来我的雇主家作客，接二连三的，这样的情况足足有两周的时间，可直到最后几天，玛丽亚才说，她能猜出这些客人来这儿是干什么事来的。她也是根据只言片语推出来的。因为这些人见她给他们送点心去时，全都鸦雀无声了。只要等她一离开，他们马上又重新开始谈起话来。

“他们在谈波利博士家的儿子，”玛丽亚说，“他在德国，处境非常不好。波利博士想从丹麦把他接回来。”

我马上打断她的话，可那天晚上我还是睡得非常不好。“我亲爱的雅各布，”我口里一遍又一遍念叨着他的名字，我捂着枕头哭，这样哭别人就听不见了。“噢，雅各布，雅各布。”我孤立无助，只有喃喃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他们说的是有关他儿子的事儿，”玛丽亚说，“我敢肯定，是这



样的。”“拿点蛋糕和咖啡来。”我的雇主说。“从哥本哈根安格勒提尔街的房子的窗户照射来的晨曦美丽无比。”“进来吧！”雅各布大声说道，“我不会伤着你的脚的，我保证不会……”

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安宁，睡着一会儿，又被梦中的噪音吵醒了。黎明还很远很远。

玛丽亚提醒我说：“这样的天气不会常有，但每年要发生一次，常常是发生在春天或夏天。比如说，复活节期间的暴风雪，或者是九月份天气渐渐寒冷起来，草木凋零，一片肃杀景象。”

“咱们一起来庆祝圣诞节好不好？”她去楼上看了夫人之后，来到我的厨房时，我对她说，“就现在？今天晚上怎么样？”

波利博士到东部地区去了，是前天出发的，要周末才回来。他和我道别时，我见他比以前消瘦了许多。而与此相反的是，那些来访的政府官员们却依然是脑满肠肥。

“你应该知道，他们吃了多少你做的蛋糕，”玛丽亚说，“谁也说不清他们究竟吃了多少你做的蛋糕。”

我的主人出发前，我总有一种预感，就像在似睡非睡之间有魔鬼在我耳边唠叨一样。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里似乎要发生什么重大变化。“这种想法很荒谬，找不到任何根据。”我自己这样想。

另外一方面，女主人发出的指令却是清楚明白的。她要我们在房子里挂上圣诞节的彩灯；烛台上点起蜡烛；把留声机搬到楼下的客厅里去；午夜一点钟放巴赫的《圣诞颂歌》，一直放到早上六点钟；把银质餐具全部擦得光彩夺目，把瓷器碗碟拿出来，摆上三个人的餐具。她还吩咐玛丽亚别忘了到外面花园里摘一些松树叶，将松树叶点燃后，绕整个房子走一周，这样就会使整幢房子香气四溢。我打电话给在哈夫纳夫乔多尔的丹麦朋友，让他给我们捎一些雷鸟和

熏羊肉来。

“过圣诞节了！”她高兴地说，“我们也该庆祝庆祝！”

女主人叫了理发师到家里来，时间是下午三点钟。玛丽亚担心，那女人会不会看到这种圣诞节的装饰，说漏了嘴。因此，我们没有忙着装饰前门的房间，也没在大门口布置什么，等她走了以后我们再做。

“迪萨，好像有樟木味道，是有点樟木味。我非常喜欢这种味道。”

“是不是苹果烤焦的味道？”

“对，正是，这个主意好！”

“是雷鸟和熏羊羔肉的味道！”丹麦人说，“你们是庆祝什么节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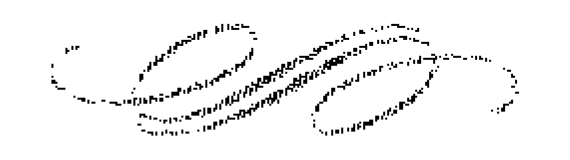
我没有回答，但我觉得他自己会明白。

“请你们代问夫人好！”

留声机响起了巴赫的乐曲，我做上熏羊羔肉，玛丽亚拿着燃得噼噼啪啪响的松叶绕房子走了一圈，餐厅里亮起了圣诞彩灯，整个房子在灰暗忧郁的春天一下子变得暖融融，亮堂堂的，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我们都兴高采烈，把餐厅四壁的镶板都点起了蜡烛；客厅的花瓶里插上杉树枝；我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和女主人一起庆祝这个假设的圣诞节，彼此祝福，互道圣诞快乐。

我们七点钟吃饭，女主人身着蓝色的丝绸裙，脖子上戴着白色珍珠项链。她的脸庞在珍珠亮光的映照下熠熠发光。烛光下，我猜想，她年轻时肯定是一个大美人。我们一起唱《夜色静悄悄》，然后一起大口喝龙虾粥，吃熏羊羔肉和雷鸟。

吃过晚餐，我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葡萄酒和吃馅饼。女主人给我们每人送一份礼物。我和玛丽亚感到很难堪，因为我们没有给她送任何东西。她送我一枚胸针，给玛丽亚一条围巾。我们一起玩



惠斯特牌，开心极了。夜幕降临，刮起了大风，然后又下起大暴雨来。听窗户上的雨声，暴雨夹杂冰雹。由于我们玩得很开心，葡萄酒让我们感到浑身热呼呼的，所以外面的暴雨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影响。

“我输了。”玛丽亚说。

“我说，迪萨，你怎样？”

“我的运气也不佳。”

笼罩在女主人心头的阴影这时也烟消云散了，她脸上露出了平静的表情。她两眼显得非常平静。她从桌子上拿起一块小石子，夹在手指缝里玩耍。她玩耍的动作很轻盈，好像那小石子很软，里面有什么答案一样。

“这是我儿子五岁那年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她最后说，“‘妈妈，这是一块许愿石’，他对我说，‘你可以随便许愿。’”

她用右手的大拇指继续玩了一会儿那块石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边。

“他太感情用事了，一直是这样，他不适于搞政治斗争。这场战争……谢天谢地，他就要回来了。”

我们一直玩到一支支蜡烛燃完。之后，我们彼此道谢，吻别，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

刚闭上眼睛，我就听见窗外凛冽的寒风又在猛烈地拍打着窗户。

信是安东尼于1940年7月24日写的，蓝色的信纸已褪色。不知为什么，我会在旅途中带上这封信。这封信已是第二次被带到冰岛来了。我一边读着信，一边观赏博格宾馆窗外的景色：清晨人迹稀少的广场和独立英雄塑像——这些都和我上次见到的没什么两样。

我用尽办法想获得雅各布的音讯，但都一无所获。有人告诉我，想得到被关进战俘集中营的人的消息很难，甚至还有人说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但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会坚持不懈地继续寻找，决不放弃，我也会像往常一样两周给你写一次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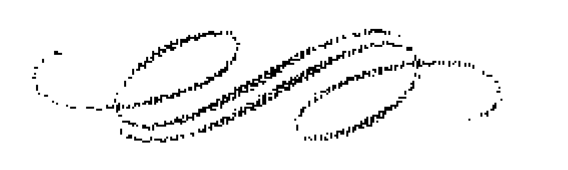
我不愿给你描绘伦敦的现状，这样会使你沮丧；自上封信以来，伦敦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没什么新消息告诉你。太阳照常升落，有时候客人来访会让我感到精神振奋。

昨天我收到表兄的来信，他驻守在卡尔卡塔郊外。给我写信的时候，他正在告假之中。信是从大东部的酒吧寄来的。他还未亲临过战争场面，但来信已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能，整日空虚无聊地坐在书桌边，无所事事。我明白自己永远也不会被派往战场。

我每周尽量打两次网球。今年春天还参加了板球单打比赛。我偶尔还和老桥村的人，威克费尔德一家和他们的亲戚一起打桥牌，消磨时间，而此时其他地方可能正战火纷飞……

大卫上周来这儿和我一起度周末，他有点情绪化，后悔没有亲自去德国，不该让雅各布去。他总是沉默寡言，只有喝酒的时候才健谈一点。近日来他老是酗酒。他们兄弟俩太不一样了，雅各布那么坚强可靠……而这一切再也不会有了。

哦，对了，外交部的一个熟人给我讲了一件有关大卫的女朋友安娜的事情，真令人吃惊（应说明一下，我指的是他以前的女朋友）。我认为这件事“令人吃惊”，你可能不会这样认为。你知道，她是富家女，不缺钱花。他在讲



述中没提及安娜的父母现在何处，只讲到安娜乘坐的是一艘从阿姆斯特丹开往纽约的荷兰轮船。你自然会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答案是这样的：有时是，有时不是。显然，许多犹太女孩在玩这种把戏，她们的丈夫大都被关在战俘集中营里。船员们称她们为“水上女孩儿”，把她们当作玩物一样的小姐。船上哪个官员和哪个女孩在一起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船员们有一条严格的制度：首先由船长挑选，然后是工程师，依次按级别排列挑选，不过两次航行后就不允许挑选同一个女孩，这是为了防止两人关系过于亲密。女孩一定要舞跳得好，会装点餐桌等——我猜可能还不止这些。女孩们就这样在大西洋上漂泊。船进港时，她们不能上岸，只能在船上读报纸杂志，通过电话定购衣物。如果听说她们有女友也在这个港口上了另一条船，她们就彼此联系。因为不敢离船，只能靠打电话。

我没有向大卫提起安娜的事。事情已经够糟糕的了……

我搁下手中的信。最后一次听到大卫的消息是他还住在美国东岸，很有可能在纽约。我没有安娜的消息，也不想知道。

两只海鸥从空中俯冲下来，然后掠过独立英雄的塑像。英雄却对此无动于衷，依然注视着议会大厦的正前方。今天凌晨四点钟，我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也许六点钟的时候我该吃一粒止痛片。还差十分钟就六点了。

我看见一位工人提着午饭盒穿过广场。我看着他渐渐出现，人影越来越清楚高大，然后又渐渐变小，慢慢消失在海港深处。我找来电话号码本：阿特里·博拉逊，常务董事，哈瓦那嘎塔街22号。毫无疑问，此人看上去体面可敬，还有两三个孩子，或许有点发福，

是当地一位老成持重的栋梁之才。讲话时，他妻子温顺地站在一旁，不多言语，只是用充满爱慕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丈夫。哈瓦那嘎塔街 22 号。

差五分钟就六点了。我不能在这样下去了。赶快吞下两片药，闭上眼，希望能睡个好觉。

自那天我把妹妹乔朗恩的女儿单独留在公寓里后，妹妹就和我疏远了。我多次向她道歉，并企图让她丈夫明白我母亲的信对我产生了何等影响，但这样做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有时候我这样劝戒自己：假如母亲的信——是用黄丝带扎着的，仿佛要人人都看到——没放在客厅的餐桌上，整个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但我也知道，这不过是我找的一个蹩脚的借口罢了。或许是无知和自欺欺人才是所谓的幸福生活吧！因此，最好是让世人全都浑浑噩噩，真伪不辨。而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真理给我带来的好处却少得可怜。

乔朗恩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我，但是，我心里明白，她对我的看法。我一点也不怀疑她丈夫冈纳对我的态度。我不怪他。尽管如此，在后来少有的几次见面中，他对我还是彬彬有礼的。因而，乔朗恩生病一事，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回到伦敦后就和他们中断了联系。直到 1952 年我们才重新开始通信往来。是在安东尼的强烈要求下，我才首先写信给乔朗恩的。我记得给她的回信中曾谈及萨默尔塞特春天的景象：花草树木、各种鸟雀、有鳟鱼穿梭游弋的小溪，还有那只小狗廷纳。头一个月我没注意她信中的一些暗示，也没在意那些不祥的征兆和预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可能再有别的想法了。尽管有时候我并不能很明显地感到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从信的字里行间，我越来越能感觉到她对一些小事也伤感和焦虑，她还经常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一开始我想尽量不去想这些事，告诉自己说我也曾有过苦闷，但最终我还是无法逃避妹妹境

况不佳的事实。那时我们之间的通信已经有一年时间了。我又把她以前给我写的信和她最近给我的信进行一番比较，发现她心灵的阴影无疑是越来越重了。我接受了安东尼和一位医生朋友的建议，九月初，我决定壮着胆子写信，问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极力在措词上谨慎小心，尽可能做到既不伤害她的感情也不使她生气。我亲自把信送到邮局，似乎不这样做的话，信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我提心吊胆地等着回信。邮差一般是快正午的时候才来，我坐在大厅里期盼着信的到来。同事们开始注意到我，因为我似乎已成了大厅里的固定物。他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发生了什么事。几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收到她字迹优美的信。我变得烦躁而绝望，不再盼望邮差到来时的十一点钟的响声。我后悔给她写了那封信，努力想回忆起信的内容，又记不太清楚。我对自己说，也许我该圆滑点，不该那么直率鲁莽，我的信是不是写得太糟糕了？是不是触动了即将愈合的伤疤？犯了窥探别人秘密的毛病？

我疑虑满腹，辗转反侧。直到十月下旬才终于收到她的来信。头天夜里降了一场霜，我记得那天厨房窗外的草木都被霜冻了。我坐在窗边，用极大的勇气打开了信封。

乔朗恩没有及时回信的理由很简单，但还是令我感到有点怪异。原来她住了一个月的院。

多年来我一直患有这种病，但最近这几个月病情越来越严重……今年秋天病情更加恶化了。冈纳非要把我送进医院不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迷宫的墙消失了，不再像先前那样向我围拢过来，威胁我。我已不再担心害怕墙会逼近，压碎我……我不再躲避邻人，开始外出，也不再躲避我自以为总是尾随我的住在地下室的那个女人，也不再躲避总站在邮箱边似乎等一封永远也不会来

的信的男子。他已消失了，也许他并未存在过，只是我的幻觉罢了。

迪萨，我常常在椅子上一坐就是一整天，两眼望着天空，一动不动。我描绘不出当时的感觉有多糟。我想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没用，一钱不值。我看不到今生今世还有什么希望存在。似乎我不关心任何人任何事，甚至赫尔伽也不关心，不过你可千万别告诉她这些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千万别告诉她。你知道我是多么爱她，她是我的一切。我的病就是这样，真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她提到她的病情时用了过去时，这让我感到宽慰了许多。安东尼晚餐时说，我看起来比前些日子高兴了很多。

"她患了抑郁症，一直在吃药，"我告诉他，"现在已经痊愈了。"

但是，午夜时分，我躺在床上，开始怀疑治疗的功效。显然，她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病，无法从根本上治好。感觉好的时候，她就充满生机活力，真诚热情地迎接每一天。她开始信奉宗教——"我现在为上帝而活着"——去参加聚会，还来看过我和安东尼，和我们一起过了两周时间。见她如此满足于生活真是太好了，不过她还是有点抑郁，仍在服药。不过那段时间好多了！

时光岁月在光与影的交错中流逝，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度过，直到有一天光明渐渐消失，漆黑的阴影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她。

乔朗恩自杀的那天，阳光灿烂。我刚打开面对着绿阴大道的那一扇窗户，想让闷热了一夜的屋子透进来点新鲜空气，冈纳打电话来了。我们正通话时，我看见安东尼穿一身白色运动服从网球场走过来，擦着额头的汗水，到后门去了。那天没有刮风，不过窗帘似乎出于惯性，不时地飘动几下。厨房里的煎蛋和熏肉的香味也飘了过



来。我突然想起了本来打算在安东尼吃早餐前给他说点事，但却忘得一干二净，实在想不起来了。由于我心不在焉，没听明白冈纳在讲些什么，他问道："你能来吗？"我这才回过神来。

"什么？"

"你能来参加葬礼吗？"

我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甚至怀疑我当时有没有回答他。只记得当时我站在窗边浑身发抖，电话机掉在地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弯腰捡起来。后来我双手握住话筒，告诉冈纳我晚一点给他回话，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和他说了声再见。

我瘫在地上，闭着眼蜷曲在那里。我似乎感觉到远方的家乡考帕斯克尔轻拍的海浪声和海草的气味。

"迪萨，我们永远是朋友，好吗？"

"当然好啊！"

"我们长大后呢？"

"当然还是朋友啊。"

我终于站了起来，突然想起我原来想提醒安东尼，我这儿有头天晚上烤熟的圆饼，烤得不错，轻脆松软，加点黑刺莓果酱和早茶一起吃，再好不过了。

我下楼来到了厨房，从厨柜里拿了几块烤饼。安东尼已吃过早餐了，不过出于礼节还是吃了两片。我责怪自己见他从球场过来时，没想起来提醒他。

"你没事吧？"他问道。

"再尝一块烤饼，好吗？"

一直到了晚上我才鼓起勇气告诉他乔朗恩的死讯。

老马歇尔坐在餐厅里一般不怎么和我讲话，而是一直看着窗外。他双手捧着杯子，慢慢地呷着茶，要花很长时间才喝得完。他



一直都是沉默寡言的。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心不在焉。那天，我看得出他心中有事。他似乎在逃避什么，喝茶的速度比往日要快。最后他开口说："我去了后，你要好好地照顾他。"

我知道他指的是安东尼。

"您哪儿也不会去的，老人家。你身体健康得很。我们俩都会像往日一样照顾他的。"

"前几天夜里，草坪上总有一匹奇怪的马，"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说，"是匹灰马，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看的时间久了，它就消失了。"

他站起来，打开门朝外看看。

"它常在溪水边停下来，在月光下变色，变成蓝色。要是它来迎接我，你就得照顾安东尼。"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想，他在猜什么呢？他看着我又会找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我向别处看去。大厅的钟沉闷地敲了三下，从挂在墙上那面镜子里看，我的脸色惨白。

主人的儿子乘坐"艾丝加"号船回来的那天早上，女主人把餐厅的那面镜子给了我。那天，她起得特别早，刚过九点就下楼来喝咖啡了，她告诉我镜子属于我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样做。我虽然喜欢那面镜子，但从未向她暗示过这一点。我照着镜子，沉湎于想象之中，无拘无束地沉浸在往日的岁月里，暂时忘掉了胸中的烦恼和忧愁，想象着世界上一切都是阳光灿烂。那面镜子偶尔还使我想起考帕斯克尔的天空。小时候，我们对任何东西都好奇，想弄个明白。我从未向女主人提起过我喜欢那面镜子。那天早上，她说要把镜子送给我，我感到很吃惊。我要说明的是，我从未向她暗示过，也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想要那面镜子的事。也许她见我总喜欢擦镜

子上面的灰尘，也肯定注意到我在镜子下面搭的架子，摆放上我的零碎杂物，唇膏、梳子、羽毛等物品。不过她肯定从未见我照过镜子，因为我只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才照一照镜子。

我万分感激地接受了镜子，不过我明白我永远不想把它从原地挪开。在镜中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十一点钟的时候，波利博士从港口打来电话说，“艾丝加”号已经停泊在港外了，英国官方还得检查乘客的护照，之后就会入港停泊了。女主人准备去迎接儿子。

时间慢慢地过去，但是乘客一直不许上岸。波利博士回来了，很焦急的样子。官方要求每位乘客必须讲出住在雷克雅未克的六个人的名字，这些人要能向军方提供有关他们的情况。女主人卧床不起，男主人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无意中听到他打电话，向别人打听政府是否要干涉此事。

白天过去，夜幕将临。晚上，波利博士没有睡觉，而是坐在漆黑的办公室里。我去看过他一次，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知道他是否睡着了，我没叫他。

第二天早上讯问开始。波利博士七点前就出去了，女主人还没有起来。大概中午的时候，他打来电话说乘客们终于登岸了。他声音虚弱得令我震惊。玛丽亚飞奔上楼，把消息告诉女主人，并帮她迅速穿戴好。

两点钟的时候，夫妇俩去港口接儿子。玛利亚在擦银器，我按照夫人的吩咐准备了晚餐吃的龙虾和鹅肉。收音机里播放着轻快的音乐，我的心情也好起来了，站在炉边做饭，时不时和镜中的我淘气地挤眉弄眼。

快五点钟的时候，前门开了，我和玛丽亚去前厅接他们。玛利亚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父子俩没说话，只有女主人在讲话。我们各自都作了自我介绍。他只和我们握握手，点点头，然后就把目光移向别的地方去了。

“好了，”女主人说，摘下插着红色羽毛的黄色帽子，“终于回家了。阿特里，亲爱的，你是不是……”

“妈妈，我想躺一会儿。”

“好呀，太好了。晚饭前休息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一会儿我们庆祝一下。你一路上旅途劳累……躺会儿就好了。”

阿特里·博拉逊中等身材，圆脸，脸有些苍白，头发蓬乱，穿一件黑色大衣，配上一条仿羊皮衣领，戴一顶宽檐帽，围一条白色围巾。他脱下大衣，扔到客厅的椅子上，帽子和围巾堆在衣服的上面，结果帽子掉到了地上，他似乎没觉察到，也没有去把它拾起来，而是打开地下室的门进去了。我发现他走路有点跛。

“玛丽亚，亲爱的，请把阿特里的床铺好。”

“不用了。”他回答说，头也没有抬一下。

玛丽亚把他的大衣挂进衣橱里。我去了厨房。食品储藏室有一扇通向地下室的门。我经常听见他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很奇怪，他并没上床睡觉。我不由自主地听起来，重、轻、重、轻……那脚步声在他入睡后很久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

我们大家，包括他父母，一直都在等他吃晚饭。七点钟的时候，女主人让丈夫下去叫他。

男主人慢吞吞地起身。

“他太累了，”他从地下室回来时说，“一会儿就来。”

他们要喝雪利酒。女主人在留声机上放了巴赫的曲子。两周前“圣诞”宴会后，留声机一直放在客厅里。女主人又说又笑，她丈夫什么话也没说。七点半的时候，她出去了，朝楼下喊儿子，却无人应答。不一会儿，波利博士又下楼去了。女主人突然走进厨房。

“迪萨，我真不明白，你做饭的时间是不是拖得太久了点？”

我尽力安慰她，说虾端上桌前还需要再煮一下，鹅肉也还差点火候。

“他太累了，”她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一直都很敏感。”



吃饭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他们的儿子不停地抽烟。左手漫不经心地夹着菜，心不在焉地把叉子伸向盘子，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叉子有没有叉到东西。女主人让我把那瓶战前酿的达克鲁-勃长踋酒打开——一种高级红酒，可她儿子却愿意喝白兰地酒，甚至要边吃鹅肉边喝酒。

女主人回忆道：

“……那时你才五岁，阿特里，亲爱的，你记得吗？你曾经说：‘妈妈，你可以随便许愿，因为它是许愿石。’你当时才五岁……”

儿子又点起一支香烟。玛丽亚把烟灰缸倒了，然后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你和客尼斯骞经常在一起玩耍，目前他在他父亲的公司做事。我告诉索拉宁勋夫人你要回来了，她会告诉客尼斯骞的，你们过去是那么好的伙伴……不过他现在给父亲做事了……”

与其说女主人是在和别人聊天，不如说她是在自言自语。男主人和往日也不大一样，刚过十点就上床睡了，第一次忘了向我道声“晚安”。母子二人仍坐在客厅里。

“我们打打牌怎么样？”我听见她问道。

“过一会儿吧，妈妈，我太困了。”

他很快就在椅子上睡着了，我和玛丽亚互相帮忙，清扫屋里的东西。女主人到厨房来看望我们，感谢我们今天晚上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还说了一些夸奖的话。那天晚上，玛丽亚差不多要接近午夜才回家去。

我心事重重地上床睡觉，可是在这夏日的夜晚，我躺在床上，很久也睡不着。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还在想小玛丽琳的事儿。差不多快要到十一点钟了。吃了止痛片后一定睡了个好觉。我被敲门声惊醒

了———一共敲了三声，我敢肯定，我听得清清楚楚——第一声敲得很轻，然后几声很急促。我感觉有点儿头昏眼花，可还是起床来，穿上睡衣去开门。我把门打开，外面走廊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

吃早饭的时间太晚了，我还是叫他们给我拿一块面包和奶酪来，还给我倒一杯茶。我给楼下接待厅的服务员打电话，接电话的那位女孩儿的说话声听起来非常温柔而亲切，很像玛丽琳的声音。于是，我就故意找话，想和她多聊几句，听听她那美丽动听的声音。

我喜欢在床上吃早饭，而且还想再这样一次，毕竟我没有别的更好的事情可干。窗户下面有一张圆桌，我把它移到了我床跟前（因为我的床头柜太高了），桌上堆满了报纸，还有我到这里以后阅读过的各种各样的文件材料。我一边喝茶一边伸手去拿剪报，这是我来的时候带在身上的，因为太忙，还没有来得及看。正因为我听到了接待处那位女孩的甜美的话音后，我才想起了我在旅途中随身携带的那份剪报。

实际上我以为我已把那篇文章给处理掉了，可是临行前，当我在床头柜最底层的抽屉里，在玛丽琳以前写给我的信堆里面，找到那篇文章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份简报是从《每日电讯报》剪下来的。我还在剪报的末尾注上日期：1955 年 9 月；同时在它的顶端写上标题：两个厨师，两种风格。在作进一步叙述之前，我得声明一下，我不相信玛丽琳曾在幕后操纵过这篇文章的撰写或对作者施加过压力。不管怎样她不是故意的。

我承认，我刚看到这篇文章，曾怀疑过有人别有用心。记得当时我情绪激愤。我和安东尼那样照顾她，她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安东尼安慰我，让我平静下来。他相信玛丽琳没有参与这事，不过他如此信任她，让我感觉到更加烦躁不安。我不住地指责他幼稚软弱，好欺负。

“你认为是巧合吗？”我问道，“也许是意外事故？你是说玛丽琳对赞扬她自己，贬低我的文章不感兴趣吗？”

回忆往事，使我情绪激动。我要平静下来，喝完要来的茶，再尽最大的努力来描述这篇文章的内容，讲讲有人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和文章所引起的后果。我最好还是先喝点茶，吃块糖，像埃利斯医生教我的那样，深呼吸几下，然后打开收音机听几曲美妙的音乐。

那些认识罗娜·甘伦的人都认为她缺乏判断力，不知道怎样描写食品。许多人对她的作品表示怀疑，因为她的文章不仅写得平淡无味，而且愤世嫉俗，语言下流肮脏。正如许多处于她这种境况的人一样，罗娜曾梦想成为一名厨师，并希望在这一行业有所发展。对此，她还野心勃勃，不过从她的作品判断，她根本不是那块料。白日做梦的事儿人人都会，能不能心想事成，又另当别论了。并非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地应付生活中一切不顺心的事。因而，他们的语言变得尖刻，以邻为壑，卑鄙无耻。他们企图以此抬高自己，结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为爬出自掘的陷阱而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去侵犯他人的利益。

心肠软的人很易于容忍甘伦夫人的行为，认为她还有点才气，原谅她的过失。我认为她的作品不过是些故作姿态无病呻吟的废话。

我一点不想隐瞒我对罗娜的看法，这肯定也传到她耳朵里了。最初几年里，她冷落我，从不在她写的有关夏季旅馆、饭店的文章中提到迪通饭店。她对我视而不见，但她这种荒谬可笑的行为，只会让她自讨苦吃。我并不在乎这些，而且事实上，在甘伦夫人抵不住诱惑写了关于我和玛丽琳的文章的时候，我早已把她给忘了。这件事发生在玛丽琳移居北方城市后的两年以后，甘伦夫人为她本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收获如此之大，感到“惊诧不已”。

故事发生的背景——假若能称之为“背景”的话——是在一次宴会上。玛丽琳举行这次宴会，目的在于向新闻界宣传自己的饭店（不过我从未想过要这样做；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贿赂这帮人，让他们来吹捧我）。宴会收到了预期效果，新闻报刊杂志竞相吹

捧玛丽琳，甚至有些杂志还刊登了她和她丈夫的照片。她丈夫在所有照片中看起来都显得那样的颓废，可怜兮兮的。虽然我知道她是如何获得这些赞誉的，并担心她是否能不辜负这些赞誉，但我还是为她感到高兴。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罗娜·甘伦会如此卑鄙地利用这样的机会，把我和玛丽琳的厨艺作一番比较。这篇文章达到了她那粗俗卑鄙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还真是不容易。

安东尼深信，玛丽琳和这件事没有关系。我绞尽了脑汁，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后，我想她可能是无意说给甘伦听的，并非有意要诋毁我。文章刊登出来后，她多次打电话给我，而她每次打电话给我，我都不在家。我不许安东尼和她通电话，但不知他是否做到了。大约过了一年的时间，我决定和她重归于好。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互相让步，重归于好。我放下笔，端起茶杯。晨报就在茶壶边放着，上面写着：6 月 15 日，明天毕业。他长什么样？我自言自语道。他长得像谁？我该对他说些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能说点什么呢？

茶有些凉了，不过我还是喝完了。天灰蒙蒙的。我把他的照片拿出来。

主人的儿子偶尔才露露面，要不就独自一人呆在地下室的房间里，或者裹上黑大衣进城去。那件黑大衣肯定是他在途中买的。他白天黑夜的活动完全颠倒了：白天睡觉，晚上清醒，常常是下午三点钟出来喝咖啡，读报纸。如果碰到我或玛丽亚，他会对我们礼貌地点点头，但很少说话。他把咖啡、报纸和香烟拿到书房去，在那儿一支接一支抽烟，烟头把所有的烟灰缸装得满满的。虽然晚上他父亲有客人来的时候，他基本上都呆在家里，但很少和父母一起吃晚饭。晚上他都不怎么参与谈话，只是坐在角落里听别人谈论政治、财经、经济盈亏、批发零售、弗兰克林-斯文森进出口公司、钓鱼和可恶的

英国人的蛮横跋扈的行为。他偶尔也笑一笑。夜深了,第一瓶法国白兰地喝完了,他开始对讨论的话题进行古怪的评论。客人们开始注意到他,而更让人关注的是酷爱天鹅的编辑和进出口商哈努尔·斯坦逊,还有他的连襟海默·夫兰兹(他是一个船务经纪人)。他们长得很像。海默的头发有些花白了,而哈努尔看上去红光满面,身体健壮。

"完全正确,"每次哈努尔认为对某事做出了明智的判断时,就会这样说。"应该写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

玛丽亚说她进去时,他们就停止了谈话。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她给他们送去了好吃的点心和饮料:咖啡、蛋糕、葡萄酒和白兰地。他们有时也玩牌,阿特里也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玩一会儿,不过他一再强调自己不会玩。不知为什么,我和玛丽亚都认为有他们的儿子在场时,波利博士的言行举止总是显得有点尴尬,不知所措。他似乎需要和儿子谈一谈,但一直没有机会。有时,他清清嗓子想说,或"嗯"的一声暗示下面还想说点什么,但常常刚一开口,话又咽回去了。

有一次我听到他暗示说,他很担心这个孩子。那天是星期一,波利博士中午从办公室回来。一进门就问玛丽亚,他儿子在哪里,玛丽亚说他在睡觉。他帽子都没来得及摘下,就径直去了地下室。从储藏室里我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你为什么没去面试?"我听到波利博士问,"他在等你。他取消了会议专门等你,你却连面都不露……"

"哦,老爸,我太累了。"

"在中午,才刚过两点。"

"我有些不舒服。"

我总是想,他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我有时想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心情如此沉重。我想帮助他,因为我理解他,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疲惫不堪的雅各布的影子,睡觉、喝酒、抽烟——仿佛他

睡着的时候感觉最好，或者他已麻木迟钝了。有时候，客人还没有告辞，他就已经在角落的椅子里睡着了。有时还得要人扶着他回地下室。他父亲经常扶他下去，但有一次轮到我头上。

"谢谢你，阿斯蒂斯，"他咕哝道，"我知道自己没法子。我是说重力。"

"你也许该少喝点。"我贸然说。

他笑了。

"有时候，了解得越少越好。"

有一次他们父子俩发生争执。那天很晚了，他们下午去参加一个宴会，快十一点才回来。"天鹅爱好者"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要了咖啡和白兰地，哈努尔·斯坦逊要了威士忌。波利博士看起来还比较清醒。阿特里在讲话，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我从厨房能听到些，但除了只言片语，几乎听不清什么。很快波利博士打断了他的谈话。我从未见他发过脾气，但这次他是真动怒了。他们的争吵使我感到不安，可我还是朝书房方向移去。

"我不愿听到这样的谈话。"我听见主人说。

"年轻人是对的，波利，""天鹅爱好者"说，"是别人让他把这消息传来的。"

"我不愿再听到这样的谈话，阿特里，"他父亲重复说，"如果没有别人听到，那该多好，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

大家都没讲话。

"我要做我喜欢的事。"

"闭嘴，别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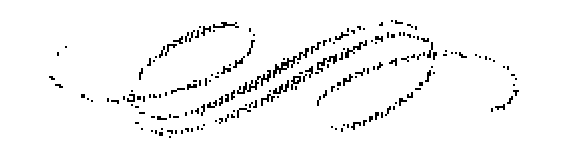
我从门口走开了。

"打牌怎样？"哈努尔建议说，"还早呢。"

波利博士把门打开。

"我想某些人该上床睡觉了。阿特里……"

他挽着儿子的胳膊扶他下地下室。



“别碰我，我自己能走！”

“这可是有点变化。”

他放开他，等地下室的门关上后才转回来。

“打牌没什么意思。”哈努尔说。

主人抓起他的帽子把他送到门口。

“他说了他要告诉我的，”哈努尔说，“他应该把自己所想的东西讲出来。”

这时波利博士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推了出去。

“别再提这事，不论对他还是别人。如果再让我听到，后果自负。”

哈努尔·斯坦逊心情沮丧，踉踉跄跄地走了。他走后，主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有很长的时间，然后才慢慢上楼去了。

我刚想睡去，忽然发现地下室楼梯上的灯还开着。我打开门想把灯关掉，发现主人的儿子竟在第一阶梯子上睡着了。我想叫醒他，但我费了好大劲，他才睁开眼睛。

他朝我神秘地笑了一下。

“德国，”他说，“我们清楚那里在发生什么事。你和我都知道。”

我扶他下去，他和衣躺下了。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他时，他已睡着了。

安东尼说，1930 年冬他在巴黎时，一时心血来潮买了这东西。虽然价格不菲，但只是我们后来决定卖掉这幅画的价格的一小部分。他说，那天下午他到莱茵河西岸散步，当时夕阳西下，微风预示着夜霜即将降临。他从一扇窗户外看到了那幅画。画挂在靠近窗户的墙上，阳光照射在上面，他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了。画并不大，但画家的手法不错。左下角用极小的字母署名：毕加索，淡蓝色的墨迹。那个青年——我想应该是个男子而不是女孩——双手伸向天

空，他肤色白皙，金黄色的齐肩发。这是一幅很美的画，但我们却无力保留它。当我第一次冒险建议安东尼把它卖了的时候，他立刻打断我的话。几年后，他对我说，如果当初听了我的建议，我们会损失一大笔钱，因为画的价格一直在涨。他是对的，我很遗憾这件事。要知道，如果卖了那幅画，我们的生活要宽裕得多。每次经过书房看见那幅画，我就想起我的失败。我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它。我告诉过你（这幅画），让你等，要等下去。

正当我们打算把西厢房和游戏间调换一下时，碰巧有人要买安东尼的画，他不再拒绝了。为了把画的价格卖高点儿，我当然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不久前一位客人曾对我说他想买那幅画。那人叫罗德，是美国的一个有钱人，我猜他是靠做罐头生意发迹的。因为我们急需钱，我很高兴他能感兴趣。他先出了一大笔，谈了一会儿后，他出了三倍的价钱。最后我告诉他，很可惜，我无权把画卖给他，他得和安东尼讲这事。他看起来有点恼火，但很快平静下来，因为我保证如果安东尼和我商议此事，我一定投赞成票。我悄悄对他说，最好不要让安东尼知道我们谈过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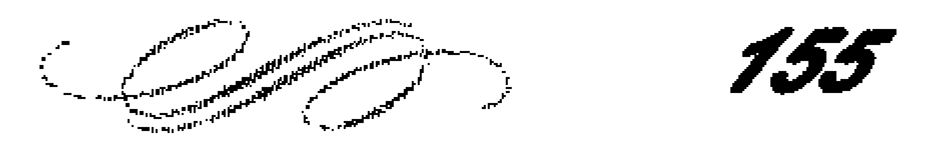
罗德拿着画走了后，我发现安东尼站在空荡荡的墙壁下，看着曾经挂过画的那个地方。说起来有点惭愧，但那一刻我确实有点嫉妒。他注意到我来了，像是要对我作解释。他说："我总感到那孩子似乎伸出双手，在呼唤上帝。"

我又一次感到有点嫉妒，但尽量控制住了。

"就像我们伸手去抓空气。"我自言自语道，然后让他自己站在空荡荡的墙下。

"你只能怪自己。"这声音仍在我耳边回荡。

夜幕降临的时候，太阳羞答答地躲到了云层后面，月亮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像一只随风飘荡的灯笼。"你还想什么？""只能怪你



自己！”无休止的声音，老是在耳边回响，在我昏昏欲睡、朦朦胧胧之中，一直在追赶着我，困扰着我。

我四处奔逃。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歇息，远离那双冷酷无情的眼光。我看着倒映在水中的脸庞随波荡漾，我感到走廊就像温室和小河上的桥一样，给我提供了避难的栖息之地。我获得自由了，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阿斯蒂斯，我们彼此了解，我们俩都明白眼前的一切。”

朦胧中，我看见一头野兽，我感觉它在我的脸颊上的喘息炙热而潮湿。起初，它小心翼翼的，接着因某种欲望而变得疯狂起来。它用舌头舔舐着我的喉咙，我感到一阵恐惧。他呻吟着，快乐得全身颤抖。一切都结束了，留下一片寂静，万物空濛。

“阿斯蒂斯，我很幸运，不过我不想再谈起这事儿。太难了，不过终于还是回来了，一切都过去了！”

夫人还在睡觉，男主人出去了。玛丽亚去看望住在东部的姐姐。

“阿斯蒂斯，能扶我下去吗？我右腿偶尔有点疼，如果你不介意……”

那天晚上，他的呼吸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酒味儿。他说他去听了一场音乐会。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他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我搂住了他的腰。

“雅各布，”我对他说。他惊了一下。“阿特里，”我纠正我的说话，“小心最后一步楼梯。”门一直通向卧室，我把他扶到床前。“阿斯蒂斯，在我身边坐一会儿好吗？我很幸运，我回家了。”

我感觉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既温柔又犹豫；他喃喃细语，不知在说些什么。我闭上了眼睛。

“迪萨，游过来，”雅各布说，“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

“你过来就知道了！”

“什么？”



眼睛是褐色？还是蓝色？我无从判断。

“过来呀。”

他的手伸进我的内衣里轻轻地抚摸，从臀部开始一直到我的乳房上才停止。

“躺下。”

“过来。”我听见雅各布在远方召呼我，他游到了池塘中间，不时像鸭子一样潜水，又出人意料地突然从水里冒出来，朝我笑。

“过来吧，迪萨。”

池塘的水面上荡起一层层涟漪。他进入到我的体内，呼吸急促，迫不及待，滚烫的双手在我的全身上下抚摸，情绪异常激动。他用舌头舔我的脖子和乳房，含着我的乳头，被汗水湿透的头发散落在我的胸前！我游到他身边，搂住他。他一只手高高举出水面，手里握着一束鲜花。

“是给我摘的花儿吗？”

“你以为我要干嘛？戏弄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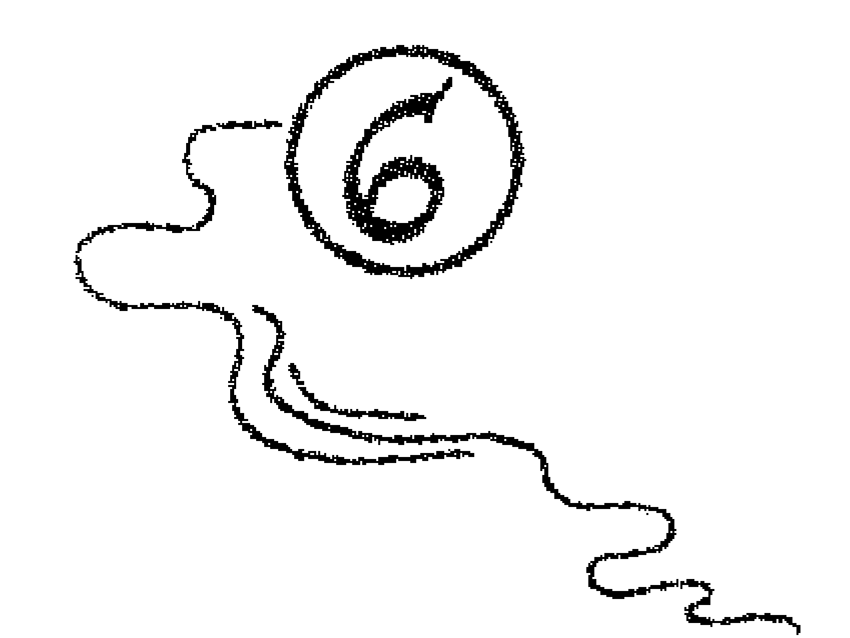
他抓住我，使劲儿地摇晃。我无法挣脱，也不想挣脱。我不想尖叫，也不想让他住手，也没有呻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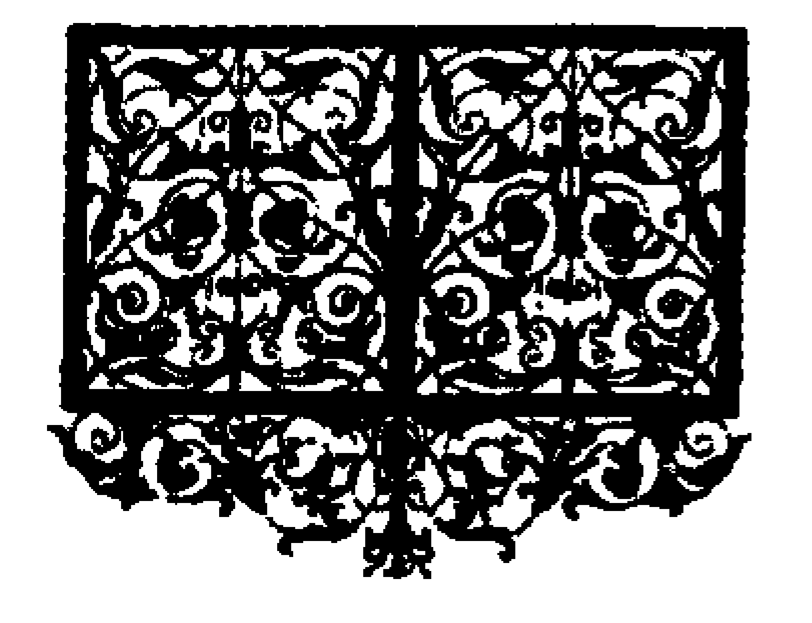
他松开我，沉下去，又站了起来。

我清醒过来，他站在我面前，正提起裤子，用右边衣袖擦着眼角的汗水。

“你应该常到地下室来看我。”

我梦见雅各布递给我的鲜花已经枯萎了。


6



自从那天的事儿以后，我就尽量回避主人的儿子。幸运的是，我见到他的时间比以往少多了。我见他买了一辆旧车，在他父母的兴维尔利尔的避暑山庄里一连呆了好几个星期。趁着天没有下雪的时候，他常常回到城里来取些吃的东西，另外，顺便也把衣服拿回来洗洗。记得有一次，他从瓦尔霍尔旅馆打来电话找他父亲。我的主人和阿特里讲了一会儿，然后又和管家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我听到他说要送些钱去支付儿子的开销。

“他一直热爱大自然。”夫人说。但在我看来，每次话题转到避暑山庄之行时，波利博士总是皱着眉头。不用说，他的这种表情一定和放在汽车行李箱的威士忌酒有关。阿特里最近还在担任两名高中女生的家庭教师，给她们补习德语，他差不多已把她们给忘了。看得出来，其中一位女生来上课是出于父母的压力，一旦不上课了，她就高兴得不得了。不过她那位16岁的同伴，长着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倒是坚持不懈地学习。每天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她打给阿特里的。她的声音让我吃惊，不过，我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后

来我才想起这个姑娘。

没必要再细述自那晚发生在地下室的事情以后我的状况。我有时问自己是不是同情他，可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再过几个月就是除夕了，我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

然而，我心里确实很清楚，我深信他被不幸的遭遇所困扰和折磨。我想，他在德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向我暗示过，但一直没有亲口说出来。他迟钝的眼神，漠然的表情，似笑非笑，做作的"笑脸"，软弱无力的双手——所有这些都是证明。

褐色的眼睛？蓝色的？我弄不明白，也许眼窝里只有黑暗。

我真幼稚，真傻。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同过去划上一个句号，割断过去的恩恩怨怨或烦恼。很久以前我就认为，一切都变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什么都没有变，二十年光阴真是弹指一挥间。有人说，你长大了，好像他们大彻大悟了，自欺欺人地板着一副面孔假正经，要么就低声细语，牢骚满腹，连镜子也不敢照。

傍晚，我很难集中精力专心看书，也找不到人聊天，于是我就听听音乐打发时间，以免胡思乱想。我几乎没见到过乔朗恩了，只是偶尔打个电话，不过谈话的内容都是一些简短的寒暄而已。我和父亲常常通信，他说母亲身体不太好，我却不以为然。有时我尽可能听一点儿英国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尤其是午夜新闻。1940 年 12 月初，英国已开始报道冰岛的战况，我迫使自己把这些报道听完。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放弃了想再次见到雅各布的愿望。也许我早已放弃了这一希望，只是我自己没意识到罢了。我觉得安东尼在信中隐瞒了许多事。他和我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的。比如谈及有关大卫无功而返的调查和他亲自去见伦敦官员的事情，但他们也没有什么鼓舞人的消息要告诉他。"但是，"他总是加上一句话，"我们必须期望最好的结局。"

满怀希望和拥有自欺欺人的心理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姐妹。我已学会尽量逃避这对孪生姐妹。她们笑的很媚人，给人误导，许下

许多承诺，却不恪守自己的诺言。现在我费尽心思，就是想回避她们。我请求埃利斯医生不要对我隐瞒真相，他刚开始感到很困惑，不过后来就不再对我掩饰什么了。我记得他起身走到窗前，看看外面，左手抚弄着一支用旧了的自来水笔，右手抚弄着他那稀少的头发。

真理既要精确又要浓缩，有时难以把握。

“18 个月的时间。”他终于开口说道。

“18 个月？你确定吗？”

“12 个月到 18 个月。”

“就算是 12 个月吧。”

那天晚上，我打算坐出租车去弗乔卢卡塔。我不想下车，只是让司机把车停在栅栏边，我只想静静地看看那座房子，特别是花园。我想重温一下花园里的亮光，那是我过去每天晚上坐在房间里独处时惟一的享受。夏夜，淡蓝色的光透过树叶，铺洒在院落里和灌木丛中；秋夜里褐色的亮光仿佛是雨中的树叶或是英国士兵身上穿的大衣。我打算今晚去那里看看，因为我已准备在那儿去听听逝去的声音，看看窗边那张白皙的脸庞。我已无所畏惧，因为我已作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十二月初，我觉得我好像收到有关雅各布的噩耗。

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盖布利尔·图格涅夫·彼德刚刚一结束播音，然后就放起了《月光奏鸣曲》。屋外，细雨绵绵，没有风，云里残存的光亮依稀可见。我朝花园望去，见到一只猫，叼着捕获的猎物从草地上经过。猫跑得很慢，不时停下来紧紧抓住那只还在挣扎的鸟儿。不一会儿，鸟和猫的战斗结束了，猫走进隔壁花园的时候，鸟儿已不再挣扎了。

黄昏的时候，我在那里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傍晚，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越下越大。第二天冰冻的地面上到处是泥水坑。

战后，大卫来萨默尔塞特告诉我们，他收到雅各布已死的确切消息。听他给我讲这个噩耗，我就像是在读一张旧报纸一样，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我想他是不会明白的。

“你母亲患的是重流感。”父亲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当时一点也没在意，我猜想父亲是在有意夸大母亲的病情。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想在我和母亲之间斡旋，调节我和母亲两人之间的关系。我早已怀疑他夸大了母亲的病情，然而几天以后，他又给我打电话。玛丽亚叫我接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对我讲什么话。

“你母亲的病非常严重，她剩下的时间已不多了。”他说，“她说她想见你最后一面。”

那是12月20日，我们正在为圣诞节做准备。女主人要求我们在十二月中旬就装点好房屋，所以整个房屋的气氛早就像过节一样了。乔朗恩请我和她家人在圣诞节除夕一起吃晚饭，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知道，她请我只不过是出于礼貌或者某种义务而已。而现在，她已带着赫尔伽到北方去了母亲那儿。

圣诞节即将到来，我很难脱身。女主人安排了四场节日晚会。另外，波利博士还邀请了银行全体职员30日来参加鸡尾酒会。我想做点营养丰富的菜肴，因为女主人最近一直胃口不好。波利又总是吃些简便的东西。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另外，我还有些怀疑，父亲是在有意夸大母亲的病情。

冬天没有开往阿库雷里的班车。波利博士碰巧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客尼斯骞·客尼斯骞逊明天要开车到北方去，顺便稍几位乘客去北方。因为天气渐渐好转，路上积雪已开始化了。听

到这个消息，我心情十分复杂，但我还是决定回去一趟。

下了一夜的大雪。清晨，外面一片寂静。花园里的人行道上被盖上一层皑皑的白雪。一上车，我就感到一阵恐惧，因为其他乘客都用一种古怪的神情看我。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简直有些害怕他们。我上车后还没来得及去坐靠后的座位时，手中的行李箱差一点掉到了地上，我赶紧抓住车子，不然就掉下去了。

出城的一路上，路边的房舍依稀可见，房屋里灯光若隐若现。将近八点钟了，四处几乎还是一片漆黑。我无法摆脱上车时的恐惧感，车子上路后，这种感觉越来越严重。我明白，我已没有了退路。我们的车驶过郊外那条小河的时候，我很想让司机停车，让我下去。不幸的是，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闭上眼，试图忘掉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那天似乎永远见不到黎明。车子出城时我看到的月亮，现在已被云层遮住了。车叽叽嘎嘎地往前行驶，凛冽的寒风在车窗外不停地呼啸，道路两边的弯曲的峡谷又深又黑，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有时，我感觉好像看到黑暗中的一道道群山，一片白茫茫的荒原，偏僻的农庄，还有窗户里微弱的灯光和窗玻璃上的小水珠。我两眼凝视着车窗外的一切。

我连现在也不知道，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拂晓前的晨光很刺眼，于是我闭上了眼睛。我当时一定是睡着了。司机急刹车时，我撞到了我前面坐位的后背上。车在原地旋了一圈，然后在悬崖边上停了下来。

“马，”有人喊道，“我们的车撞了一匹马。”

我用力站了起来。一位和他父亲一起出游的小男孩被摔倒在车上，擦破了前额。他父亲赶紧把他抱在怀里，孩子哭了起来。司机问有没有人受伤，然后就和几个人下车去查看。我的肩也被撞痛了，不过还是跟着下去了，因为里面呼吸很困难。雪已经下了很久了。路上还有血迹，不过我们没有发现马的踪影。我们沿着血迹来到附近的一个土丘前，还是没找到马的影子。



“是一匹白马。”司机说。

“白色的？”

“是的，我想应该是吧。不过我也不敢肯定。”

我们转回来风越来越大，雪花在车灯前不停地飞舞。

“我们不要在这里逗留了，”司机说，“到了阿库雷里，我会告诉他们有关马的事儿。”谢天谢地，我们情况还不算糟。

小男孩没有哭了，他坐在他父亲的腿上。车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讲话。雪越下越大，我们的车也在呻吟着向前移动。

“会发动起来的，”司机安慰我们说道，“我遇到过比今天还糟的事儿。”

车开得很慢，到阿库雷里已经是傍晚了。乘客们松了口气，纷纷夸司机技术不错。司机听了很得意。

“希望明天早上船能起航。”我们下车的时候，司机对我说。

我在阿库雷里旅馆住了下来。我住的房间里的正面墙壁上方，有一幅海港图。

外面，雪还在不停地下。

松软的积雪覆盖着街道和对面人行道上的凳子。马车驶过的印迹没有被刚刚下的雪掩住，还清晰可见。可以判断，送牛奶的人，一定是刚刚才把牛奶桶放在街道对面的主要路口上的。我想，他肯定刚刚才转过马路，还能看见他的背影。于是，我靠近窗户，隔着玻璃，沿着马路上的车辙望去，一直看着他来到旅馆前。窗户的玻璃上结了一层冰。我的鼻尖挨在玻璃上，冷得我浑身一颤。这时床头灯突然熄了，我听见楼下工作人员乱哄哄的吵闹声，原来是停电了。我摸黑穿上冰凉的衣服，把手放在暖气片上烤了一会儿，然后下楼来。

接待处和餐厅里都点上了蜡烛。港湾里，海风在水面上掠过，



卷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有人告诉我，去考帕斯克尔的船启不了航，出海的具体日期还无法确定。

昨晚给我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位女孩说："谁也不知道海风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不过，斯特芬十点钟要出去看一下。"

我不知道究竟谁是斯特芬。我突然间感到心里憋得慌，想出去走走。那时大概七点左右，只有我独自一人在风雪中游荡。看到商店窗户上的装饰，我才想起来，今天是圣诞除夕之夜。我早已把它给忘了。我来到镇广场上，圣诞树上的灯光一闪一闪的，一会儿亮，一会儿熄。圣诞树立在那儿，看上去显得孤苦伶仃的，很是凄凉。

我们一行三人——我和一对中年夫妇，本来想再往前继续走。他们要去考帕斯克尔附近看望女儿。从外面回来，我看见他们正和旅馆的经理坐在餐厅里喝咖啡。

看得出那男的是接待处那位女孩的父亲，他们俩长得很像。墙角落的钟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每过一刻钟还无聊地敲响一下。他们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钟上的时间，已经八点半了。

"斯特芬十点钟要去瞧一下，"经理解释说，"他什么也不怕，老斯特芬，什么也不怕，没什么让他害怕的。"

那对夫妇问是不是斯特芬·古德罗生，经理点了点头。接下来他们又谈起了他们的家谱。

"今晚我们不想营业，"经理最后又说，"我们想中午就关门，不过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的家人在一起。"他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夫妇俩低声道了谢。那女的擦了擦鼻子。我问经理知不知道客尼斯骞·客尼斯骞逊什么时候开车回去。

"客尼斯骞?他打算呆在这儿和他的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呢。"

我决定乘早班车出发，离开这里，最好是坐开往雷克雅未克的车。我心想，真不该来，不该让别人议论我。我父亲的担忧可能是没有道理的。我来到了阿库雷里，这里下着大雪。在这儿除了斯丁



娜姨妈,其他人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我又不愿见到她。我来了,又走不了。我远离我的工作和那面可爱的镜子,远离我喜欢的炉灶——虽然它平时也出点儿小毛病,远离靠我在节日期间为她做事的女主人。我来了,这里寂静得出奇,无法避免失败的可能性。我真担心,这里的平静很快要被打破。

我心绪很乱,简直理不出头绪来。不知为什么,我开始觉得我的同行者——那一对夫妇,好像不怎么喜欢我。我一出去,他们就和经理以及经理的女儿,在一起议论我怎么办?万一他们假装知道点什么怎么办?似乎他们已经了解了他们认为我隐瞒的事实?他们的目光游离不定,仿佛明白自己做了错事。我在门口停下来,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他们朝我看看,经理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说道:"坐下来喝杯咖啡吧。散了步以后,喝上一杯咖啡对身体有好处。"

我意识到自己有些不知所以,惊慌失措。

"等一会儿吧,"我说,"等我把大衣挂好。"

我到楼下来的时候,咖啡已经凉了。

乔朗恩打电话给我说,母亲去世了。这时候雪已经停了。那天早上六点钟,人们正往教堂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晴的,我一定是走神了,不过我想肯定是在夜幕降临前,天就已经晴了。我打开卧室的窗户,坐在窗子旁边消磨时间。一天的紧张焦虑后,我感到身心疲惫。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比以往坐的时间要长得多。我看见有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跟在他父亲后面,从旅馆旁边经过。小孩儿身上的大衣有些肥大,可能是别人给的。我听见他在哭,好像是在向他父母亲要什么东西。于是,我就偷听他们在说什么,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儿。

"妈妈,求求你了,就一次,求求你了,让我晚饭前打开礼物看

看，就一次。”

经理的女儿来叫我接电话以前，我早就听到了楼下的电话铃响。电话铃的声音很大。我想又有什么事找我。乔朗恩两点钟来过电话，说母亲已经不行了。来电了。外面还在下雪。

我和乔朗恩通完电话后，经理的女儿问我：“没事儿吧？”

“没事儿。”

“你有把握？”

“我有把握。”

“要我做点什么？”

“什么也不需要。”

“你肯定……”

“我肯定。”

“……跟我们一起吃饭怎样？不然的话，你今晚会感到孤独的。这可是平安夜呀。”她又说，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但她肯定知道，把我一个人撂在一边儿她会难受的。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换上了最好的衣服，她回来就是把自己办公室的门关上，叫她父亲回家去，因为他们全家都在等他回去。

“对了，要是你改变了主意，就到我们家来，你知道我们的住处。祝你圣诞快乐！”她轻手轻脚地关上门，接着又开门进来取她放在接待处的两件忘记拿走的圣诞礼物。

“这是送给我爸爸和妈妈的礼物。圣诞快乐！”她说。

夜晚，一片寂静。教堂的钟声对我没有任何触动，但它却像一个标点符号，出现在这片寂寞静谧之中。我听见窗外隐隐约约有人在唱圣歌，歌名叫《夜晚静悄悄》，就在附近不远。我记得很清楚，唱歌的是一位少女。歌声就像上楼梯时发出的吱呀的响声。我无动于衷，一动不动的站在最低层的梯子上。

“你想不想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女孩离去之前问我，



"你知道怎样听吧？"

我对她表示感谢。

她走的时候又说："今天晚上的风可能会停下来，但愿你明天早上能够继续你的旅行。"

我爬了两步楼梯，停下了脚步。我听见楼板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响声，于是我将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然后又从右移到左。时钟开始报时，已经六点钟了。我记得楼梯的响声没有刚才那么大声，我转身去看一看楼梯，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乔朗恩的话。

"你来不了，太惋惜了！"她边哭边说，"你们俩连最后也不能见上一面，这也太残酷了。"

下面的几步楼梯吱吱呀呀地响得更厉害，我突然开始感觉到有点发抖，几乎要失去重心了。我只好坐下来，抓住栏杆，稳住自己不往下坠。

"在一切事情发生之后，"我清楚地记得这是乔朗恩的原话，"一切事情都发生了。"

这时候，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什么也无法改变，什么也无法挽回了。我在怨恨中所说的话已降临到我自己的头上来了，像一个不祥之物砸在我的头上，打破了平静。我两手捂住耳朵，但已无济于事了，一样样东西从上面掉下来，响声更大，更无情。

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什么也无法挽回了。记忆成了永恒的符号，我越想越无地自容。

我哭过好久了，但全身仍在不停地颤抖。我听见有人路过，还在唱着歌。而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楼梯上，用手慢慢地抓住栏杆。

为什么每一件事的结局都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不会和解了。我也无法告诉她我是多么地爱她。

永远不会了！



我想象：一块白色的岩石，沐浴着阳光，崖石中间有一道缝隙，里面长出一颗干枯的小树。我老是心情沉重，郁郁寡欢。然而，在这细雨濛濛、平静如水的天气里，或在那微风吹送的日子里，小草上露珠莹莹，草叶被下午的雨水压弯了腰；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却显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我觉得夜雨之后，温室显得那样的温馨，就像雨天之后在凉台上散步一样，心情格外爽朗。尤其是舒服地睡了一觉之后，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没有被纷乱的思绪搅醒，我的心情特别舒畅。

明亮的灯光有时让我感到情绪不好；但如果是在漫长漆黑的冬夜，却又让我委靡不振，意志消沉，甚至感到有一种绝望的情绪。而黄昏却使我心神安宁，灵魂得到慰藉。也许这些都是出于我的想象，但我却常常想起白杨树林里的画眉鸟，它们在这烟雨朦胧的早上，却显得那样的欣喜若狂。

我母亲安葬的那一天，天气寒冷。中午的时候，天开始转暖。阳光把抬棺材的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在白色的大地上显得稀奇古怪。太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我用手遮住眼睛。乔朗恩也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她就站在我跟前，在我和斯丁娜姨妈的中间。父亲离我们的距离远一点。太阳光太强烈，大地被照得发白。我焦急地等待着葬礼早一点结束。

自从我上次见到父亲之后，他看上去比以前显得更加消瘦、干瘪、矮小了。他总是呆在诊所里，而且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沉默寡言的，一言不发。乔朗恩常常提起我和母亲之间的过节，我总是阻止她，让她别提以前的事儿了。虽然我每次都很生气，但我还是尽可能做到说话不伤她的心。她好像觉得很不安。我非常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于是我尽可能把话题转向其他事。让我欣慰的是，她同意在新年之前把母亲安葬了。我也急着回到雷克雅未克去上班。



昨天下午，和乔朗恩的女儿赫尔伽在饭店里喝咖啡的时候，我又想到一些往事。究竟应不应该和赫尔伽联系，我一直拿不稳，但我最终还是和她取得了联系。我毫不后悔——因为我们在一起非常愉快。小女孩的性格开朗，脾气温和。我生怕她提起我不愿提及的往事，幸运的是她非常喜欢英国的事儿，喜欢讨论烹调，不喜欢陈年往事。很显然，她父亲给她讲过她母亲的一些家史，但从她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她父母亲没有让她承担那些她不应该承担的一些琐事。这些，我都可以从姑娘的表情上判断出来。

我认为有必要过问一下她父亲的情况。姑娘很是称赞她的父亲；也讲了她继母的一些好话。她继母是一位教丹麦语的中学老师。她讲到她继母的工作地点时，我大吃了一惊。

她谈到我的弟弟卡里和他的家人去年夏天曾来过冰岛，这让我很惊讶。她还告诉我，她和他们一家到辛维利尔去过。她还告诉我说，她把他们家的衣服穿着玩儿，特别喜欢穿卡里的绿色花格裤子和白色的鞋子。我说我收到了他们家寄来的圣诞卡片和讲述他们家的几年来的一些往事的信件，但它们只字未提他们到冰岛旅行的事儿。

我们分别的时候，我邀请她顺道的话到迪通饭店来玩儿。我想，到那时我亲自去迎接她的可能性极小，所以说多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她走后我这样想：如果她真有一天来了，安东尼也不会放过机会款待她的。现在我仍是这样想的。我希望他不断地继续下去。要是家里面老是死气沉沉的话，我会受不了的。我想尽力排遣心里的寂寞，如果寂寞仍旧存在的话，我根本无法忍受。

我们在门厅吻别，互相道珍重。正在这个时候，她显得神情沮丧，并有意识地问我："外婆葬在哪里？"

我告诉她，她外婆的坟墓就在考帕斯克尔教堂的墓地。我建议她找个时间去拜祭一下她外婆。

我说："那里风景秀丽，漂亮极了。"我接着说，但我的话却显得

有些结结巴巴，“那里的天空……那里的天空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她走了以后，我才想起在母亲的葬礼完之后，与乔朗恩和父亲说再见时，我才感到如释重负。乔朗恩当时抱着赫尔伽向我乘的船挥手告别。我也挥手和他们告别。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到了考帕斯克尔来。

今天早上我和安东尼通了电话。开始的时候，他心情有点儿不好，但他慢慢地就恢复了常态，兴高采烈起来了。我从电话里听见远处有斧头的砍伐声，他说，木匠在安装东边偏房子的最后几扇门框，同时又在修理餐厅里的百叶窗。我们互相通报天气情况后，我告诉他我昨天晚上是从阿特里·博拉逊的家回来的，当时我是搭出租车去城里办事儿的。那幢房子非常漂亮，与山上的教堂毗邻，门前摆了一些花钵，花钵里的紫罗兰迎着阳光绽放。我告诉他，我们从那里经过也是巧合。有几条街因为要铺路面而被封闭了；我自己也想去看一看教堂的绿地上有没有小孩，还像以前一样在踢足球。我说，房子很漂亮，但现在已是人去楼空。另外，我又说，我在今天的报纸的第二版上偶然见到阿特里的照片。我笑着说，阿特里不像以前那样了。他开始秃顶，身体也不如以前好了。当我告诉安东尼这幅照片的时候，我简直有些忍俊不禁。我笑得直不起腰来，直咳嗽，只好放下电话掏手绢止咳。

等我重新拿起电话开始讲话的时候，他问我：“你现在怎么样？迪萨。”

“没问题。”我回答说。

明天下午两点钟在大学的剧院里举行毕业典礼。阿特里·博拉逊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也从来不会知道什么事。由于过去的衣服现在穿起来大了，来之前我只好专门去买了一件蓝色的衣服。

由于我试衣服的时候有安东尼给我当参谋，所以这一套衣服很合身。

“你打算对他讲什么呢？”安东尼问我。

我说我心里还没底儿，不过倒希望能在余下的几个小时想出一些话来。

“或者睡觉的时候，也许会从梦中得到启发。”我说。

我想念安东尼，但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身体不好。我思念马歇尔和我卧室窗前的那棵白杨树。我半梦半醒时，好像总是听到我那可爱的廷纳的叫声；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就在我的腿上擦痒痒。

“我很好，”我告诉安东尼，“我一点也不害怕。”

或许我还要告诉安东尼我的其他情况也很好。我心神不安，盘算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所以，我坐在窗前，望着懒洋洋照在广场上的阳光。我马上站起来，朝餐厅走去。

我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找了一个位子坐下，要了一杯柠檬水和一块松糕。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一点也没有味道，不过也没什么，我本来就没有胃口，滴答，滴答，咚咚咚。马路对面大教堂的钟好像在俯视着我。它显得傲气十足，好像大权在握似的。滴答，咚咚咚。时间如逝，光阴荏苒。

他的父母肯定会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意识到我毫不犹豫地写上“父母”二字。这样写我很高兴。我记得当时我见到了他的父母时，我是多么地宽慰。我记得她的眼神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还有那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她丈夫，看上去腼腆得可爱。阿特里刚上岸，衣着华丽，头发里梳子梳过的痕迹清晰可见。看得出，他上岸以前是经过一番打扮的。他站得有点远，显得手足无措。衣服看上去有点紧。

滴答，滴答，咚咚咚。 我对他说点什么好呢？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又从何说起呢？

我不知不觉地吃完了松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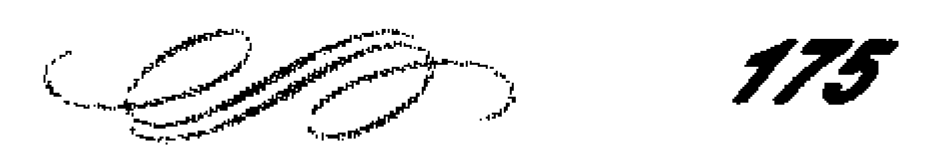
我坐上水上飞机，经过平凡而快乐的旅程之后，于12月30日晚上回到雷克雅未克。是女主人亲自来接我的。其实，我并不希望她来接我。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的表情是那样的严肃而刚毅。她给我的拥抱使我感到十分慰藉，似乎是我所经受的打击给她增强了力量。

玛丽亚来开门的时候，我看见屋里的圣诞彩灯依然亮着，屋里仍旧弥漫着一股松叶的味道。波利博士还在工作，但他一听说我回来了，就马上出来迎接我。他要帮我把行李箱搬到楼上去，我一点也没客气。虽然箱子不是很重，可当他搬上楼时，我见他中途放下箱子，歇了两次。他第二次歇息时，抓住一排红的彩色灯泡，这一排彩灯是我亲手绕在楼梯的扶手上，然后和杉树枝绑在一起的。他痛苦地尖叫了一声，但一点也没有退缩。我问他要不要给他拿一张冷水帕揩揩手指头，他没有同意。我记得当时他说："会过去的，阿斯蒂斯，一切都会过去的。"

主人家的儿子没有回来，也没有人提起过他的事儿。我自己也是见到了放在地下室的长统靴后，才想起他来的。我觉得这双靴子放在这儿有碍观瞻，于是顺手将它们放进了鞋柜里。

在去弗乔卢卡塔的路途中，女主人问我是不是还要休息几天，我说我想尽早回到厨房工作。我向她解释说："至少，我认为这样做是在尽我的责任。"

当天晚上，我睡得很香，连梦也没做过。新年除夕那一天，我一大清早就起来了。那天共进晚餐的一共有18个人，所以，我得赶紧作准备。东方的天边现出了鱼肚白，晨星由于白天开始到来，而显得苍白起来；厨房窗户外面的鹅鸟在路上跳动，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我的目光跟着那白色的痕迹移动，不知怎的，我突然感觉到有一个我未知的世界存在着。法在我脑海只停留短暂的时间，但它却



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间。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但是，刚开始我感觉有点神志不清，直到看到镜子里的我的时候，才清醒过来。由于我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是什么样的表情，所以，我感到一阵震惊。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晚上一共有 18 人用餐，我做了熏鱼和烤鸭。还是中午的时候，厨房里已是香气扑鼻了。这时候女主人给我递来一杯葡萄酒。我上厨的时候不习惯喝酒，不过在这样一个特殊境况下，我还是欣然接受了。

午后金色的阳光轻柔而暖和，一点也不刺眼，西沉的太阳挂在花园里的树梢上，像好奇的路人一样闪进了我的厨房。鸫鸟的出现让人身心鼓舞，随着夜暮降临而来的是一片静谧。我吸了一口气，感到一阵舒缓。我已从沉浸在北方旅游的思绪中解脱出来。或许，我应该拥有片刻的宁静。

下午，我听见前面房间里传出来阿特里的声音。他在大声讲话，我听见他爸爸叫他躺下睡觉，吃饭时叫他才起来。

“客人们午夜的时候要来看他，”女主人对我说，“来向他恭贺新年。我们大家吃完饭后，到我兄弟家去玩牌。”

我五点钟洗了个澡，换了衣服，整理好头发。然后，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脑子里还在想着积雪里鸫鸟留下的足迹。在路灯的照映下，鸟儿的足迹既看不到起点，也见不到终点。

吃过晚餐之后，女主人就邀请我和他们一起玩纸牌。我没有其他 事情干，再加上和她的弟弟吉斯利和弟媳玛格丽特一块玩儿感到很快乐，所以，我就接受了她的邀请。主人的儿子一个人呆在家里等待客人们到来。他的行为虽说和以往相比没有大的不同，但仍然显得有些离奇古怪。我们在桌子旁坐下，他刚开始有点不高兴，但随着晚会的进行，他开始高兴起来，威士忌酒劲也上来了。我们

大家都注意到：最近几天的聚会影响了他的情绪。吃饭的过程中，他父亲两次让他平静下来，而我吃饭时曾两次离开到厨房去了，所以没有听见他们父子俩的谈话。虽说儿子的脸上仍然挂着诡秘的微笑，但父亲的责备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事实上客人们对我做的菜肴赞不绝口，他们的赞扬是极其认真的，绝不是出于礼貌应酬。在这种气氛中，父子俩的交谈就显得不那么引人注意了，因而也就不会影响大家聚会的心情。

我们去玛格丽特和吉斯利家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钟了。我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女主人那天晚上甚至还叫我干女儿。她马上在钢琴前面的凳子上坐下。他们家的人比我想象要多。当然，这一点儿也没有影响我。我们喝着香槟酒，彼此祝福，一起唱《奥朗塞》歌。

“你干吗不给考帕斯克尔打个电话去？”女主人问道，“为什么不向你父亲道一声‘新年好’？”

“那儿电话现在还没有开通。”我回答说。

“哦，我真愚蠢，迪萨，我太傻了。”

我们女人们在一起玩儿，男人们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喝白兰地，抽雪茄烟。大家谈笑风生。女主人玩得兴高采烈，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叫成“小乖乖”。

深夜两点钟的时候，我感觉到累了。我站起身给主人道晚安。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女主人说。

在回到弗乔卢卡塔的路上，我看到五光十色的鞭炮在天空中绽放，光芒四射，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地又恢复了一片宁静。我从后门进屋，脱掉大衣，在厨房里取一杯牛奶，喝了再睡觉。主人的儿子的房子里还有客人。客厅里传来客人们的说话声，音量比我想象的要小。哈努尔·斯坦逊的说话声和其他人差不多大，可我一下就能听出他的声音。很明显，他非常兴奋。我情不自禁地走到他们的门前，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我一定要把这份报告刊登出来，谁也阻止不了我。"

"你是不是想坐牢啊？你认为那些可恶的英国人逮捕你会花多长时间吗？"

"他们能怎么样？是谁叫他们来这儿的？不！我一定要将阿特里的报告刊登出来，别人说什么我不管。我不怕那老家伙仗势欺人。"

"阿特里，你也想坐牢吗？"

没有人讲话。

"阿特里？"

"叫我吗？"

"是叫你。你也想坐牢吗？"

"你甚至没搞清楚我写的什么东西。"

"噢，那么你读给我们听听。"

"现在就读？"

"是的，现在就读。"

"哈努尔……"

"阿特里，我不会犹豫的。你有朋友的支持。"

阿特里打开前厅的门，我一下子跑到厨房里，他走进地下室，不久就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文件。

"他甚至到处去寻找灵感，"阿特里回来后，哈努尔·斯坦逊说，"我一定要将它登载出来，谁也阻止不了我，这是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儿！最后一件事儿！"

"读一读，阿特里。"

我听见了四个人的声音，阿特里、哈努尔还有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但我敢肯定，只有四个人。

"我读一读比约和我去达秋的旅程这一篇。"

"比约想呆在德国。"

"我能自己选吗？哈努尔，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别激动，我知道，是你父亲要你回家的。别太激动，继续念下去。”

他读得慢，但很清楚。我感到很奇怪，他似乎一点也没喝醉。其他人都静悄悄的。我的耳朵更加贴近了这扇门。

“我们去达秋的这天，天气晴朗。”他开始读。

希姆勒先生在特佩尔霍夫机场为我们安排了一架飞机。我们乘飞机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南方的巴伐利亚。像希姆勒那样每天都精力充沛的人，我还真是很少见到。他总是谈笑风生，和大家的关系非常融洽。很显然，他对冰岛情有独钟，他特别赞扬比约的父亲和那位首相。他说，他和富里尔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称赞我们是惟一的北方民族。他为人谦和，向来与人为善。

宽敞的集中营大门两侧矗立着瞭望塔，我估计有四个人那么高。每座塔的顶层上面都有一个平台，四周是铁栏杆，栏杆旁有两个当兵的坐着。当兵的拿着冲锋枪和喊话的喇叭。栏杆内有几个囚犯在活动，显然是在干什么活。房屋外面有几块草地和白菜地；还有稀稀拉拉的灌木丛和一个奇形怪状的花坛。不远处还有一个水塘，塘里有鸭子和小鱼在游动……有些囚犯是从其他普通监狱转到达秋来服狱的。这里有一个鞋厂、编织车间、木工房和缝纫车间。表现突出的囚犯还可以给他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做一些礼物寄回去……

所到之处，都能够感受到独具德国特色的秩序感。简言之，集中营还真像一个独立王国：一切井井有条，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那儿见到过许多丑恶的面孔，但这里犯人的容忍力令我钦佩。我对格洛克总司

令说，就是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像圣·劳伦斯一样在火刑架上炙烤，他们也不会动容。他知道我这样说的用意，只是对我笑了笑。我问其中一个囚犯："你犯的什么罪？"他回答说："我把我老婆杀了。""还有呢？"格洛克追问道，"还杀了我的四个孩子。"囚犯又回答说，"还有我母亲、父亲和弟弟……"

哈努尔·斯坦逊听了之后放声大笑，其他人也跟着大笑起来。

似乎没有人受到特别不好的待遇。"行为粗鲁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我对比约说，他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与希姆勒讨论了发生在11月9号的克里斯托纳持案件，这也是比约特别感兴趣的事。比约沉思良久，也认为，根据德国在巴黎的大使馆官员被波兰犹太人赫谢尔·格林兹潘谋杀一案来看，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他承诺将此事告诉他父亲比约逊大使。与此同时，我提出，第一部《绝育法》其冰岛特色太浓了。希姆勒先生听我说到格拉斯中世纪法典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该法典规定："对流浪者实施阉割所造成的伤残或死亡，不受法律制裁。"希姆勒先生边听边作笔记，他要求我再读一遍。他认为这条法律太了不起了。他认为古人在许多方面的做法远远超过现代人。我和比约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帮助对他非常重要。他请我把外交部长冯里本托洛普的信带给冰岛政府，警告他们不要对英国政府太纵容了。

"因为我觉得冰岛人非常友好，"他说，"我们不希望你们遭受什么不测。"

我向他保证，我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政府转达他的信。

与他会面之后能脱身，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这件事儿提一提很重要，”哈努尔·斯坦逊说，“非常重要，继续读，读一读你到布痕瓦尔德的报告。”

我慢慢地往楼上爬。

你一定会猜得出，是谁晚上悄声地对我说：“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对你说：“就你和我，阿斯蒂斯。”

我张开双腿，他的手伸进我衣服，往里面摸。他那湿漉漉的舌头在我的脖子和乳房上舔。我感到他的呼吸急促，迫不及待。

晚霞之中的花坛发出蓝色的光彩。水塘里的鸭子在嬉戏。“行为粗鲁一点没什么不好的。”

他没有强迫你做什么，他没有使用武力；他也从来没有威逼过你。你自己躺下，你没有说：“这样做不好，我不想做坏事儿。”你没有走开；你知道你并不是不喜欢做那事儿……

放开我，我说，别碰我！让我就躲在角落里；放开我的手，让我用我那使我误入歧途的手指尖触一下那热乎乎的东西。

我五点钟下楼去。客厅里的桌子上还摆放着酒杯和几瓶只喝了一半的葡萄酒，屋里还弥漫着香烟的烟雾。我好像仍然听得见他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我们去达秋的那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

借着苍白的光线，我看见桌子上有一摞文件。在一个威士忌酒瓶旁边散乱地堆放着一堆白色的纸张。我立即把它们和其他东西一起放进我的箱子里。

早上七点钟，迎着新年宁静的晨曦，我走了出去。



我认为女佣人会因今天早上我给她的建议而对我感激不尽的。最初她显得有点害怕，后来才知道我是在帮她。

由于坐在旁边一桌的那对夫妇一见到我坐下来就和我攀谈起来，她见了这种情况，一定认为我是英国人。夫妇俩说，他们是从黑斯廷斯来的，准备花十天的时间在冰岛各地玩一玩。我想他们的名字叫做布鲁克和布雷肯。男的说战争期间他就驻在冰岛。

“我知道斯盖尔，”他对我说。那是一种冰岛酸奶的名称，他发这个词的音特别准，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向我证实一下他的发音。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这时候一位女服务员过来了。

“你们要来一份早点吗？”她问道。

我招呼她离我近一点儿，我不想让其他人听见我说什么。

我告诉她说：“我是冰岛人，但是，如果我是英国人的话，你就应该说：‘请问你要不要早餐，夫人？’或者‘请您看看菜单点您的早餐如何，夫人？’”

我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我又指出几件可以改进的事。我告诉她，比如说，早餐前来一点果汁，茶水或者咖啡什么的。我还建议她别太慌忙了，实际上，我知道她急忙穿梭于餐桌之间，也是为了照顾好客人。

我悄声地对她说：“你那样做会让客人们反感的。”

她似乎很在意我所说的话，努力地将我提出的建议记在心里。至少后来在我们坐在那儿吃饭期间她没有以前那么慌张了。我们的谈话一完，她很快就给我端来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橘子汁儿。我离开之前扯了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一书的名字：《服务人员五百句常用语手册》，编者是位敦康尔宾馆的总管威廉·福赛特。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推荐给迪通饭店的职员们，因为他们已经接受过培训，礼貌用语、礼貌待人是他们的必修课。这些对外国人来说，是必须具备的东西。

女服务员满脸通红地接过纸条，但她还是向我表示感谢。我还



告诉她，她以后还可以读一本名叫《罗伯特家务管理手册》的书。其实，这本书很难买到。

我说："别被书名给吓着了。虽然这本书写于1827年，但其中有许多东西现在仍然实用。"

能够给那位女招待一些帮助，也是我的快乐。

一条灰色的云彩高高地挂在山顶上，乘着二月的疾风向我袭来。站在窗前，我感有点颤抖，我伸手拿起放在椅子上的毛衣，披在薄薄的晨衣上面。我抬头再看天空，那朵云随着一阵风消失在一群飞奔的白鸥鸟中。过了一会儿，它们又飞回来了，聚集在一块儿，好像它们的生命离不开这片故土；然后，它们又飞过小山，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

医生从屋里走出来。

四周灰蒙蒙一片：灰色的地板，灰色的墙壁，所有圣诞彩灯都显得暗淡。我和奥尔森夫人在一起住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她现在对我的态度，比我新年早晨去敲她家门的时候要好得多。我连续五天都在呕吐，她一见到我这样，没有问任何问题，马上就吩咐医生给我看病。透过这里的窗户，我能看见弗乔卢卡塔五十六号的房顶。我转过头来尽量不去看它。

医生进屋来了，他对我笑了笑。

"阿斯蒂斯，"他说，"真是可喜可贺呀！"

我站在凉台上，他的这些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荡。下午散步的时候，我在石头墙下休息休息，享受一下这里安宁静谧的环境。可医生的话仍在我耳边回响："祝贺、祝贺，我恭祝你，阿斯蒂斯！"这时我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说："阿斯蒂斯，你怀的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我吓了一跳！

我记得，我坐下之后，医生就开始忙开了。我听见他叫道："克

里斯丁，赶快过来！克里斯丁！”

两个星期以后，我就出发到考帕斯克尔去看我父亲。

我想把发生在过去的事全部忘掉。

我床前桌子上的灯光不分昼夜地亮着，暗暗的，呈红色；风还在窗外嚎叫。春天来了，户外的小溪唱着欢快的歌声。小溪潺潺的流水永远欢快地响个不停，只有爸爸上楼来的脚步声可以暂时打断一下。他来吩咐佣人给我准备吃的东西。还是在我孩提的时候，女佣人就一直在我家干活，但爸爸还是叫她发誓，千万不要把我怀孩子的事讲出去了。

“我会帮你的，”我回到家以后，爸爸就对我说，“但你必须生下这个孩子。”我说：“爸爸，我不能要这个孩子，我不能要他的孩子。”

爸爸毫不领会我的话。

“我敢肯定，孩子一生下来就会有好人来收养他的。但你必须把它生下来。”

楼下起居室的那只古老的闹钟，还在倒着时间不停地瞎奔跑一气。我感觉到它的时间每天都在慢，有时候敲钟声也跟着一起慢。我开始这样告诉自己：那钟摆下午可能休息了一下。当然啰，这些仅仅是我自己的想象罢了。敲钟声显得如此微弱而疲倦不堪，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我也不得而知。

头几个月时间里，我天天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从一把椅子挪到另一把椅子，聆听着房子里的宁静。有时我到父亲的诊所里坐坐，看他准备药物或者写报告寄到雷克雅未克去。到了晚上，爸爸就让我和他玩纸牌，然后就坐在餐厅里看大海。但我常常被黄昏的幻想所烦恼：我仿佛看见一叶扁舟在海上飘荡，然后被大海汹涌的波涛所吞噬。我常常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窗前，一直呆站在那儿。我心里明白，这是我的幻觉，但这种意识并不能让我好受一点。我还

看见那小船上有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站着。

刚回来的时候,每当夜暮降临之际,我都要到外面去走走。我很少走得太远,而且不去看海,我害怕看见大海吞噬陆地。相反,我却喜欢月亮和星星,每当我看见北极之光,尤如天神的翅膀在辽阔的田野上空闪烁的时候,我就感到心旷神怡。我曾暗想:要是天神的翅膀能将我带到那遥远的地方, 该有多么美好啊! 一切烟消云散,化作一团轻烟,随风飘散。

到后来,晚间散步增加了我的烦躁和焦虑不安,而且对我的身体也没有一点好处。爸爸老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坚持锻炼身体。我敢肯定,一定有人在监视我的行踪。

“究竟是谁在监视你呢?”父亲问我。

我也不知道。

由于那几个月我有点异常,反应也不怎么灵敏。我感到很不正常,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永远也不会成为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女人。四月的寒霜之夜,在皎洁的月光下,穿着睡衣走到门外的那个人不会是我。而我清楚地记得,我伴着蔚蓝的月光,沿着水边的湿地,朝着悬崖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我感觉不到寒冷的侵袭。我沿着岸边的坡地,一直走到湿地的尽头。突然间,我想到:要是走累了,我可以倚靠在月亮的光柱上休息片刻。

悬崖下的泉水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但是,我童年时候玩捉迷藏的地方——舒适的草丛,依然存在。我仰躺在地上,我觉得天上的星辰离我似乎近在咫尺, 真是美不胜收! 天上闪烁的星辰告诉我,我会万事如意,释去心中的担忧。这使我想起童年的生活。我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四周闪耀着红色的光芒。我听见女佣人在叫我爸爸:“她醒了, 乔思医生,她睁开眼睛了!”

我在床上躺了两周时间。爸爸那天晚上进来看我才发现我不在了。而只有他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他拯救了我和我肚

子里的小宝宝。

不，寒夜独步，差一点踏上不归之旅，患上了肺炎，人事不醒，卧床不起的那个人，绝不是我；那年夏天在房里魂不守舍、钟声不闻的那个人也不是我！究竟是谁呢？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九月初，晴朗的早晨，微风轻轻地擦着窗帘。我终于恢复了神智。说得准确一点，我是自己清醒过来的，我自己也是大吃一惊，尖叫起来。我记得我感到一阵疼痛，我想起了小比约克出生的时候，妈妈凄惨的叫声。霎时间，我觉得躺在床上的不是我，而是我母亲；我父亲和女佣人守候在我身旁。这时候我平静下来了，这是回家以后感到的第一次平静。

长期困扰着我的痛苦渐渐地散去，我不觉得痛苦了。他出生过后，我好像从魔窟里解放出来似的。中午，钟响十二声。父亲把他放在我的怀里。小生命在哭泣，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动，他的哭叫声穿过敞开的窗户，飞向秋高气爽的朗朗晴空。

小生命的哭声是广袤大地上奏响的美丽动听的旋律。

照片上可以看见我的面颊和手臂。我们的后面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我母亲用过的钢琴。他刚吃完我的奶，正偎依在我的怀抱里。我俯着头看看他的小脸蛋。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同意我的父亲给他拍照，但后来还是让步了。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拍到一次，从他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拍照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我经常发现我找不着照片了。我常常半夜起来，拉开床边的抽屉，把照片取出来。我常常白天随身携带着照片，有时把它压在一本旧的冰岛烹调书的封面下，如果我要外出的话，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包里。晚上，我睡觉前就把照片放在我的床边桌子的抽屉里。



那天夜里，我伸手什么也没有摸到，我一骨碌从床上起来，在我的包里寻找，结果什么也没找着；我跑下楼去，到厨房里打开灯，先在冰岛烹调手册里翻找，然后又在厨具旁边架子上的其他书里翻找。

照片没有找着。

我在绝望中叫醒了安东尼。他先是一阵惊讶，然后从床上起来帮我一起寻找。我们四处翻找，要到天亮的时候，才偶然在床头柜的背后看见了照片。

那天下午，我和安东尼到村里把照片复制出来，一共五份，尺寸大小一样大。我心里很害怕照片丢掉了，所以，我反复向老板夫妇俩强调，不要把原片搞丢了。我相信他们会比以往要小心一些。

我带了两张照片到冰岛，一张放在我的包里，另一张贴在卧室里的灯架上。

他偎依在我的怀抱里，我俯视着他的小脸。今天下午两点钟，他就要大学毕业了。

我们很幸运，为我接生的医生住在村外，离我们这儿较远。父亲向我保证说，其他人都不知道孩子的身世，也不知道我们后来的安排。知道这件事儿的只有父亲本人和他的朋友——一位地方法官。

当天上午，我看见一群大雁在田野上空，呈"V"字形飞翔。而现在，天空变得像门前的两簇灌木丛的叶子一样红，也有点像通向大门的那条熔岩石头砌成的石阶梯的颜色。他们的脚步踩在石梯上发出吱吱的响声，证明他们已经来了。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慢慢地临近。女佣人做了热巧克力。我们慢慢地品味刚做好的巧克力；那女的坐在我爸爸的对面，男的站在女人后面，起居室里突然变得寒气逼人。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然后上楼去。



他还在熟睡之中。那一男一女到来的时候，我刚好给他喂完奶。现在，他脸蛋上还放射出晚霞一样的红润的光。他的衣物已准备好了，就放在摇篮旁边的箱子里。我把箱子打开，确证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在摇篮边坐下来等待爸爸上来通知我。

我将孩子抱下楼的时候，那女人本能地笑了笑。她丈夫向前挪了挪步子，然后镇定下来，止住了脚步。他腼腆地欠了欠身子，两手不停地搓手指头；他点着头，但眼睛一直盯着孩子。我注意到，他身上穿的衣服有点紧。

"他，"我开始讲话，可马上又住了口。他们两口子都抬起头来望着我。"别人摸他的头，"我终于又开口说道，"他就会安静下来。"我又补充说，"要是他不舒服的话……"

我紧紧抱住孩子，全身开始颤抖，这是我最后一次抱我的小孩。我嗅到他身上散发出的奶气。我把孩子交给她的时候，孩子还在熟睡之中。

他们离去的时候，脚踩在熔岩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远处的大雁正飞向它们的归巢。我无精打采地站在窗前，望着那对夫妇带着我的孩子消失在夜暮之中。

我住在考帕斯克尔期间，安东尼每个月写给我不少于一封信。有时候我亲自回信，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叫爸爸代我回信。每次爸爸把信寄出去之前，我都要把信读一遍，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我会签上我的名。而到后来，我发现就是我父亲和他直接通信，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些什么。这样，他们可以直截了当地交谈关于我的情况。

五月份，我开始恢复正常之后，安东尼就给我讲有关迪通饭店的事。"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家宅，"他写道，"它孤单单的，里面除了一些回忆之外什么也没有，而有些往事最好是忘记。我突然想，



我们可以将它变成我们的避暑山庄。后来，我就想到了你……”

从那以后，他在每封信里都以这种语气给我讲话：

“我的希拉里阿姨，我还小的时候就和她的小猫住在那里。她是一个很凶恶的老太婆，她长着又长又细的鼻子，整天都骂骂咧咧的。‘安东尼，别在楼梯那里跑！安东尼，你把猫吓着了！’她不在的时候，我就趁机给那些可恶的小猫们喷水。尤其在夏天，那些小猫喜欢抓小鸟儿。我说她是一个巫婆，而我妈妈则骂我。”

他和父亲开始暗中策划。

“迪萨，听我讲迪通饭店……一幢乡村别墅，四周环境优美。你知道，让一切成为往事，换一换环境对你会有好处。”

“暖房里的所有玻璃都会重新安装好，”安东尼在信中说，“但是，那儿的景色都是难以比拟的。清晨的田野，云雾缭绕；坐在暖房里，沏上一杯热茶，等待着日出，甚是惬意。黄昏时刻，在暖室里也是别有情趣，你可以听到百鸟唱晚。通常是这样一幅景象：一鸟引吭高歌，百鸟齐声附和；歌声息歇，夜暮降临。啾啾，啾啾，鸟儿叫个不停。这时候看不到猫的踪影……”

“依我看，”我父亲评价道，“如此欢快的鸟的世界，的确不错……”

我亲爱的爸爸，他真好！他在诊所等病人就诊时，总是警告我；他从来不责怪我，也从来不发火。我告诉他我不想让乔朗恩知道我的情况。他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从不反对我的主张。他想方设法不让我的名字在各种文章中出现。我没有了主意，可他却是在拿自己的声誉为我担风险啊！他叮嘱那孩子的“父母”（我说“父母”，是脱口而出的），他们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告诉孩子，他不是他们亲生的，但他们必须保证，不提他女儿的名字。知道孩子生父的人，只有我和爸爸。

为了给我证实他所设想的迪通饭店不是空谈，安东尼特意给我寄来了他打的广告和他的投资计划。他的用心当然可嘉，可也表现

出他在某些方面的无知和幼稚。我把他给我的信和广告全都一并保管起来。

他寄给我的第一份广告上说："现代化的天然气炉具，科学烹调，味美可口。"那台在"零点利"商店购买的冷藏-制冰机更是让人心动："可用电动、蒸气、煤气，也可使用燃油的机器，G.J 沃萨姆父子有限公司"。我叫他别急着购买他在信中所讲的那些设备，他所说的布雷德福牌洗衣机，在他眼里好像是什么新玩艺儿。实际上，任何一个生活在三十年代，做过家务的人都知道，这种洗衣机早就过时了。

"这小子是认真的，你应该看得出来。"爸爸看了广告说，"制冰机，我说……"

九月下旬，安东尼又给我写信说："你现在好些了，我很高兴，战时储运部的朋友们说，他们只有一半的把握，你可以坐货船到英国来。他们还告诉我，你到冰岛时乘坐的布鲁阿夫斯号轮船还停靠在码头……我相信你知道这次航行有多大的危险性。"

"的确是要冒风险，"爸爸读了信，皱着眉头说，"唔。"

我和爸爸九月中旬分别后，我就有一种预感：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我猜想，他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可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这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噩耗！

我们在码头等船的时候，天下起雨来。刚开始只有零星小雨，不一会儿，山顶罩上了一层浓雾，然后天就下起大雨来。爸爸穿上出诊时穿的肥大的绿色防水衣，他用防水衣来给我们两个人遮雨。前天他才到劳法霍芬去探望了孩子，那是他第三次去了。

船来了，从蓝色的海面上驶过来了，船的灯光在雾霭中闪烁。

"孩子长得很好，"爸爸告诉我说，"收养他的夫妇很会照管孩子，他的身体长得棒，也很漂亮。"

我们的船驶出码头，爸爸仍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目送着我。我一直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身影。天越来越阴沉，他的身影在雨中变

得越来越模糊;慢慢的,爸爸的身影和岸上长满青苔的崖石,在我眼前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电话铃声把我唤醒了。

我感到很惊奇,可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远处猫头鹰的叫声,其他什么也没有听见。白杨树的影子在墙壁上不停地晃动,三个树枝,两个平行往前伸展,另外一个树枝斜着伸向天空。我感觉好像是夏天,好像是冬天,好像是圣诞之夜。我满脑子是吃的东西和喝的酒水,心里想的全是烛光和村子里教堂的钟声。好像春天来了,户外的草坪迎来了拂晓;好像是秋天,湿润的大地雾气缭绕。

电话铃声突然间把我闹醒。就像十五年前他受伤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在码头上玩耍,卡车司机没有注意到他。

"他的腿断了,"波利博士在电话里告诉我,"不过他已清醒过来了。他折断几根肋骨,还有擦伤。"

那是一个秋天的日子,雨水模糊了窗户,小溪和老马歇尔的房子都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之中。

"他有生命危险吗?"

"没有生命危险,但以后几个月的日子可不好过。"

"我马上过来。"

对方一句话也不讲,很长时间不讲话。

"他们俩都在照顾他,"他终于说话了,"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父母就是在他生病的时候不分昼夜守候在他身边的人,也是看着他迈出人生第一步的人;是照顾他的生活,给他取名字的人。他叫赫尔吉,赫尔吉·阿纳逊。

我的反应有些好笑。我能做点什么呢?他根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姓甚名谁,我的出现肯定会给他带来恐惧。因此,我必须离开那个地方,迫使自己不讲出事实真相。我多么想把他抱在我的怀



里，让他紧贴在我的身上，告诉他我是多么地爱她！可最后我还是振作起来了，我心跳的速度降了下来了，呼吸也正常了。

雨停了，花坛里的花草在寒风中颤抖。我慢慢地挪动步子。太阳出来了又落下山，厨房里的余火发出的热气让人感到温暖。

岁月无情地流逝，每一个夜晚好似一次面临的惩罚。过往的岁月里，每一场梦犹如一阵电话的铃声。

“廷纳，亲爱的老太婆，坐到我的身边来吧，让我暖暖身子。”阳光很快将草地的迷雾驱散，轻轻地，轻轻地，像一位母亲用手轻轻地抚摸自己小孩的面颊。

电话铃没有响。

危险即将过去。

我们正准备在桌子边找个座位坐下来，天突然黑下来了。我一直在走廊上等他，我们一见面天就下起大雨来。我们手牵手开始向餐厅迈步，彼此都不松开。我们不知不觉地止住脚步，观看打在地上的雨点和街道对面独立英雄纪念雕塑周围的草坪。这时候老波利——我以前的雇主，看看表说：“但愿毕业典礼开始的时候，天会晴起来。”

老雇主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了。老人可亲可爱。他毕竟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了，行动起来自然不那么灵便，走起路来有时显得还有点摇摇晃晃的。他说，他的听觉已不如从前了，但他说话的语气却还是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

我们坐下的时候他又说，“我希望天快点晴起来，今天早上天气还是好好的。”

我还记得，我上次见到他的那一天是 1941 年 12 月 18 日，我当时正乘船去英国。

我提前两天给他打电话，说我已经到了。他在电话里跟我说，



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我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马上又说，我们的谈话不应该让第三人听见。他欢迎我，但他握手时却没有力气，眼神也很冷淡(他的眼睛患白内障，好像要失明，眼球甚至向内陷进去了)。他的秘书给我们端来咖啡，我们坐在靠窗边的沙发上。我看见桌子上方有一幅画像，画里有他和另外两位头发斑白的老人。他注意到我在看那幅画，解释说："那是我五十岁那年员工们送给我的礼物。"他说着话，显得有些腼腆。

房间里铺着波斯地毯，四壁为木质板，门边是书架，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宁静舒适。书桌上摆着几份文件，上面压着镀银的镇纸；旁边立着一个猎鹰标本。我们当中的桌子上放有几个鹅卵石；他拿起一个石头，把它夹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漫不经心地玩耍。我瞅了瞅窗外。窗户一共有八格，下面的几格是封严了的，只有上面的几格可以让阳光射进来。从街道对面的房顶，可以看见晴朗的天空。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并请他发誓保证一辈子保守秘密。他想了片刻也就点头答应了。我本来希望他微笑一下，然后拒绝我的请求，或者是婉言谢绝，可他没有这样做。

他点着头，默默地听我说话，我给他讲我和他儿子阿特里的关系，新年除夕之夜读文件的事(我没提及离开弗乔卢卡塔时，我拿文件的事儿)；我在考帕斯克尔度过几个月的经历，我的儿子以及收养他的劳法霍芬的渔民夫妇。

他静静地听着，手指里的石头也不转动了，他只是用手轻轻地摸着石头，好像石头非常脆弱似的。

"除了我父亲之外，没人知道他的生父是谁。"我告诉他说，"你可以远看，用不着替孩子担心。"

太阳透过窗户射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眨了眨眼睛，避开刺目的强光。

"你为什么要向我吐露真情呢？"他最后问道。



“我爸爸渐渐老了，”我说，“阿利是渔夫……”

“你说什么？”

“他父亲，”我解释道。

“噢，他的父亲，嗯。”

“谁也说不清我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还是安全第一，别给自己留遗憾。”

咖啡凉了，也许他的秘书端来的时候本来就不太热。

“你今天就要乘船离开这儿吗？”

“就今天晚上。”

“海上的空气应该有益于你的身体健康，祝你一路平安！阿斯蒂斯。”

我非常相信他的话，看着他伸手到碗里拿一块方糖，塞进嘴里。我记得我当时显得非常平静。

“我真希望到时候天气能好起来，”他说，“今天早上天气还好好的。”

那位我曾建议她提高英语水平的女服务员，一走近我们的桌子就感到有点紧张。我冲她笑了笑。

“我很怀念她当初水平差的那段时间，”他说，他首先打破沉寂。“你知道，她喜欢你。”

他说这些，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所以我清了清嗓子，然后才回答他。

“这也是互相的，”我说，“我也常想念她。”

外面还在下雨，我们慢慢吃着东西。其实我并不饿，但这些东西非常可口，那位女孩儿也不像过去那样在我们面前显得紧张兮兮的了。

“《服务人员五百句常用语手册》。”她过来收拾桌子的时候，我有意这样说。

“是威廉·福赛特编撰的。”她调皮地回答说。



"是威廉 · P.F. · 福赛特。"我补充道。

我们站起来准备动身。

"你还感到害怕吗？"他问道。

我们仍旧手挽着手一起走。

"我想我的主意已定。"我回答。

"不错，不错，这样我就高兴多了。"

摇晃不定的影子——微弱的响声。

我前面的灯光，一束遥远的光芒；吵闹喧嚣，哄笑声声。我的老雇主俯身过来，在我耳边耳语着什么，可是我什么也听不见。透过敞开的大门，我看见阳光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雨停了，我听见一只鸟儿在不停地歌唱。我想起了柏杨树上的那只一大清早就在唧唧啭鸣的画眉鸟。深灰色晨光洒向大地，照亮了每一棵树的枝叶。我聆听着外面的歌声。这时候，老人又把身子朝我倾过来。

"他是游泳冠军，"老人悄声对我说，"我给你讲过这件事儿吧？"

他就坐在他父母中间，就在我们斜对面。我看见他们进来了，我不情愿地低下头。其实我知道他们根本就认不出我。他们坐下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看着他，但有时候我却故意把头转开。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

旁边的门关着，鸟儿的歌声也停了。我早上下去点火之前，廷纳和我通常要坐在窗前，透过玻璃欣赏外面的画眉鸟。画眉鸟轻轻地抓着门，她想告诉我她在那里儿，我让她进来，她在我身上轻轻地擦来擦去。我们一起等待晨光慢慢地照射到白杨树上，照亮画眉鸟的翅膀。画眉迎着朝阳飞向浩瀚宁静的天空。我们起身到楼下去。我对廷纳说："天亮了，廷纳，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不得不转过头去。

“他长得很像你，阿斯蒂斯。”老人说。

他们一家人手挽着手走过来了，他和他母亲走在一起，他父亲走在后面，离他们有几步远的距离。他父亲还像我们当初见面一样，总是欠着身子，还是那样腼腆。他突然停住脚步，好像迷了路一样，然后又来到了十字路口。他们坐下来之后，他开始梳理他那灰白的头发。

我的儿子，他的笑是那样轻松自如，他长得高大、英俊，总是面带笑容。我看见他靠在他父亲身上，他知道他这样做有点不自在。但我看得出，他是多么地爱他的父亲。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无法预料我们未来的生活，但是，在你们所受教育的人生历程中……”

大家站起来。我们一道走到门厅。这时候天空万里无云，可我却忘记了鸟的歌声。路上的小水坑还冒着水蒸气。

我看见他们也随我们一道走出了大厅，他父亲消失在人流之中。他却和他的朋友们一道走进了大厅旁的客厅。波利博士和我走出来，招了一辆出租车，老人上了车，我正准备上车时，看见他和他的同学们出来了。我想走过去，叫他等我一会儿。

“我还想多看他一眼，”我对波利博士说，“就一会儿。”

我重新回到人群中，挤了过去。强烈的阳光刺得我双目有点模糊不清。我感到一阵颤抖，我倚在墙上休息了一下。他还站在客厅旁边，还是和他的同学在一块儿。我走到他身边，停下脚步。他看上去很幸福。我看得出他的确很幸福。我木然地站着，望着他的身影。他转过身，我上前一步，想再看一看他的面容。我随着人群慢慢地向前移动。我刚刚走近客厅时，他转过身来，直接向我走来。我一惊，手里的包掉到了地上，里面的东西几乎全倒了出来：化妆用的唇膏，还有我抱着他照的那张照片等等。

“对不起，”他说，“实在对不起！”

他弯下腰，帮我捡起包和唇膏，然后伸手去拿那张照片。



他将照片交给我的时候，我猛然间抓住他的手，他笑了笑。

“谢谢你。”我说。

我们的车迎着阳光开动了。我静静地坐着，我的脑海里仍然回荡着他的话音。我闭上眼睛，将他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心里。他在微笑。

我心里得到慰藉，我终于找到了他。从此，他将永远和我在一起。

在最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花园里的松鼠也能否意识到严冬的来临？

我坐在暖房里，心里一直在想。有一对松鼠整天忙碌着囤积坚果，惊惊慌慌地来回奔跑，企图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其中有一只松鼠腿有点儿跛。我把这事儿告诉安东尼。乌鸦成天栖息在小溪边的电杆上，蜷缩着身子。我一直想念冬天，这事儿安东尼感到很不理解。

天气大部分时间是温暖的，阳光明媚。天很少下大雨。和煦的阳光洒照在绿叶上，令人心情舒畅、愉悦。除了清晨微风拂面，黄昏时分的蚱蜢的鸣叫声之外，感觉不到一丝秋天的迹象。而我的思维却跳到了冬天；我曾告诉过老马歇尔，最理想的事儿是早一点迎接冬天的到来。

今天下午，他的女儿丽迪尔和她儿子一起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她将把她儿子交给我，和我在一起玩几个小时，因为他想和我一起玩牌，还要和我一起玩我去年给他买的玩具火车。他昨天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给他做甜味儿蛋奶烤饼吃。“迪萨小姐，我喜欢吃你做的烘饼。”他说。我也很想见到他。

昨天我收到玛丽琳的来信。其实我不配再收到她的来信，因为我在冰岛的时候，她给我写的信，我连一封信也没有给她回过。收



到她的信,当然我心里很高兴。去看望了埃利斯医生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读她的来信。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我们俩以前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今年夏天到利思去,顺道去看她时拍的。那是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我准备在厨房里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挂上,也许就挂在镜子下面的架子上。照片里的她笑得很甜。我仔细看着照片,认真地读着她的信。我的直觉是,那天夜里我和她的谈话似乎让她受益匪浅。

在最后的几天时间里,在那片树林的上空一直漂浮着一朵云。它下面的树林包围了一片片田野。那片云朵就像挂在树冠上一样。今天,那朵云散发出五彩的光芒。而每天傍晚它就映衬着皎洁的月光。有时候,我认为对我来说它是一种信息,是挂在布满荆棘的天网上的一束羊毛。那朵云在空中已经连续挂了五天时间,我也习以为常了。老马歇尔却不相信。昨天,我看见他也久久地伫立在他的房舍外面,凝视着天上的那片云朵。

这一天,为了打发时光,我把所有的东西草草地诉诸笔墨,权当自己消遣。由于身体日渐虚弱,我很少掌厨做菜,所以,有足够的功夫来写东西。我感到我的身体还不差,喜欢聆听午休时从网球场传来的打球声,就像不停敲打的时钟。我等待着安东尼打完球从草坪上走过来,和我一起喝杯柠檬水。昨天,我告诉他,我同意那位女孩来接替我的工作。我说的“女孩”,实际上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一位里昂的朋友的怂恿下,我们决定从夏季开始雇用她。我曾经了解到,她的烹调观点与我如出一辙。她非常能干,而且我敢肯定地说,她来到这儿之后又有了很大的提高。更令我高兴的是,安东尼谈到以后的生活时,更加充满信心。

天还亮着,但我这几天总是睡得早。我一合上眼就看见我的儿子出现在我的身边。耳边老是想起他的话语,我得到了安慰;我的双手还有他的手留下的温暖。他就在我的身边,他的面容灿如春日。我告诉我自己,并非一切都是徒然,你确实做了件好事。

晚上，我老是梦见这样一个情景：皎洁的月光下，我站在花园里，廷纳在我身边，小溪的对岸有两匹马，它们都在看着我们。我看见马眼圈上的白毛。草地上布满白色的霜雪，而我动身的时候，却一点也不觉得冷。我没有走多远的路，感觉到我的双手好像扶在一道轻柔的月光上。我感到十分惊异，于是，我本能地跪下双膝，借着月光，在雪地里画了一只小鸟。

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那只鸟在放声歌唱，欢迎着春天的来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回家
作者＝（冰岛）奥拉夫桑著；熊德米，王黎译
页数＝１９９
ＳＳ号＝１２２４０７３０
出版日期＝２００２．０９